

# 目 录

<b>白石问道专题</b> .....	01
敬文东专访：《器官列传》与《絮叨诗学》	03
<b>宗教学专题</b> .....	13
Community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Co-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Religion: 即色游玄——支遁的玄佛融合思想	34
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	34
朱夏楠（宁波《文学港》）	34
结语	69
<b>历史地理专题</b> .....	71
20世纪初期西方摄影师在川藏地区的摄影活动与殖民主义话语研究	73
孔晓萌（浙江海洋大学）	73
南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僧侣群体探析	91
陈名扬（宁波财经学院）	91
胶莱运河再研究	108
于波（山东华宇工学院）	108
<b>政治经济专题</b> .....	123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based on CiteSpace	
数字经济背景下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149
左玲玲 李浙怡（宁波财经学院）	149
中国本土品牌与跨国品牌竞争策略分析	161
庞玉立（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	161
<b>学术短札</b> .....	167
郑哲（安阳师范学院）	169



## 白石问道专题

---



敬文东教授



白石问道专题<sup>①</sup>：

## 敬文东专访：《器官列传》与《絮叨诗学》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sup>②</sup>

**刘欣：**您近年来收获了一系列文学界的奖项，不由得让我对您的多元身份构建产生了好奇，您更倾向于做一名学者、一位诗人，还是一个批评家？这几重身份是以怎样的口吻、姿态与共识，共存于“敬文东”之中的？对未来的“敬文东”您还有哪些期待？

**敬文东：**奖项只不过是同行们对我的认可。我认为它既重要，也不那么重要。我中学时代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物理学家，那是出于对爱因斯坦的盲目膜拜。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不具备物理学家的起码天分。后来又想成为一名诗人。但我发现我的同辈人中，有不少比我更优秀的诗人候选者，不免有些泄气。虽然我现在还不时地弄出一点诗歌习作，但谈不上抱负，更说不上野心，仅仅想让自己快乐而已。三十多年来，我曾尝试着写过随笔、小说、诗和学术文章（或学术专著）。2012年，我的中篇小说《韦小宝自述》甚至还获得过“西部文学双年奖”。我不觉得动用多种文体进行写作，会有什么矛盾和冲突。一般而言，无论你操持什么文体，首要的任务就是定调。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对声音的把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此时此刻的发声方式，一定会和你此时此刻的心境联

<sup>①</sup> 2024年为本刊主编就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20周年，感念母校及师长的培育，我们特设“白石问道”专题，以师生访谈的形式以表纪念。中央民族大学临近白石桥，故以此为名。白石又为仙人粮，诸位师长，皆道德学问高深者也。

<sup>②</sup> 敬文东，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有《流氓世界的诞生》、《指引与注视》、《失败的偶像》、《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新诗学案》、《李洱诗学问题》、《味觉诗学》、《自我诗学》、《絮叨诗学》等学术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春天》、《梦境以北》、《网上别墅》、《多次看见》、《器官列传》、《神秘的手足》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灵魂在下边》、《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用文字抵抗现实》等学术文集。获得过第二届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2012年）、第二届唐弢文学研究奖（2013年）、第四届东荡子诗歌批评奖（2017年）、第二届陈子昂诗歌批评家奖（2018年）、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评家奖（2018年）；第四届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奖等（201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

系在一起。语言哲学认为,心境是一个稠密的语言事件。心境的蜕变,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写作风格。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心境,自然就有不同的口吻和语调。有时候,不同的天气、室内外的温差、白天与夜晚在光暗上的区别,都会影响发声方式。我通常只在白天写作,语气因此比较健康,比较阳光,不那么变态,不那么尖利,也缺少抱怨和戾气。在白天写作时,我总是提醒自己尽量离自恋远一点儿。我不在乎别人把我看作学者、诗人还是作家。如果一定要自我定位的话,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及格的思想者。我对未来的自己的唯一期许是: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思想尽可能深刻一些,关心的问题尽可能深入、宽广一些,写出的东西尽可能好一些。我原本就不太多的朋友们基本上都知道,我一直以终身学徒自许。作为一个学徒,如果能感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自己的境界每天都在提升,那就太好了。这也是多年来,最让我对自己深感满意的体验。

**刘欣:**您在《器官列传》后记中谦逊地说,这本“小书”是“呈献给汉语和汉语思想传统的一份悔过书”,您能从作者的角度,谈谈这本小书是如何“以汉语为经、以汉语思想传统为纬”的吗?

**敬文东:**我有一个也许不被人赞同,或者说会被人质疑的观点:古人使用的汉语以味觉为中心,古人的认识论的核心是辨味。万物皆有味。味乃万物之魂。古人使用的汉语以舔舐万物为方式、为渠道,获取对万物的认知。天人合一可能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阐释方式,或者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但品尝之“尝”,也就是动词之“尝”,一定是天人合一在动作上的首先。天下万物被中国古人纳入口腔,被舌头搅拌、翻转、浸润,以辨味为方式,获取万物对于中国古人的意义、用途和价值。对于这些看似离奇的观点,我在《味觉诗学》和《李洱诗学问题》中,有过详细而且不离奇的论证,这里不再啰嗦。最晚自严复翻译西方典籍开始,凡是能比附西洋观念的中国概念就被保留下来,凡是不能比附的,就毫不足惜地被抛弃了。差不多一百年前,我的四川乡贤蒙文通曾致信另一位四川乡贤刘咸忻说:“今日与东西学者共见者,乃不在中国之精华,而在于糟粕。”根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的研究,刘咸忻对蒙文通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王汎森说:刘氏“认为近代新思想家往往为求符合近代西方,而把中国历史中不是主体的部分拿来与之相呼应,并宣示那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很多年后,陈嘉映为蒙、刘二氏的如是论断找到了原因:“哲学工作从

两个方面牵涉到论理概念：哲学家用来论理的概念，哲学家加以考察的概念。比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我们用以进行诠释的概念，因为后者才是我们正在用来思考的概念。中国传统概念无论多么重要、多么意蕴丰厚，它们主要都是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进行解释的概念，它们主要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正在被用来进行思考的活话语。理、气、器、色、仁，它们曾经充满哲学内涵，也就是说，古人曾经对他们自己所使用的概念进行‘概念的自身考察’，而今天，它们却不再是我们使用的概念了。”蒙文通、刘咸炘和陈嘉映之言，当然都有道理。不过，我在此更愿意同情蒙文通和刘咸炘。理由很简单。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被抛弃的、被遗忘的中国概念确实更具有中国性，它们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的最主要的渠道。除了陈嘉映提到的那些概念外，被今天的中国弃之不用的重要概念至少还有味、中、和、气、象、势、心、性等等。我赞同赵汀阳的做法，尽量从中国本土的观念体系中寻找合理的成分，加入到全球化的思想大合唱之中，否则，就未免太浪费、太奢侈了。《器官列传》以随笔的方式，具象化地解析了诸如心性、面子、口戕口、性观念等等极具中国本土化的东西。因为不是学术文章，所以显得比较随意，好在还不太任性。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随笔越有趣越好，越有想象力越好，如果能够撒野，那就好得不能再好了。我这一代人自小受到的，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很不友好、很不礼貌的教育。我们实在是中毒太深了，很晚才知道这里边的错误。既然错了，当然要忏悔，忏悔就得有行动。这样就有了这部“呈献给汉语和汉语思想传统的一份悔过书”。

**刘欣：**在《器官列传》里，您让“心”坐了第一把交椅，而“大脑”作为人类最复杂、最精密的生物器官，却只瑟缩在“心”这一条目之下，关于大脑的功能如“想”，只是“心”的一个附属。这大概就是以“汉语思想传统为纬”了，也不禁让我联想到您之前的一个比喻，“心属于旧诗，而新诗属于脑”（非原话）。在这本新书里，您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典籍，回归做一位有东方写作传统的作家，凭一本“小书”再次拓展了您文字王国的疆域，可以再谈谈在这本书中，对“心”、“脑”或者其他东西方意象的取舍吗？

**敬文东：**您可能言重了。我既没有能力成为“东方写作传统的作家”，也没有拓展我的“文字王国的疆域”。您高估了我，我有哪门子的“文字王国”啊？我只不过对随笔这种文体有极度的信任。它在表达上的无所不能，确实让我

心驰神往。据说,在法语中,随笔一词的意思是试一试(to try)。我偏爱的一位中国诗人兼随笔作家钟鸣形象地说,随笔嘛,就是去“踹”(try)。随笔有各种可能性。对于我而言,就是随笔在我写作《器官列传》的时候,能够充分满足我对传统的充分想象。必须要申明的是,传统是遗产,不是遗物。它是活的。比如,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汉字、筷子和汉语。“心”在中国古代的概念系统中,其地位也许不下于“道”或“理”。在中国古人看来,“心”被认为是整个身体的主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中国独有的概念系统,可以被理解为围绕“心”而展开,而运行。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心都在指挥包括它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体的零部件。唐君毅说得很形象:“吾人之此身直立于天地间,手能举、能推、能抱、能取;五指能指;足能游、能有所至而止;有口能言;有耳能听;有目能见;有心与首,能思能感,即其一切生命心灵之活动之所首发。中国哲学中之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亦正初为表此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者。试思儒家何以喜言‘推己及人’之‘推’?庄子何以喜言‘游于天地’之‘游’?墨子何以喜言‘取’?老子何以言‘抱’?公孙龙何以言‘指’?……故真知手之‘推’,亦可知儒家之推己及人之‘推’。真知足之‘游’,亦可知庄子之游于天地之‘游’。充手之‘抱’,至于抱天地万物,而抱一、抱朴,即是老子。尽手之取,至于恒取义,不取不义,利之中恒取大,害之中恒取小,即是墨子。穷手之指,至于口说之名,一一当于所指,即公孙龙子也。”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过去是回不去的,但也不值得回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了应对当下而从传统中汲取我们想要的营养。我深信传统中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它能滋养我们。但我一刻也不会忘记的是:我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中国人。

**刘欣:**在《器官列传》中,您特别强调了汉语空间、汉语内部的秘密,您如何界定汉语空间这样的说法?您在书中讨论了很多关于器官的话语,这样的书写,是否也带有对汉语空间的反讽意图呢?

**敬文东:**“汉语空间”或“汉语内部的秘密”云云,只是一些文学化的说法,修辞的成分比较浓。这里就不纠缠了。有一个问题可能与您的提问有关,值得一说。我有一个很固执(如果您说“固化”也不是可以)的看法,就是古人使用的汉语必须服从的伦理是诚。王夫之说得好:“修辞诚,则天下之诚立,未有者从此建矣,已有者从此不易矣。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诚也。”但事

情的吊诡之处刚好是：所有的伦理被制定出来供人遵从的同时，也必然会主动地供人违反。遵从和违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不可分割。使用古代汉语的人不可能都响应诚伦理发出的召唤，也不会都听从诚伦理暗含的内在律令。鉴于此等情形，钱钟书才会说：“言辞可以饰伪违心。”在驳杂、晦暗的现实生活中，非诚之言反倒最有可能让人获取只有更大没有最大的利益、得到只有更多没有最多的好处。因此，奸臣、佞人愿意无底线地充任诚伦理的冒犯者和破坏者。一切观念都是语言的产物。在尼采看来，连真理都是某种修辞烘托出来的某种效果，没有必要太把它当回事。埃兹拉·庞德和乔治·斯坦纳一致断言：唯有语言的腐败，才是一切腐败的总根源。奸臣、佞人以其对语言实施的腐败行为遗祸天下。他们在讲一种叫做“饰伪违心”的“言辞”。悉心维护古汉语的诚伦理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原则。就是在诚伦理同时被遵从和被违背这个层面上，我同意您的观察：《器官列传》的发声方式确实带有对汉语空间的反讽意图。

**刘欣：**您的《絮叨诗学》全书提及“反讽”一词多达274处，这个词可以确认为是全书的“题眼”吗？您在其后记中也提到：“我们的的确确生活在一个反讽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反讽主义者（或反讽主体）”，在反讽时代中，您建议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呢？

**敬文东：**在完稿于2019年春节的《李洱诗学问题》中，我提出了反讽时代这个概念。反讽时代意味着：人类依照自身的愿望，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美好的A，结果呢，却一头栽进了-A的怀抱或曰领地。A与-A不但同时存在、同时为真；彼此间还得互为前提、互为依据。比如说：核能如果没有温暖人类、照亮黑夜的能力（亦即A），原子弹就不配拥有毁灭人类的绝世才华（亦即-A）？也可以反过来说：原子弹如果不拥有毁灭人类的本领，核能又焉有温暖人类复兼照亮黑夜的超级能力？苏珊·桑塔格对此给出了深刻的观察：真理是均衡，真理的反面亦即不均衡，或许也不是谎言。李洱有几乎完全相同的言论，真理的对立面也可能是真理。德斯蒙德·莫里斯对反讽时代的描述是：“现代人的历史，就是现代人和自己的成就作斗争的历史。”您看，这就是反讽时代的要命之处。反讽时代的核心意涵，就这样构成了我们这些反讽主义者的生存背景。人类迎来了它从未遭遇过的悲摧之境。我们如何自处，由此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絮叨诗学》的整体思想，就建立在反讽时代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它要探讨的是：因为在价

值失范的反讽时代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自处，所以，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都无法对任何价值情景做出非此即彼的明确判断，也就只好以不做任何判断的絮叨作为发声方式。絮叨意味着不断向后延宕，为的是避免做出任何判断，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因此只有形式上的结尾，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结尾——卡夫卡的《城堡》、艾略特的《荒原》就是其中的杰出范例。您让我给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处的答案，有点强人所难，也违背了《絮叨诗学》所持的基本观点。我何曾有过给出答案的能力呢？我也许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我认为我自处的方式，没有任何理由得到任何人的效法，因此不值得推荐。

**刘欣：**您在《絮叨诗学》中多次提到李洱的作品，还曾专门著过《李洱诗学问题》，其中在《应物兄》中，主人公经常自言自语，而鹦鹉学舌，其实也是废话。李洱也确实非常善于学各种人物之“舌”。那么对于小说家来说，“学舌”似乎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技能。以反讽时代的立场看，李洱的学舌与其他作家的学舌有什么区别呢？

**敬文东：**李洱是我佩服的少数几位当代中国作家之一。他让我服膺的一个原因，是他几乎没有败笔。没有几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詹姆斯·伍德说过：“小说家总是要用至少三种语言写作。作家自己的语言，风格，感性认识，等等；角色应该采用的语言，风格，感性认识，等等；还有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世界的语言——小说先继承了这种语言，然后才发挥出风格，日程讲话、报纸、办公室、广告、博客、短信都属于这种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是一个三重作家，而当代小说家尤其感受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压力，因为三驾马车里的第三项，世界的语言，无处不在，浸入了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隐私，亨利·詹姆斯曾经认为这种隐私是小说最好的采石场，并（用他自己的三元论）称其为‘触手可及的此刻-私密’（the palpable present-intimate）。”对这段话我必须举双手表示赞同。但我也只会在“角色应该采用的语言，风格，感性认识”这个层面上，赞同您的判断：李洱“确实非常善于学各种人物之‘舌’”。而在“作家自己的语言，风格，感性认识”的层面上看，李洱早已建立起一种和反讽时代配套的语言风格，或发声方式——那就是絮叨。可惜在写《李洱诗学问题》时，我还没能认识到这种发声方式的质地、内涵和社会学效应。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作家的发声方式和李洱相似。他是独一无二的。在我看来，他是最能理解何为反讽时代的中国当代

作家。他的全部作品既自觉地建基于反讽时代，又对反讽时代的精神气质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尖锐的洞察和分析。我也许只有通过解读他的作品，才有机会和能力提出反讽时代这个概念，并以此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这是我要特别感谢李洱的地方。至于他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不关心。我也不曾和他就这个问题有任何探讨。我更喜欢在酒桌上听他幽默、夸张的言谈。那可是一个令人享受的时刻。告诉您一个秘密，李洱善良、羞涩，常常独自一人莫名其妙地发出笑声，就像本雅明说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往往会出人意料地突然鼓起掌来。

**刘欣：**您对汉语诗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对废名的诗学有很深的理解，但在《絮叨诗学》中没有提到废名。想向您请教的是，您如何看待废名的诗学理论？如果从絮叨诗学的角度来说，废名的文学创作是否能纳入絮叨诗学的传统？如果可以的话，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敬文东：**这可能是您的误会。我对废名先生确实很喜欢，但不敢说对他有啥理解，遑论研究。我非常欣赏废名先生对新诗、旧诗的区分做出的判断：旧诗的形式是诗的，内容是散文的；新诗的形式是散文的，内容是诗的。旧诗可以转写为散文而新诗不可以。就我对废名先生的粗浅认识，我愿意说他的诗有一点佛家的味道，在某些特殊的时刻，甚至还有一点出世的气息，比如他的《十二月十九夜》：“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星之空是鸟林，/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海是夜的镜子。/思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就这个意义而言，废名先生有自己的价值靠山，有他坚定的那一面，他的口吻因此不是絮叨能够概括的——他连自己的“名”都“废”了嘛。但这一点都不会影响废名先生的重要性。

**刘欣：**一看到您新作《絮叨诗学》的标题，翻到一连串以“絮叨”二字开场的目录，让我不得不联想到罗兰·巴特先生的《恋人絮语》，请问您在立意与行文时，是否致敬了《恋人絮语》？罗兰·巴特的文字带着法兰西的温柔和潮湿，而您的文字则裹着蜀地的勇猛与麻辣，罗兰·巴特以他时代特有的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自创一派，您也一直用诗意的文字在各种语体中锋利的试探与穿梭，介意我把您比作中国的“罗兰·巴特”吗？

**敬文东：**至少有较长一段时间，罗兰·巴特是我心目中的神。不是介不介意您把我比作中国的罗兰·巴特，而是我哪里能够得着他老人家呢？您对我的恭

维虽然不切实际，却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谢感谢。《絮叨诗学》和《恋人絮语》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啥关系。听您的建议，我以后找一个机会致敬罗兰·巴特吧。读博士的时候，我的第二外语是法语，几乎全逃课了。我今天一个法语单词都不记得。我只能从罗兰·巴特的著述的汉语译本中，感受、体验他的文风。辜鸿铭讲过，能在完美性上与文言媲美的，唯有法语。我也听人说起过，法语是一种精致、典雅的语言。我一向对法国思想家和作家有偏爱，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还看到过一个观点，罗兰·巴特是蒙田以来最重要的法语随笔作家。如此说来，他的书写一定精致、优雅和高贵。我的情况和他全然两个模样。您肯定知道，现代汉语既处于成长的过程之中，又曾遭到过严重的、令人发指的破坏。我要再次引用张枣差不多三十年前的看法：汉语“就是那个在历史上从未摆脱过政治暴力的重压，倍受意识形态的欺凌，怀旧、撒谎、孤立无援却又美丽无比的汉语”。有了这样的背景，我虽然可以像您说的那样，能够“在各种语体中锋利的试探与穿梭”，却绝对说不上精致、典雅和高贵。对于现代汉语而言，典雅、精致、高贵至今还只是梦想。我们一起努力吧。

**刘欣：**最后，想请教您一个短视频时代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行业寄居在短视频上生长，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依靠数码来引领，仅靠中文谋生的人群越来越稀少，20几年前我们喊出了“诗歌已死”，现在也有人陆续喊出“中文已死”，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和趋势？面对这个日益视频化的世界，作为诗人、批评家，尤其作为一名文学院教育工作者，您有哪些话要对我们的读者说？

**敬文东：**科学技术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造我们的行为方式，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现在的情况更严重。科学技术以加速度的态势，改变着我们的一切处境。即便如此，我还是不相信诗歌已死。毕竟诗歌关心的是个体和人类在时间中的命运，在宇宙中位置。这是世代代的人，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所以诗歌不死。诗歌每时每刻都需要灵魂的参与，都需要心灵的加持。机器只有“芯”，没有“心”。机器不关心人的命运，机器因此不能取代诗歌。早一百年前，就有一些激进的学者、教授和官员要求取消汉语和汉字。实践证明这是无法实现的事情。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计算机全然处于英语的环境中找到了汉语的自存之道。这足够证明汉语不死，汉字不死。出于几乎相同的道理，视频化和灵魂无染，它因此无法俘获有温度的灵魂、有灵魂的需要。

求。在任何时代，诗歌或其他艺术都是少数人的事业。诗歌事实上早就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一份大礼。



## 宗教学专题





## Community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Co-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Religion:

A Brief discussion on T. C. Chao's Early Christian Social Thought  
Huang Haibo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p>①</sup>

**Abstract:** Tzu-ch'en Chao(赵紫宸), in his early days, devoted himself to thinking about the issue of "integration and co-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ligion", which included three major themes: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environmental change affecting religion,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with religious changes, and the Christian response to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se reflections is how Christianity adapts to and influences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 C. Chao regarded the public life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s the key, expecting Christians to improve themselves in it, and through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of Christians and the church's actions, the community's sense of solidarity and love will be extended to the whole society, bringing a new order to the whole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since the religious dilemma under the modern situation is a universal problem, T.C. Chao failed to put forward more specific solutions. In the later period, he turned to emphasizing single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and taking individual self-realization as the only feasible way to influence the society. In spite of this, T.C. Chao's early thinking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esent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Keywords:** Tzu-ch'en Chao, Christian Social Thought, Integration and Co-Transformation, Community

T.C. Chao has rich and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sup>①</sup> Huang Haibo,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Office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mail: rexhuanghb@126.com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eneral Program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No. 22BZJ037)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its future direction. Scholars have noticed the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thoughts, suggesting that to some extent, T.C. Chao put forward a kind of Christian "social philosophy" or "social theory."<sup>①</sup> One significant aspect is the "sociality"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society, particularly in China.<sup>②</sup> In fact, from 1914 to 1917, T. C. Chao pursued studies in theology,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earning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in theology and sociology. He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arly scholars in China to receiv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sociology. Although he did not ultimately make it his main profession, his background in knowledge endowed his theological thinking with distinct soc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 C. Chao did not construct a systematic "sociology of religion" theory. Essentially, he merely drew upon mainstrea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at the time to enhance his theological arguments. Nevertheless, his thoughts served as an embryonic form of a church-oriented social theory and could provide a solution to the "reductionism" dilemma faced by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Additionally, his efforts,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in incorporating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theories into theological thinking without losing the foundation of his faith serve as a mirror and offer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ent th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 **I. The Integration and Co-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ligion and the Adapt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ciology itself was in its infancy as a discipline, and both its theories and methods were relatively rudimentary. The prevailing social evolution

---

① 孙尚扬 Sun Shangyang, “在秩序与意义之间：赵紫宸的选择及其得失” Zai zhixu yu yiyi zhijian: Zhao Zichen de xuanze jiqi deshi [Between Order and Meaning: T.C.Chao's Choice and His Gains and Losses], 孙尚扬 Sun Shangyang: 《宗教社会学》 Zongjiao shehuixue [Sociology of Religion],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7。

② 李向平 Li Xiangping: “‘社会中的社会’ ---- 赵紫宸的教会神学” Shehui Zhong de shehui -- Zhao Zichen de jiaohui shenxue [“Society within Society” ---- T.C.Chao's Ecclesiastical Theology], 李向平 Li Xiangping: 《文化正当性的冲突》 Wenhua zhengdangxing de chongtu [The clash of cultural legitimacy], (上海 Shanghai, 百家出版社 Baijia chubanshe [Baijia Press], 2006), p.521。

theory, especially regarding social chang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C. Chao's formation of social views. For instance, he directly quoted the viewpoints advocated by American sociologist Lester Ward, who advocated functionalism and social evolution theory, in his work "Pure Sociology."<sup>①</sup> T. C. Chao's sociological training meant that he held an overall calm and rational judgment regarding social chan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He would not be pushed to extremes by optimistic beliefs, nor would he exhibit blind ideal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bstract speculation.

T.C. Chao's reflec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co-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ligion" were concentrated in three lengthy articles written in 1920. These three articles progressed systematically, forming a complete system regarding the issue of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ligion. They include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s affect religion,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political,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religious changes, as well as the response strategies of Christian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Ultimately, the focal point remained the question of how Christianity adapts to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s affect religion: T.C. Chao pointed out that environmental changes are normal and that throughout history, all "endeavors, institutions, writings, and customs" undergo changes. Moreover, he recognize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he progress of evolutionary principles and humanitarian concepts, entering modern society has accelerated "the world's changes a thousand fold."<sup>②</sup> He emphasized that these changes require human adaptation,

① 莱斯特·弗兰克·沃德 (1841.06.18--1913.04.18), 美国社会学家、植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首任主席。其主要著作有:《动态社会学》(1883)、《文明的心理因素》(1893)、《社会学大纲》(1898)、《纯粹社会学》(1903)、《实用社会学》(1906)等 Lester Frank Ward(1841.06.18--1913.04.18), American sociologist, botanist, and paleontologist. He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Dynamic Sociology* (1883),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1893), *Outline of Sociology* (1898), *Pure Sociology* (1903), *Practical Sociology* (1906), etc.

② 赵紫宸 Tzu-ch'en Chao, "宗教与境变" Zongjiao yu jingbian [Religion and Situational change],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 [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赵紫宸文集》第3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anjuan [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 III],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8.

but this adaptation is not passive. "To fit the environment ,one must strive to make the environment adapt to human beings, as changing the environment to benefit human evolution is adapting to the environment."<sup>①</sup>In other words, by actively transforming the environment to benefit human development ,people adapt to their interests and needs. Therefore, fundamentally, T. C. Chao believed that human adapt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essentially meant transforming the environment to suit humans.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terplay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human desires and needs aimed to bring forth the issues of religious change and adaptation. According to T. C. Chao, "all institutions and ideals are subject to change. Since religion is also an institution and ideal in society ,it is naturally subject to change."<sup>②</sup>With eloquent argument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ristianity recorded in the Bible, he passionately proclaimed that "as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religion will inevitably change."<sup>③</sup>He emphasized that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realms in present-day China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past, calling for a "new religious cause to adapt to the modern new environment." Considering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a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risis for the church, he believed that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depends on how its members respond to the new environment.<sup>④</sup>Adapting to the new environment implies changes in the "ideological rituals" of religion and more, or else it would be unable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China and would only retreat into a state of decline. This demonstrates his awareness that in the face of societal and temporal changes, not only the external aspects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rituals" of Christianity cannot remain unchanged .This article primarily argues that there is an inevi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in environment" such as external factors like time or

---

① Ibid,p.8。

② Ibid,p.14。

③ Ibid,p.16。

④ 赵紫宸 Tzu-ch'en Chao, “促进宗教革新的势力” Cujin zongjiao gexin de shili [The power to promote religious innovation],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 《赵紫宸文集》第3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anjuan[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III ],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19。

era, and the changes in religion, particularly Christianity.

2.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political,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religious changes. In another important article from that year, "The Power to Promote Religious Innovation," T. C. Chao continues his reflections from the previous article,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religious innovation. He not only meticulously analyzes the external forces with direct impact but also acknowledges that religion is not merely passively influenced by the external social environment. Internal factors within religion are also crucial forces leading to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T. C. Chao believes that the changes in religion can also influence society. He states, "Religious reform is not only urged by external forces, but also due to internal spiritual expansion; it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ut also creates variou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ociety. In this way, as society undergoes transformations, religion can be stirred up from the outside; with its own power, religion can send out spiritual vibrations from within to inspire society." This means that religion is influenc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ligion has the power to "inspire" society and prevent it from becoming stagnant and lifeless.

Specifically, T. C. Chao believes that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expansion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s well as internal sectarian conflicts within religion, are the three important forces leading to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first two being external factors. Firstly, regard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T.C. Chao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religion relationship in the Western Christian world and religious changes. He deeply analyzes several significant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of his time, such as the populist movement, democracy movemen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He keenly captures the tremendous impact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on religion, stating that "socialism is a major force promoting religious innovation. The period of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ocialism will come to an end, and from now on, these two movements need to reconcile and create a new

society and cause." <sup>①</sup>

Secondly ,the expansion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since the Renaissanc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religion. However, T. C. Chao does not feel pessimistic about this. He argues that "since philosophy uses critical methods to study the truth, it naturally judges religion accordingly, and many irrational doctrines within religion naturally face logical criticism."<sup>②</sup>At the same time, he believes that although natural science poses even more severe conflicts with religion, it also dispels superstitions and promotes religious contemplation and awakening. He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that "Christianity has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science, undergoing significant reforms in ideals and doctrines. It is only the conservative and ignorant individuals within the church who have yet to fully awaken." <sup>③</sup>

Thirdly, internal factors within religion mainly refer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that also promote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in religion .T.C. Chao mainly uses Christianit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at since the Middle Ages ,through wars between denominations and religious reforms, two major cultural factors have emerged: freedom of belief and spiritual religion. These facto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among various sects in terms of morality .Although these conflicts have caused destruction, they have also promoted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in religion, especially in modern times. Various religions, particularly the major denominations within Protestantism, have started "abolishing many narrow-minded ideas and advocating various united movements." <sup>④</sup>

In terms of the analysis of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alone, T.C. Chao's thinking has reached a considerable level of depth and systematically .The two major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he analyzed align strongly with the main arguments of the "secularization" theory that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1960s. However, what differs is that

---

① Ibid,p.26。

② Ibid,p.27。

③ Ibid,p.28。

④ Ibid,p.29。

T. C. Chao acknowledg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Christianity but remains highly optimistic, believing that they can promote the renewal and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unlike the secularization theory, which suggests that religion will ultimately decline.

3. The response of Christianity to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If the previous two articles mainly discussed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religion, particularly Christianity, the articl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Situation for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at year, furth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his article, T.C. Chao recognizes that the new intellectual trends vigorously criticize various institutions, ideas, and cultures in China, with Christianity being particularly impacted. He questions whether, in this situation, "Christianity can achieve its true life and spirit, extracting it from all obscurity and adapting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modernity?" T.C. Chao has great confidence in the adaptability of Christianity and believes that Christianity can "impart its life and spirit to the environment, making the environment adapt to Christianity, constructing a moral world that is spiritual, boundless, and timeless, based on the materialistic foun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he also admits that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arrival of missionaries like Robert Morrison in China, Christianity has only "superficially imposed religious appearance upon us, without truly creating awareness and endeavors in the hearts of believers for the true spirit and life of Christianity."<sup>①</sup>

Therefore, T.C. Chao believes that the rejection of Christianity by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at time was due to Christianity being obscured and concealed by "the complicated rules and doctrines of Western rituals and teachings." This led to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regarding the "true life and spirit" of Christianity, with their focus solely on the "strange and unreasonable complex rituals."

<sup>①</sup> 赵紫宸 Tzu-ch'en Chao, "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 Xinjing duiyu jidujiao de qixia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situation for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 [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赵紫宸文集》第3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anjuan [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 III],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41。

<sup>①</sup>To overcome these shortcomings, T.C. Chao emphasizes that Christianity needs to "create a new nation, allowing this nation to naturally embody the spirit of Christ in their hearts," stating that "if Christianity cannot make Christ manifest within us, if it cannot shape the Chinese people into a new nation with moral strength and sacrificial spirit, then Christianity has not fulfilled its original purpose and can be considered a failure!"

<sup>②</sup>(16) According to T.C. Chao, to achieve the above objectives,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requirements posed by these changes on Christianity. Regard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it means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current church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can manifest the true life and spirit of Christ, making Him the force that runs through the hearts and blood of people worldwide."

In conclusion, T.C. Chao keenly recognized that China at that time was undergoing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Many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 especially church organization and theological doctrines, needed to adapt to these changing times: "(The church) is essentially a tool that can be changed at any time. After the changes ,it will not diminish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moreover, many of its theological doctrines contain superstition and excess baggage, which should be abandoned without hesitation!" <sup>③</sup>Although T.C. Chao did not explicitly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his relevant thoughts hav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theme of "Sinicization" in China. The response plan of Christianity in a changing society undoubtedly involves eliminating superstitions and excessive Western "rituals, rules, and doctrines," in order to adapt to Chinese society and exert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itself on society.

## II.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Position of Christianity

---

① Ibid,p.42。

② Ibid,p .43。

③ 赵紫宸 Tzu-ch'en Chao, “中国民族与基督教” Zhongguo minzu yu jidujiao[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ristianity],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 《赵紫宸文集》第3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anjuan[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III ],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637。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integration and co-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ligion" is aimed at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adapt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T. C. Chao holds a positive and people-oriented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s. When applied to Christianity's adaptation to Chinese society, it means that Christianity must adapt to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fulfilling its functions and mak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This adaptation is proactive rather than passive. T.C. Chao points ou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wakening amidst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leading to the demand for a thorough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demand is directed towards various concrete issues in China, which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human problems." Christianity can play a role in addressing these "human problems." T.C. Chao believes that Christianity is a "moral religion" and needs to manifest its moral spirit to adapt to modern requirements. To achieve this, firstly, it should embrace the spirit of science, as the spirit of science is also the spirit of morality. Secondly, it should uphold human values and social fairness, which are essential aspects of morality and areas where Christianity can demonstrate its strength. Thirdly, it should fully exert the ethical commandment of love.<sup>①</sup> "Love completes individual morality and establishes societal morality; on an individual level, it involves sacrifice and service, while on a societal level, it encompasses fairness and compassion."<sup>②</sup> Thus, T.C. Chao hopes that Christianity can bring forth and radiate this profound morality to serve China.

As a Christian and theologian, T. C. Chao has full confidence in the role of Christianity in creating a new society, culture, and humanity. This confidence stems from his firm belief that Christianity is a religion that is "shared with life and shared without happiness."<sup>③</sup> He further emphasized in his essay "Learning Benevolence": "Individuals

---

① 赵紫宸 Tzu-ch'en Chao, "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 Xinjing duiyu jidujiao de qixia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situation for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 [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 《赵紫宸文集》第3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anjuan [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 III],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50。

② Ibid, p.51。

③ Ibid, p.52。

need public life to establish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 and unity requires the voluntary efforts of individuals to maintain public life."<sup>①</sup>The church orga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s precisely a public life based on the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of individuals. Therefore, for Christianity to provide its moral supply to China and become the source of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t must be rooted in the public nature of its community.

However, as a theologian, T. C. Chao emphatically emphasizes the spiritual nature of the church and opposes reducing the church to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f being merely an organization. He criticizes the misconception among many Christians at that time who viewed the church as "a group of believers freely associating ,organizing and disbanding themselves like any other voluntary association." He emphasizes that the church is not solely established by human hands, but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it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God's will and the ca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Taking Jesus as an example, T. C. Chao explains that the community formed by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is "a unity filled with spiritual power and imbued with new spirit and new life..."."God descended in Jesus Christ, revealing Himself in Jesus Christ ,and Jesus Christ gathered believers, making them worship Him through faith and becoming the church; therefore,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 lies in God, not in humans."<sup>②</sup>This emphasis on the spiritual nature runs through his entire thought.

While upholding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T. C. Chao acknowledges that the church is a community and fellowship of believers, where each member is connected to the body of Christ and possesses a profound sens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He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shaping and nurturing the community and its consciousness, stating that "religion naturally generates cohesion and promotes social consciousness; believers naturally have deep fellowship and strong

① 赵紫宸 Tzu-ch'en Chao, “学仁” Xue ren[Learn benevolence],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 《赵紫宸文集》第 1 卷 Zhao zichen wenji diyijuan[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I],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364。

② 赵紫宸 Tzu-ch'en Chao, “基督教教会的意义” Jidujiao jiaohui de yiy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 《赵紫宸文集》第 4 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ijuan[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IV],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70。

group sentiments towards Christ." Moreover, this "church consciousness" enables the church to independently form associ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le also establishing connections with one another, effectively creating a sense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The ongoing "ecumenical movement" at that time was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create a shared consciousness in the world. T. C. Chao quotes Paul's perspective on the church (1 Corinthians 12:12-13) to illustrate that "the church is a body without limits, but full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It is precisely this awareness of being one body that makes Christianity a driving force in creating a shared consciousness. T. C. Chao then reflects on the Chinese context, stating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the least religious faith and are the least inclined to unite ." However ,many Chinese Christians, although having religious faith, do not contribute to unity. This is because "Chinese Christians often seek religion but do not care about the life of the church. They only seek personal benefits within the church without wanting to contribute to it, without realizing the most profound and urgent need of China today, which is the cohesive force that the church can provide." <sup>①</sup>

According to Li Xiangping , T. C. Chao's focus on church life lies in seeking "a group or organizational body that can embody the social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Christianity as a social experience and action,"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 church organization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urthermore, T.C. Chao believes that the path to China's renewal is for individuals to achieve moral self-realization through the church as "society within society" and then bring about a new order for the entire Chinese society. <sup>②</sup>

T.C. Chao emphasizes that "the church is the union of love, an institution where God dwells with humanity, which not only gives rise to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but also, through the pass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love, tolerance and

---

① Ibid,pp.71-72。

② 李向平 Li Xiangping: “ ‘社会中的社会’ ---- 赵紫宸的教会神学” *Shehui Zhong de shehui--Zhao Zichen de jiaohui shenxue*["Society within Society" ---- T.C.Chao 's Ecclesiastical Theology], 李向平 Li Xiangping: 《文化正当性的冲突》*Wenhua zhengdangxing de chongtu*[The clash of cultural legitimacy], (上海 Shanghai, 百家出版社 Baijia chubanshe[Baijiao Press], 2006), pp536-537。

forgiveness, can fundamentally create peace for humanity." He recognizes the deep-seated animosity between nations, classes, parties, and races prevalent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and thus proposes the solution of "breaking through with pure love, a shared faith, and one church." Moreover, according to T. C. Chao, measures promoting peace and love, such as "confession, reconciliation, forgiveness, and so on," take place within the realm of the church because it is an institution built for peace and the elimination of animosity through harmonious living between God and humans. T.C. Chao repeatedly emphasizes that a sens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the creation of love and peace can be formed within the church. For instance, he believes that "the church focuses on, presides over, and expands the harmonious fellowship between God and humans, and among people. This fellowship grows through having the same faith,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forgiveness, and mutual love." Therefore, if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s cannot be resolved privately, they can be resolved by seeking reconciliation with fellow believers or even seeking mediation from the church. "Through being influenced by Christ within the church, people can gain a full sense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strong unity, and a completely reconciled life." This is because within the church, Christians can acquire a particularly strong "shared consciousness." As people become united in the church as the body of Christ, they can form deep friendships with "strong religious and moral support, possessing profound and mysterious significance." In conclusion, "the church is a new world surpassing and penetrating the old world. It wants to subdue and transform this fragmented, absurd, and arrogant world, change its nature, and then bring it into the realm of church life as a newly created and reconstituted world."<sup>①</sup>

However, in a China where Christianity is not the mainstream religion and believers do not have the advantage in numbers, but rather face a hostile environment, how can the love, community, unity, and peace consciousness formed within the Christian church

---

① 赵紫宸 Tzu-ch'en Chao, "基督教教会的意义" Jidujiao jiaohui de yiy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 [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 《赵紫宸文集》第4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ijuan [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 IV],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p.73-75.

be spread outside? T. C. Chao explains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church in two aspects: "concentration" and "expansion." The term "concentration" mainly refers to collective worship within the church. "Worship is the center of church life, containing practical religious education for all believers." Because "worship contains the entirety of the gospel, salvation, doctrine, and church history, it is practically an abbreviation of the entire Christian religion. It generates religious experience, group consciousness, and a joyful sense of peace in one's life..."<sup>①</sup> Through worship and shared faith in daily life, Christians internalize the ethical values and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Christianity, becoming new individuals who live out the likeness of Christ in morals,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T. C. Chao realizes that "the church itself is a nation within a nation, a society within society, a culture within culture. It has its own fundamental philosophy, cosmic view, worldview, social view, terminology, internal affairs, customs, traditions, and trends." This emphasizes that the church exists in society while possessing uniqueness distinct from society, forming "a separate system." However, the church should extend its life, faith, spirituality, ethics, and sentiments beyond the church itself and "impart them to the outside world..." This is the aspect of "expansion." In this regard, T.C. Chao does not particularly highlight evangelism or preaching the gospel but instead lists several behaviors of Christian sin in various situations, thereby extending their spirituality, ethics, and sentiments outside the church. These include establishing trustworthy and faithful personalities based on faith, opening schools, establishing hospitals, publishing literature, engaging in charitable activities, promoting social reform, advocating justice, and supporting peace. During times of great disasters or difficulties, they practice rescue operations, disaster relief, and saving lives. Especially when persecuted, "they remain silent, like sheep before their shearers; they endure exploitation with gentleness. Death itself becomes their way of life." T.C. Chao advocates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hurch life and flexible adaptation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while maintaining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societal issues of the time. The church should raise prophetic voices, criticize

---

① Ibid, pp.79-80.

and evaluate values ,while also accepting criticisms and demands from scientific,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regard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This allows for improvement and courageous progress.<sup>①</sup>

Of cours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community and unity established by T.C. Chao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primarily refers to the faith community within Christians themselves. However, through the actions of individual Christians and the church as a whole, thi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nection of love can be extended to the entire society. T.C. Chao repeatedly emphasizes that the faith of individual Christians "cannot be disconnected from the Chinese nation",<sup>②</sup> Christians should not isolate themselves from the life of the nation and society but rather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sin. As members of the social and national world ,Christians should not evade reality, shirk responsibilities, or live in a vacuum .T.C. Chao reminds that we should avoid two extremes: on one hand, forgetting one's faith when concerned with soci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ecoming too focused on religion and neglecting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present social and national world. He advocates that Christians need to balance their faith with social concerns.

### III.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 C. Chao's Early Christian Social Thought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T. C. Chao embarked on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he examined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stin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ristian ideals. T.C. Chao firmly believed that Christianity could save China and become the

---

① Ibid,pp 80-81。

② 赵紫宸 Tzu-ch'en Chao, “新时代的基督教信仰” Xinchidai de jidujiao xinyang[Christian Belief in the New Era],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赵紫宸文集》第4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ijuan[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IV],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3。

foundation for its social reconstruction,<sup>①</sup> His discourse went beyond mere theological contemplation and became a form of "Christian social though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Christianity has a rich social thought that possesse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ves with the times. Ernst Troeltsch (1865-1923), a German sociologist and theologian,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theory" within Christianity. T.C. Chao's thoughts follow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while incorporating the specific Chinese context, making it more relevant and vivid. Troeltsch defined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as the doctrin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itself," the nation, and society. Ultimately, these theories aim to answer how Christianity and its church can establish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non-religious forc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emerged independently from Christianity, leading to cultural unity.<sup>②</sup> In other words, the focus of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is no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 but rath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follow different sets of rules.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not abstract entities but occur within a concrete society, between "religious forces, economic forces, and political forces".<sup>③</sup> T.C. Chao's reflec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religion and change" vividly embody this pursuit of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forces. This relationship i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individuals who adhere to different normative principles, which originate from various normative systems including Christianity itself. Therefore,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s addressed by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l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 ethical norms and other normative systems. Troeltsch attempted to discuss whether Christian behavioral rules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entire society in

---

① 卓新平 Zhuo xinpíng, “赵紫宸与中西神学之结合” Zhao zichen yu zhongxi shenxue zhi jiehe [Tzu-ch'en Chao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logy], 《世界宗教研究》 Shijie zongjiao yanjiu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1, (北京 Beijing, 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 Shijie zongjiao yanjiu zazhishe [Journal for the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1998), pp.128-132。

② 特尔慈 Ernst Troeltsch 著, 《基督教社会思想史》 Jidujiao shehui sixiangshi [A History of Christian Social Thought], (上海 Shanghai, 中国基督教两会 Zhongguo jidujiao lianghui [CCC&TSPM], 2013), P.10。

③ Ibid, p.9。

this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s. He traced 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from its inception until the 18th century, finding that early Christianity, including primitive Christianity and early church systems, aimed to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secular society and focused solely on the God-human relationship. It was only when the medieval Roman Church expanded its political power and exerted widespread influence over social life that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were included within Christian ethics, creating a "cultural unity of Christianity an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 sociology".<sup>①</sup>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is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was that the medieval church controlled bo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with both willingly and completely submitting under religious authority. Additionally, the state saw itself as a tool for realizing the church's ideals.<sup>②</sup>However, Troeltsch sharply pointed out that in modern society, the power of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has also waned. This is not only due t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but also because modern society faces numerous complex problem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to cover the entirety of society and all its issues. Troeltsch believed that if one wants to address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using Christian principles, new ideas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e present social conditions must be introduced.<sup>③</sup>These new ideas are actually the independent science of sociology that emerg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examines various social phenomena and relationships through novel methods, going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church's social philosophy.<sup>④</sup>

T.C. Chao clearly recognized this issue and held an optimistic and open attitude towards it. Although he did not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logy and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he enthusiastically welcomed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of religion, believing that "illogical doctrines in religion naturally need to be logically

---

① Ibid,p.189。

② Ibid,p.11。

③ Ibid,pp.482-483。

④ Ibid,p.463。

criticized."<sup>①</sup> Furthermore, he welcomed the debunking of superstitions by natural science, promoting religious contemplation and awakening. As a result, Christianity has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science and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reforms in ideals and doctrines,<sup>②</sup> Various aspects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dogmatic theology of Christianity can be transform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getting rid of unnecessary elements without compromising its essence. In the renewed Christian community after self-renewal, Christians can live out the example of Christ in morality,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through worship and shared faith life. They can also extend the spirit, ethics, and mood advocated by Christianity and adap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beyond the church through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 and actions. Compared to Talcott Parsons' lament about the ineffectiveness of Christian social theory in modern society, T. C. Chao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impact of Christianity on the external society through the behaviors of believers and groups, adapting and changing along with the environment.

Although T. C. Chao call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s, supporting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criticism of theological doctrines, he still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dhere to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He opposes "followers of Jesus in a humanistic sense," "orators who focus solely on social service," and those who emphasize spirituality without discussing faith, considering them to be vague and confused.<sup>③</sup> T. C. Chao affirms the contributions of Christianity in education, healthcare, conceptual innov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after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However, he points out that these activities can be stopped and handed over to any organization for improvement and continuation. The one thing that the church must always do, always contribute to,

① 赵紫宸 Tzu-ch'en Chao, “促进宗教革新的势力” Cujin zongjiao gexin de shili [The power to promote religious innovation],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 [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 《赵紫宸文集》第3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anjuan [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 III],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27。

② Ibid, p.28。

③ 赵紫宸 Tzu-ch'en Chao, “基督教学生运动有方向么?” Jidujiao xuesheng yundong you fangxiang me? [Does the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 have a direction],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 [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 《赵紫宸文集》第4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ijuan [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 IV],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p.100-101。

is to lead people to God and become new creations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sup>①</sup>(40) This means that T. C. Chao has keenly captured the impact of modernity on Christianity and sees faith as the only way to respond. However, besides understanding the crisis and emphasizing the power of faith ,T.C. Chao is unable to propose a more systematic and specific response. While this may be seen as a shortcoming in his individual theoretical thinking, it reflects the overall crisis of relig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Renowned sociologist Peter L. Berger provides profound analysis of various responses of religion in the face of modernity ,namely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Judaism. He finds that these three major religions either have to maintain an "isolated" position from the real world to preserve/reestablish their unwavering belief in the divine and supernatural realm or they have to interpret their own explanatory system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pular "secular" worldviews using new reference points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rn worldview, thereby more or less removing supernatural elements from religious traditions .Berger believes that both strategies provide weak guarantees for religion to withstand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society. Setting aside the difficulty of forming isolated closed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high mobility and informatization, even if such communities are formed,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maintain a monopoly on the lives and thoughts of their members. While "submitting "to secular knowledge systems to package or transform the content of religion does reflect the adaptation of religion to modernity to some extent, focusing on knowledge of this worldly existence can also be obtained from fully secular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s, which ar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comprehensive .Therefore, this strategy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self-dissolution of religion and its theology.<sup>②</sup>

Therefore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T.C. Chao held an optimistic and open attitude

---

① 赵紫宸 Tzu-ch'en Chao, “基督教教会的意义” Jidujiao jiaohui de yiy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燕京研究院 Yanjing yanjiuyuan[Yenching Research Institute] 编:《赵紫宸文集》第4卷 Zhao zichen wenji disijuan[the Collection of Tzu-ch'en Chao,IV],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78。

② 贝格尔 P.L.Berger 著:《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Tianshi de chuanyan:xiandai shehui yu chaoziran zaifaxian[A Rumor of Angels:Modern Societ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Supernatural], 高师宁 Gao Shining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0-24。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and Christianity. Although he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centrality of faith in his thinking, he initi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adaptation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influence on society. However, as time went on, he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observing and evaluating social reali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hristian ethics. In the late 1940s, T. C. Chao advocated for the church to withdraw from society and return to emphasizing spiritual awakening, considering individual self-realization as the only viable method of influencing society. Therefore, Li Xiangping believes that in T. C. Chao's later thinking, the previously important and subtle relationships and patterns such as "in society," "within groups," "within culture," and "within ethics" are reduced to just "society," "culture," "groups," and "ethics," losing their significant "within" relationships.<sup>①</sup> This is not only caused by changes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reflects the general dilemma faced by Christianity and its social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is issue is necessary.

---

① 李向平 Li Xiangping: “‘社会中的社会’——赵紫宸的教会神学” *Shehui Zhong de shehui——Zhao Zichen de jiaohui shenxue*["Society within Society"——T.C.Chao's Ecclesiastical Theology], 李向平 Li Xiangping: 《文化正当性的冲突》*Wenhua zhengdangxing de chongtu*[The clash of cultural legitimacy], (上海 Shanghai, 百家出版社 Baijia chubanshe[Baijiao Press], 2006), pp.543-544。

## 即色游玄——支遁的玄佛融合思想 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

朱夏楠(宁波《文学港》)①

### 绪论

#### 第一节 缘起

“佛教确立，实自东晋。”<sup>②</sup>据《魏书》记载，汉明帝时佛教已开始传入中国，但佛教的影响力始终徘徊于沙门之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甚微。真正将其内化为中国主流思想文化一部分的，是东晋时。当时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僧人，游走于名士之间，支遁正是其中之一。他将佛教般若学与玄学思辨相融合，在佛教领域提出了“即色游玄论”，在玄学领域提出了“逍遥新义”，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融合了玄佛思想，在文学领域开拓出了新的空间。

支遁的玄佛融合思想，实则是当时处于碰撞中的社会思潮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思潮之一，是玄学的兴盛。汉末以来，朝局动荡，社会分裂，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得以松动，玄学在此期间得以兴起。到了东晋之时，更是一家独大，玄言清谈成为权贵名流交往中最为重要的活动。支遁正是凭借着自己在玄学上的独特见解得以游走于名士之中，成为权贵的座上宾。

思潮之二，是佛教的本土化。儒学的松动造成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空白，被玄学所补充。外来的佛教也在这间隙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僧人们不仅在般若学上各抒己见，展开激烈的论辩，而且为了更好地融入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弘法者也往往有意将玄学作为过渡的桥梁，以令佛教立足。

身处社会剧变、思潮激荡中的支遁，其本人深厚的玄学和佛学上的修为，又

① 朱夏楠，女，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作协会员，现为宁波《文学港》期刊编辑，作品见于《作家》《诗刊》《美文》《青年文摘》等。出版有《春秋：裂隙中的面孔》（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等。

②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

让这玄佛思想在他身上的融合成为了可能。他一方面以玄谈佛，所提出的“即色游玄论”，便是以“玄”指代“般若性空”；另一方面引佛入玄，解读庄子《逍遥篇》标有新义，为时人所推重。在诗歌创作上，他也卓有建树，被郑振铎赞誉“在诸和尚诗人是最伟大的一位。”<sup>①</sup>除此之外，支遁还留下了“养马”“放鹤”等妙事，更为其本人助添了魅力。

于佛教而言，支遁是一位高僧；于玄学而言，他是一位名士；于文学而言，他是一位诗人。集有三重身份的支遁，即便在俊杰林立的魏晋之际，也是光芒闪耀的存在。因此，无论从哲学史角度还是文学史角度看，支遁都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对象。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支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事迹、玄佛思想、诗歌创作这几个领域。

一、关于支遁生平事迹研究。支遁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世说新语》和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中，这两本著作往往成为后世研究支遁的切入点。如王晓毅的《支道林生平事迹考》<sup>②</sup>以支遁先后所居寺院为中心，将其一生分为六个时期。李正西的《支遁评传》<sup>③</sup>，对支遁的生平做了概述，并认为当卒于隆安三年（399年）以后。单鹏的《支遁卒年新说之商榷》<sup>④</sup>主要是对李正西《支遁评传》中提及的支遁的卒年提出了疑议，认为还是应该以学界公认的东晋太和元年（366年）为是。张建丽、李书吉的《支遁原籍辨析》<sup>⑤</sup>对史载的支遁的两个出生地进行了辨析，认为可确定为陈留而非林虑。孙明君的《兰亭雅集与会人员考辨》<sup>⑥</sup>认为支遁没有出席兰亭雅集的可能性更大。张富春《支遁集校注》<sup>⑦</sup>前言中认为南朝梁慧皎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② 王晓毅：《支道林生平事迹考》，《中华佛学学报》1995年第8期。

③ 李正西：《支遁评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④ 单鹏：《支遁卒年新说之商榷》，《求索》2010年第8期。

⑤ 张建丽、李书吉：《支遁原籍辨析》，《晋阳学刊》2010年第1期。

⑥ 孙明君：《兰亭雅集与会人员考辨》，《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3期。

⑦ （东晋）支遁著，张富春注：《支遁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2页。

《高僧传》中提及的支遁出生地之一“河东林虑”当为“河内林虑”。

二、关于支遁思想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对即色义及支理——支遁对《逍遥游》篇所注新义——的阐释上。关于即色义，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认为支遁的即色性空思想走的是唯心主义思想路线，和向秀、郭象的唯心主义玄学路线是基本一致的。杨曾文的《支遁佛学思想述要》<sup>①</sup>认为支遁的佛学思想带有鲜明的玄学色彩，其内容既包含了般若学说的哲理，也融合了阿弥陀净土信仰。关于《逍遥游》新义，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钱穆的《记魏晋玄学三宗》<sup>②</sup>对支遁的《逍遥游》新义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葛晓音的《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sup>③</sup>考察了玄言诗从道家之言向佛理的转化，认为支遁的《逍遥游》新义是其转化的关键。王颂的《支遁“逍遥新义”新诠——兼论格义、即色与本无义》<sup>④</sup>则整体考察其“即色说”与逍遥义的关系，并对陈寅恪格义说、汤用彤对支遁与向郭玄学关系的论述、即色义与本无义的关系、道安是否反对格义等问题进行了辨析。此外相关著述还有彭自强《支遁即色义试析》<sup>⑤</sup>、唐积柏《支遁“即色义”及其文化价值探析》<sup>⑥</sup>、李耀南《论支遁对“适性逍遥”的批评及其逍遥新义》<sup>⑦</sup>等。

三、关于支遁诗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通常将支遁的诗歌置于玄言诗和山水诗发展的框架之内，如张金海《从玄言诗到山水诗之我见——论晋宋之际的文咏因革》<sup>⑧</sup>认为山水诗与玄言诗之间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其中提及了支遁的《咏怀诗》，认为其主旨与当时的玄言诗一般无二，但是通过山水刻画展示出了思辨过程，并将玄趣外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蒋述卓的《支遁与山水文学的兴

① 杨曾文：《支遁佛学思想述要》，《五台山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钱穆：《记魏晋玄学三宗》，《庄老通辨》下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③ 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④ 王颂：《支遁“逍遥新义”新诠——兼论格义、即色与本无义》，《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

⑤ 彭自强：《支遁即色义试析》，《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⑥ 唐积柏：《支遁“即色义”及其文化价值探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⑦ 李耀南：《论支遁对“适性逍遥”的批评及其逍遥新义》，《哲学动态》2018年第11期。

⑧ 张金海：《从玄言诗到山水诗之我见——论晋宋之际的文咏因革》，《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起》<sup>①</sup>认为支遁用了“即色悟空”的方法来观察山水。此外的相关论文还有袁子微的《支遁及其诗文研究》、武金芝的《支遁及其诗歌研究》<sup>②</sup>等。

当然，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从总体上看，关于支遁生平的研究因史料所限，难以再做深入；关于支遁思想的研究著述最多，开展得也最为充分；而关于其诗歌的研究，呈现出深化和细化的趋势，留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本文立足于这三方面的内容展开，结合支遁的生平经历，分析他的玄佛融合思想，并考察这一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的体现。在其生平经历中，重在展现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在其玄佛融合思想中，围绕“即色游玄”思想和所注的“《逍遥游》新义”两者展开；在其诗歌创作中，主要结合其具体的作品阐述其中所蕴含的玄佛融合思想，并探讨其在诗歌发展史中的价值与地位。

---

① 蒋述卓：《支遁与山水文学的兴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

② 袁子微：《支遁及其诗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 第一章 支遁的即色义与逍遥新义

作为僧人，支遁在佛学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作为即色宗的代表，著有《即色游玄论》，对“即色义”进行了阐释。仅从其名“即色游玄”便可窥见其玄佛融合思想之一端——他将般若学中“空”的概念，以“玄”字做了指代。

这一做法与当时社会中玄学之风的盛行以及玄佛融合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事实上，支遁不仅在阐释佛教义理时自如地运用了玄学的概念，也在解读被玄学奉为至宝的《庄子·逍遥游》时，依托般若学理论提出了新解，被尊为“支理”，后代学者亦称之为“逍遥新义”。由此为玄学开辟了新境界，令孤高自许的名士们纷纷为之折服。

由佛而玄，由玄而佛，支遁自在地游走于两者之间。也许他未必是刻意地要用一者去解读另一者，两种思想浑融为一体于其身，他不过是在阐述时顺势而为。但是从客观上看，他的这一行为本身既助推了佛教的本土化，又令玄学的发展突破了理论的瓶颈，从而在两个领域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 第一节 玄学的产生与发展

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主要是对“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著作进行研究和解说。它的产生，既是先秦到两汉的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在东汉末年占据统治地位的经学衰落的背景下对其进行的反思与替补。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大批士大夫逃到江左，玄风随之扇至，并蓬勃发展，成为最为盛行的思潮。

玄学的核心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两者对立又统一。前者偏重于儒家所推重的社会秩序，强调一整套完备的纲常伦理的建构和维护；后者偏向道家，更强调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内在自然本性。同时两者又相互依存：违背自然的名教难以获得长久的拥护，违抗名教的自然则没有生存的土壤。

西汉时，两者的矛盾已见端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尽管彼时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主张建设合乎自然的名教。但事实上，道家核心中那否定礼教的一面并不符合统治秩序的要求，因而在实践中更偏

向的是儒道之异。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社会的分裂，名教更是成了统治者镇压异己的工具，大批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剧变中开始反思其合理性，追寻崩坏的根源，上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对“三玄”的研究由此兴起。

余敦康先生在《魏晋玄学史》中将玄学的发展分为正、反、合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应对的是不同时期的政治现实。

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何晏与王弼。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指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

正始年间是魏晋禅代的前奏。随着曹魏和司马氏权力斗争的激烈化，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已不复建安时的遒劲刚烈、慷慨悲凉，转为苦闷低沉。何晏作为曹魏政权的依附者，既无力扭转政治上的颓势，转而探求思想领域的变革，成为正始玄风的开创者。

何晏在《无名论》中提出：“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他认为老子与孔子的追求是一致的，都同于自然之道。他希望根据天道矫正被异化的名教，建立一个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可见他并不反对名教，而是主张名教应复本于自然。

王弼继何晏之后，进一步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在其所著的《老子注》中，将“立名分以定薄卑”说成是自然的体现，以顺应当时士族阶级已经形成、需要通过名教来获取政治地位的历史形势，同时为篡改曹操抑制名门大族的统治思想制造理论根据。他在何晏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儒道会通的理论。他提出“崇本以举其末”，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并力主将这一哲学理论推行至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之中。若是统治者能够按照社会自身的组织功能，自然地生发出一套适合的伦理规范，而非强行以行政命令来指挥社会运作，那么就可以实现上下有序、人人自适的和谐社会。

但正始末年的高平陵政变，意味着这个理论的破产。司马氏将名教作为剪除异己的工具，动用政治权力手段大肆屠杀。

第二个阶段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见识了司马家族的残酷暴怒后，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现实中的名教已经与自然完全走到了对立面，成了统治者党同伐异的工具。为了维护理想中的与自然

相结合的名教，他们与统治者所推行的名教进行了决裂，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将这个理念推到极致，便是对君主制度的批判与否定。嵇康认为“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太师箴》）阮籍则道：“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为此，他们崇道反儒，将自然与“名教”割裂。但这种理论注定不为现实所容，最后阮籍哭于歧途，嵇康绝于广陵。竹林玄学宣告失败。

第三个阶段以元康年间的郭象和向秀为代表，提出“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重新回归到了儒道会通的路子上。

关于郭象、向秀二人与《庄子注》的关系，《晋书》中有如下记载：

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象）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sup>①</sup>

元康玄学与竹林玄学最为根本的不同，就是对君主制度的肯定。《庄子注》中提出：“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主张在这个前提下，再委婉曲折地对君主提出要求，向自然靠近：“无心而付之天下”“善与不善，信之百姓”。希望当权者不要滥用权力，尊重百姓作为个体的意志。

竹林玄学的失败，已经宣告了超越名教去追求自然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要寻求两者的协调，只能是在名教之中去找寻自然之境。为此，这一时期的玄学一改竹林时期的激越，尽力避免触及统治者的逆鳞，企图找到新的生存空间。为此，《庄子注》中提出了“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对庄子的思想做了解读和评价。

“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遣而游谈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庄子注》中的这段话将庄子推崇为百家之冠，但强调它并非方外之物，依然立足于现实社会。“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生死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

<sup>①</sup>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至人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己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这段话进一步把庄子的思想与现实社会的伦理规范对应了起来，从自然的天地、万物、生死，论及仁义礼乐忠信慈孝等，认为后者也是人自然生发的本性。只要守护这些本性，就能实现“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的理想，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换言之，嵇康、阮籍追求的是精神境界，《庄子注》则在某种程度上庸常化了这种精神追求。从对现实的超越，转变为了对现实的适应与归依。

然而即便如此，在动荡离乱的时代背景下，这个已对现实做了妥协与屈从的理想也难以实现。很快，西晋灭亡，士族南渡，传承玄学的责任落到了东晋士人的身上。

同样，东晋的玄学也呈现出了与其时代相衬的特点。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班班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sup>①</sup>

玄学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中断，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相应的特点。儒学虽然是维护统治的思想基石，但门阀士族大多“由儒入玄”，玄学的风头盖过了儒学。只是在东晋之前，玄学理论内部关于儒道之间的关系已经过了充分的论证；到了东晋，玄学虽然作为一种思潮以清谈、论辩的方式盛行于士人的生活中，但理论上的发展陷入了瓶颈，难以为继。

其时，外来的佛教却如一阵清风，为这个渐已僵化的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大部分的名士“由儒入玄”大谈玄学时，还有一部分人致力于“引佛入玄”。支遁，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 第二节 支遁的生平与著述

关于支遁的记载，主要见于南朝梁慧皎所撰的《高僧传》和南朝宋刘义庆所撰的《世说新语》中，两者所述大体一致。从中可以得见其生平的大致轮廓：

支遁字道林，出生地有两种说法，河内林虑与陈留，两者都在河南境内。本

<sup>①</sup>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为关姓，二十五岁时出家，出家后改为支姓。家世礼佛，为人聪明颖悟，初至京师（建康，今南京），便得王蒙、殷融推赏。曾游至吴县，并留下了建支山寺等活动的记载。永和五年（349年），东晋起北伐之势，时局动荡，支遁南下会稽，此后便在江左一带活动。卒于晋太和元年（366年），葬地或云余姚坞中，或云剡县石头城。

支遁生逢刚刚历经了八王之乱的满目疮痍的西晋末年。他南渡的这一年，距离永嘉之乱（307年—317年）中的第一批衣冠南渡者，已过去了四十余年；距离东晋的建立（317年），也已有三十余年。在此期间，先行的南渡者，如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琊王氏，以郗鉴、郗超为代表的高平郗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等，已在江左经营有日。

支遁的足迹从中原来到江左，其背后是西晋到东晋的朝代更迭，以及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从前是西风压倒东风，如今却是东风压倒西风。西晋时的士族要依附权臣，而权臣基本都是宗室强王，这也是八王之乱发生的根由；而东晋时，士族成为了权臣，宗室反而要依附之。《世说新语·仇隙》中的一则故事便反映了这一变化：

王大将军执司马愨王，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当时不尽知也。虽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无忌兄弟皆稚。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昵，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sup>①</sup>

王大将军即王敦，世将是其堂兄弟王廙，二人均出自琅琊王氏。东晋建立之初，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此“王”指的便是琅琊王氏，王敦与其从弟王导一外一内，事实上掌有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权势。司马愨王即司马承，在王敦之乱时被杀，而司马家即便知道，也只能隐忍不发，唯恐引来更大的祸乱。

与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相应，门阀士族在思想文化上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sup>①</sup>（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玄学清谈之风得以盛行，凭借的也是他们的推崇与弘扬，是他们在清谈论辩中碰撞出了玄学的蓬勃生机。而支遁作为后来的南渡者，却得以游走于林立的门阀权贵之间，被奉为上宾，青眼相加。殷融将他比肩卫玠：“陈郡殷融尝与卫玠交，谓其神情俊彻，后进莫有继之者。及见遁，叹息以为重见若人。”<sup>①</sup>卫玠比王弼晚出，也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郗超在《与亲友论支道林书》中称道：“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sup>②</sup>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与支遁往来的王洽、刘恢、殷浩、郗超、王羲之等名士，几乎都有门阀背景，门阀之间又常彼此联姻，以巩固地位。在此择取几人略作介绍。

郗超为郗鉴之孙。郗鉴虽在事实上从未入主中枢，其家族地位也不能与王、庾等相比，但是他以三公之尊镇守京口十余年，时刻关系着中枢的动向，也是当时举重轻重的人物。此外，其家族与琅琊王氏有姻亲之好，如郗鉴的孙女郗道茂嫁于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为妻。王洽与王羲之，均出自琅琊王氏。前者为王导之子，后者为王导之侄。

除了与门阀士族交游外，支遁与帝王之间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支道林、殷渊俱在相王许。简文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峭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sup>③</sup>

至晋哀帝即位，频遣两使，征请出都。止东安寺，讲《道行般若》，白黑钦崇，朝野悦服。<sup>④</sup>

支遁并非出自门阀，为何能够令权贵大加青眼，并立于名士之列，为时人所推重呢？

一方面是统治者出于笼络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对佛教采取较为宽和

①（南朝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9页。

②（南朝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第161页。

③（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第94页。

④（南朝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第161页。

的态度。汉末以来，随频繁的战乱、朝代的更替而来的，是经学的衰落，人心的离散。人生的幻灭，反过来进一步促使社会走向不安与分裂。此时佛教正好可用以抚慰人心，加强对社会的管理。

另一方面，也与支遁本人引佛入玄，在名士们所热衷探讨的玄学上开拓出的新境界不无关联。而他的思想今天能为我们窥得一二，所借助的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包括他的著述以及时人对他的评价。

支遁本人的著作并不少，只可惜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张富春在《支遁集校注》前言中，较为翔实地陈述了支遁诗文的流传情况，此处择其大要述之如下。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记载：“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而到《隋书》时已有佚失：“晋沙门《支遁集》八卷。”其后在朝代更迭中散亡更多。明代辑佚有多个版本，可分为二卷本和一卷本两个系统。

二卷本以邵武徐氏业书初刻本《支遁集补遗》为代表，其卷末有蒋清翊题识，云：“余家藏明人钞本，尾有‘都穆藏书’朱印，仅二卷，凡诗文三十二首，似出后人钞辑。读罽经室《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又校吾郡支硎山寺刊本，其卷目皆与家藏本相符，知支公集存世者只有此本。”一卷本以皇甫湜所辑《支道林集一卷》为代表，与二卷本《支遁集》相较，皇甫刊本多出一篇《与桓玄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此书出自《弘明集》卷十二。

此外，书中列举道：“明清一些总集也收录有与辑本相当的支遁诗文。冯惟讷《古诗纪》卷四七《晋第十七》收录支遁诗计十八首，与诸钞、刊本同。释正勉《古今禅藻集》卷一除将此十八首悉数收录外，复收《文殊师利赞》、《弥勒赞》、《维摩诘赞》、《善思菩萨赞》、《月光童子赞》，计二十三首。相较辑本《支遁集》或《支道林集》，梅鼎祚《释文纪》卷七《晋五》复从《高僧传》辑出《与高骊道人论竺法深书》、《竺法护像赞》、《于法兰赞》、《于道邃像赞》，从《出三藏记集》卷八《序》辑出《大小品对比要抄序》。”<sup>①</sup>

### 第三节 支遁的即色游玄论

如前所述，在引佛入玄之前，玄学的发展已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东晋时，虽然谈玄之风盛行，但理论的内部驱动力已经不足，难以为继。而佛教，

<sup>①</sup>（东晋）支遁著，张富春注：《支遁集校注》，第45—46页。

尤其是时人对般若学的钻研，为其带来了生命的活力。

对佛教感兴趣的，不独僧人。当时的名士在谈玄之外，对佛教也多有涉猎，只是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模糊玄学与佛教之间的界限。以孙绰的《喻道论》为代表：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异物者也……

或难曰：“周孔适时而教，佛欲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礼，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sup>a</sup>

“周孔即佛，佛即周礼，盖外内名之耳”，他们并没有去辨析两者的区别，而是含混而过。事实上，连僧人也在有意识地将佛教往玄学上倚靠，并以此获得名士的认同与赞赏。南朝梁《高僧传》中也有如下记载：

晋沙门有支孝龙……时或嘲之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宗，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梵服，披绫罗？”龙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逾贵，无心于足而逾足矣。”其机辩适时，皆此类也。

……孙绰为之赞曰：“小方易拟，大器难像。桓桓孝龙，克迈高广。物竞宗归，人思效仰。云泉弥漫，兰风聆响。”<sup>②</sup>

支孝龙引用了玄学的概念，来为僧人的礼仪正名。但僧人们在努力向玄学靠拢的同时，其内部也就佛学义理开展了激烈的阐发和论辩，尤其是般若学研究，在这一阶段呈现出了蓬勃态势，在争鸣中不仅推动了佛学的发展，也从理论深度上助推了玄佛思想的进一步融合。

印度论师龙树所著的《大智度论》认为，般若学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是解说一切佛法的根据。般若，意为通过智慧到达涅槃（波罗蜜多）的彼岸。但“般

①（南朝梁）僧祐编撰，胡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北京：中华书局，第74—80页。

②（南朝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第149—150页。

若”不等同于一般的“智慧”，而是超越世俗、概括万物本性的形而上的概念。其中心思想是“性空假有”，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实在的自性，此为“性空”。然而“性空”并没有否认现象的存在，只是这种存在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其有也只是“假有”。“性空”和“假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这一时期的般若学，在外部与玄学相融合；在内部，则存在学派分化的情况。这些学派被概括以“六家七宗”之名。唐元康《肇论疏》中写道：

或六家七宗，爰延十二者，江南本皆作六家七宗，今寻记传，是六家七宗也。梁朝释宝唱作《续法论》一百六十卷，云宋庄严寺释昙济作《六家七宗论》。论有六家，分成七宗。第一本无宗，第二本无异宗，第三即色宗，第四识含宗，第五幻化宗，第六心无宗，第七缘会宗。本有六家，第一家分为二宗，故成七宗也。<sup>①</sup>

与后世严格的宗派不同，六家七宗属于学派的范畴。它的出现，“具有时代精神的象征意义，反映了印度佛教般若理论与中国玄学思潮之间的交流会通。就吸取和改造外来文化的角度说，六家七宗属于中国佛教学者（包括名僧和名士）独立研究佛学、建立自己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其意义不可低估。”<sup>②</sup>

这些僧人活跃于朝野上下，在玄学盛行的大势下扇动着般若学之风。《世说新语》中提及了四十余位僧人的言行，其中包括“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本无宗”的代表人物释道安，释道安的弟子、东林寺的住持释慧远，“识含宗”的创立者于法开等。其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即是支遁，他还与于法开有过激烈的辩论。《世说新语》中有如下记载：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荆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

① （唐）元康：《肇论疏》，《大正藏》45卷，第163页上。

② 潘桂明：《般若学六家七宗述论》，《佛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134页。

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sup>①</sup>

《小品》即《小品般若经》，支遁与于法开围绕着对这部般若学经典的阐述争夺着话语权。彼时在名士们中的声望，支遁占上风，于法开于是试图通过般若学上的论辩，驳难支遁，因他有备在先，一时得逞。从中既可见六家七宗内部的激烈碰撞，也能看到僧人们想要在主流阶层博得名声、争取一席之地的努力。

在与名士们周旋的众多僧人中，支遁显然是佼佼者，而他在佛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即色论中。余敦康认为：“在般若学的发展过程中，支道林的即色义超过了其他各家而接近于僧肇，应该列为六家七宗的最后一个环节。”<sup>②</sup>

支遁在《即色游玄论》中应是对即色义有过专门的阐释的，但因其已佚，只能从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的《支道林集·妙观章》或他人著作的引文中零星得见。

《支道林集·妙观章》曰：“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sup>③</sup>

这几句话当是对于“色即是空，色复异空”的疏解。色为现象，空为本体，“色即为空”与“色复异空”是两个命题。前者强调其统一，后者更强调两者的区别。“色即为空”，对应的是现象因缘起性，但同时也还有空色一体，色之中藏有真如之意。“色复异空”对应的则是色界与真如并不是直接对应的，俗谛不等同于真谛，不能认为捕捉到了现象，便掌握了真如。

因为更多的阐释没能留存下来，要进一步理解他的般若学思想，或许可以从支遁与其他般若学僧人的比较中去了解。吉藏在《中观论疏》中说：

一者关内即色义，明即色是空者，此明色无自性，故言即色是空，不言即色是本性空也。此义为肇公所呵。肇公曰：“此乃悟色而不自色，未领色非色也。”……次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论》，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游玄论，此犹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与安师本性空寂故无异也。<sup>④</sup>

①（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第92页。

②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71页。

③（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第89页。

④（南朝梁—唐初）吉藏：《中观论疏》，《大正藏》第42卷，第29页上。

他引用了僧肇的说法，认为支遁的即色义和道安的思想并没有差别。

道安是本无宗的代表人物。本无宗将般若学的本体定位为本无，以此来阐发般若性空。吉藏认为：“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道安强调“以无为本”，僧肇批评其“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冥无。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把现象也说成了无，而忽略了其现象性。《不真空论》中，僧肇也对支遁的即色义做出过批评。僧肇认为，色与空是一体两面的，而支遁所论，依然保持了色作为现象的假有，空得不够彻底，因此违背了般若性空的本义。

安澄在《中论疏记》中说：

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论》，云：夫色之性，色不自色；（色）不自（色），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彼意明色心法空名真，一切不无空色心是俗也。《述义》云，其制《即色论》云：吾以为即色显空，非色灭空。知不自知，虽知恒寂。然寻其意，同不真空。正以因缘之色，从缘而有，非自有故，即名为空，不待推寻破坏方空。既言夫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然不偏言无自性，故知即同于不真空也。<sup>①</sup>

《即色论》即《即色游玄论》，与吉藏不同，安澄认为支遁的思想已经超越了道安，而达到了僧肇不真空论的境界。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支遁“色复异空”理解各异。

吉藏和僧肇，都认为支遁所说的“色复异空”，强调了色与空的距离，造成了割裂。而安澄所论，则把“色复异空”与前文的“色即为空”相关联。换言之，色性本空是色与空相异的前提，支遁的即色义是在承认色空一体两面的基础上，讨论色界和真如的差距，而这样的讨论在支遁所处的时代有其现实意义。

对于当时的社会名士而言，般若学本身已显得陌生高深而难以企及。支遁的即色游玄论，为了让般若学便于被理解，不仅用了“玄”这个玄学概念指代“空”这个佛学概念，同时着力于现象、世俗一面，也更易被时人所接受。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般若学性空这个最核心理念，这又为引佛入玄，超越前人

<sup>①</sup>（日本）安澄：《中论疏记》，《大正藏》第65卷，第94页上一中。

在玄学上的认知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支遁将其“即色游玄论”与对《庄子·逍遥游》的具体研究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让东晋名士们耳目为之一新的“逍遥新义”。

#### 第四节 支遁的逍遥新义

在关于支遁的记载中，不少名士都将其与前辈玄学大家并论。如孙绰《道贤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人异时，风好玄同矣。”<sup>①</sup>将支遁与向秀相比拟。《世说新语·赏誉》：“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神心警悟，清识玄远。’”<sup>②</sup>王长史即王蒙，辅嗣指的是王弼。《世说新语·赏誉》中的另一则：“王、刘听林公讲，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复更听，王又曰：‘自是钵釭后王、何人也。’”<sup>③</sup>听支遁讲座的王、刘即王蒙、刘惔，认为支遁传承了王弼、何晏的衣钵。

他们在支遁身上看到了何晏、向秀、王弼等人的卓识光华，赞叹他在玄学上的造诣。但是令支遁在雅好清谈的名士中超拔而出的，是他对向秀、郭象解庄义的超越。《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的一件事可用来解释东晋名士何以会对支遁从不接受转为服膺：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sup>④</sup>

魏晋名士多自傲，何况是出自琅琊王氏的王羲之，他所在的家族在东晋建立之初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地位。他本人腹有诗书，长于清谈，孤高自许。

①（南朝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第163页。

②（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第191页。

③（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第196页。

④（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第89页。

因此尽管其时支遁已有令名，为人荐举，依然轻慢以待，直到谈及《逍遥游》，才心下大服。在此之前，向、郭之解被奉为圭臬。立场转变的机缘，在于支遁展现出了自己的才思见识与灿烂辞藻。

因支遁著作多亡佚，他对《逍遥游》的论述也仅存只鳞片爪，但从中亦可大概窥见他思想之超拔处。《高僧传》中记载了支遁解《逍遥游》的缘起：

遁常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纣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sup>①</sup>

东晋名士围绕《逍遥篇》展开的义理阐发，依然难以超拔郭象与向秀。而支遁对向秀、郭象的“适性逍遥”作了批判，见于《世说新语》：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sup>②</sup>

在注释中，刘孝标引了支遁的《逍遥论》：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鷖。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逍遥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遥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亡蒸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sup>③</sup>

① (南朝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第160页。

②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第88页。

③ 同上。

刘孝标随后评价说：“此向、郭之注所未尽。”<sup>①</sup>支遁所论，“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众人不得不由是叹服。

支遁对《逍遥》篇所做的新解被尊称为“支理”，后代学者对此各有不同的阐发。汤用彤先生认为：

有待者自足，无待者至足。支公新义，以为至足乃能逍遥。实就二家之说，去其有待而存其无待。郭注论逍遥，本有“至足者不亏”之言。支公曰：“至人乘天正于高兴，游无穷于放浪”，亦不过引申至足不亏之义尔。按佛经所示圣贤凡人区划井然，支公独许圣人以逍遥，盖因更重视凡圣之限也。<sup>②</sup>

并对此评价甚高：

此文不但释《庄》具有新义，并实写清谈家之心胸，曲尽其妙。当时名士读此，必心心相印，故群加激扬。吾人今日三复斯文，而支公之气宇，及当世称赏之故，从可知矣。<sup>③</sup>

钱穆先生则对支遁与向、郭的区别做了更为细致的辨析：

盖支遁之所异于向郭者，向郭言无待，而支遁则言至足。至足本于无欲，欲无欲，则当上追嵇阮，以超世绝俗为上。而向郭以来清谈诸贤，则浮湛富贵之乡，皆支遁所谓有欲而当其所足，快然有似乎天真也。游心不旷，故遂谓尺鷃大鹏各任其性，一皆逍遥矣。及闻支氏之论，遂不得不谓其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

盖当时名士所谓情性自得者，其内心不忘俗，浅薄率如是。

自此以往，庄老玄理，遂不得不让位于西来之佛法。<sup>④</sup>

与二人不同，陈寅恪先生引入了“格义”的概念，认为：

（支遁）则借用《道行般若》之意旨，以解释庄子之《逍遥游》，实是当日河外先旧之格义。但在江东，则为新理耳。<sup>⑤</sup>

陈寅恪先生在其《支愨度学说考》中对“格义”做了阐述：

① 同上。

②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5—56页。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8页。

d 钱穆：《庄老通辨》下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25—326页。

⑤ 陈寅恪：《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清华学报》1937年第2期，第313页。

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

广而言之，佛教中国化乃至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的中国化都可以称为格义。陈寅恪认为支遁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援佛入道。但具体表现在哪里，并未展开。

而汤用彤在《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一文中，对“格义”做了较为翔实的表述。他认为，“‘格义’是中国学者企图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第一种方法。”<sup>①</sup>并指出，这个名词和解说已见于南朝梁《高僧传》中的《竺法雅传》。

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乃毗浮相县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sup>②</sup>

汤用彤从中提炼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点：1、格义是教学弟子的方法。2、“‘格义’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习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sup>③</sup>3、“它不是简单地、宽泛地、一般的中国和印度思想的比较，而是一种很琐碎的处理，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观念或名词作分别的对比或等同。”<sup>④</sup>

具体到支遁的新义，从出发点上，汤用彤和钱穆大体围绕着“有待”与“无待”展开，认为支遁是在向、郭二人的理论上做了扬弃。与《庄子注》中写的“小大虽殊，逍遥一也”不同，支遁认为无论是大鹏还是尺鷃都没有达到逍遥之境。他的“至足”，是承接嵇康、阮籍的“以超世绝俗为上”的精神追求。他认为逍遥的境界是“明至人之心”方能达到的。而陈寅恪的说法，则认为支遁抛开了向、郭，直接引入了佛经的意旨来解读《逍遥游》，与般若学思想做了直接的对应。

较为一致的是，这几位学者都提及了此新义与佛学相关，后来的学者也多循此脉络进行研究。如葛晓音认为，支遁的逍遥新义是由道家之言转向佛理的关

① 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

② （南朝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第152页。

③ 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理学·佛学·玄学》，第283页。

④ 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理学·佛学·玄学》，第284页。

键，并指出：“郭象仍拘守庄子的‘无待于物’，而支遁则认为圣人‘物物而不物于物’。因为实际上，完全无待于物是连圣人也做不到的，更何况凭借特权，不能舍弃一切物质享受的士大夫们？所以支遁将无待和有待等同起来，首先强调要‘物物’，即凭借于物，有待于物；其次是在心理上不以物为物，把‘物物’和‘不物于物’等同起来。”<sup>①</sup>王颂则直接把这新义和支遁的佛学思想关联在了一起，指出：“尽管他以谈空的即色义名家，但他的思想意趣却不在一味破执的空上，他的著作中呈现出了以至无为本体、真空妙有的思想倾向。从其本体论哲学出发，支遁结合了庄学固有的对“心我”与“形我”的批判，以及般若学从色心二法的角度对自性实有的破执，他用外物、内心的二分论证框架替代了向郭的有待、无待二分框架，并引入了般若学无生、无住、相即等思想，这些都让人耳目一新，谓之‘逍遥新义’。”<sup>②</sup>

支遁在《逍遥》篇上提出的新解，能在他的即色游玄论中找到鲜明的理论渊源。所谓“物物”，即以物为物，承认人的世俗性，追求现实中的满足，是为“即色”；“不物于物”，则是对物质，对“色”的超越，意识到物质上的满足不过是“假有”，唯有如此，方能实现“游玄”，即领悟到般若性空的真谛。而唯有“明至人之心”，方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这一理论，承认了现实享受的合理性，让养尊处优的名士们得以从心理上接受，但这何尝不是对当时奢靡虚荣、惫懒堕落的风气的委婉批评呢？若是只强调“色即为空”，这些名士们或许很容易沉沦于世间性中，将俗谛直接对应为真谛；而“色复异空”则是一种警醒，让他们得以从空的维度来观照当下的自我，同时也拓宽了他们作为名士在精神世界中的追求。

正因为有着深厚的佛学和玄学修为，支遁才能在阐释庄子《逍遥篇》篇时解读出新义；正因为他的逍遥新义满足了当时名士们的精神需求，才会在社会上受到热烈的追捧。他的这一努力，不仅为玄学注入了新风，开拓了新的境界，同时也让外来的佛教得以在玄学的外衣下，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的主流思潮中，在本土化上跨出意义非凡的一步。

<sup>①</sup> 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第155页。

<sup>②</sup> 王颂：《支遁“逍遥新义”新论——兼论格义、即色与本无义》，《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第91页。

## 第二章 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诗歌实践

在名士、高僧之外，支遁还有另一重身份：诗人。其玄佛融合思想对诗歌实践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只是这影响几何，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的呢？这涉及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关系。早在战国时代，孟子提出了一套文学理论，即“知人论世说”和“以意逆志论”。

“知人论世说”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以意逆志论”出自《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这两者之间有着孰先孰后的微妙差异。后者要求读者超越文字本身去理解作者真正的意图，“志”为作者之志；而前者强调必须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他本人的经历、思想，才算是真正地读懂作品。

然而这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状态。作者与作品之间是有距离的，作者的思想会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作品中，也是难以言说的。所以陆游才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之感。作为读者，唯一能确定的、能接触的只有作品，也只能通过文字词句，去追溯作者之“志”。当然这种追溯不能是毫无根由的，在这个过程中，与作者相关的任何痕迹都应该作为线索以帮助指向正确的方向，而不至于失之太偏。

具体到支遁的诗歌，作为作者的支遁已经去世，即便他在世，当他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读时，他大概也只是读者之一，当然，与其他读者相比，与作品要离得更近。因此，在分析他所留下的诗歌时，本文主张的是从诗歌文本出发，结合其生平经历和思想进行解读，对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论证。换言之，“知人论世”是基于文本所做的参照，“以意逆志”是希望能够达到的理想。

### 第一节 支遁诗歌中的玄佛融合思想

玄佛融合是支遁思想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个特色也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在细读其作品后，可知诗歌中的玄学特色相对而言较好辨认，因其中用了大量的玄学词汇；而对其中存在的佛学思想，则需要做更多的辨析。

在此之前，先需对其“即色游玄论”中的“色”“玄”（空）所涉及的范畴做出界定。就“色不自有，虽色而空”而言，广义上论，所有事物，包括诗歌，包括诗歌中的每个句子、每个字，均包含“色”“空”，一体两面，诗歌自不待言。但如此无助于对诗歌及其思想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就“色复亦空”而言，两者之间又是有差异的。色更偏向于具体的、现象的、世俗的一面，而空则偏向抽象的、永恒的、形而上的一面——与玄学的指向一体。这也是玄佛得以融合的原因所在。

因此，在考虑到支遁诗歌“玄言”及其他词句背后可能存在的佛学思想的同时，也应意识到玄学思想并不是从属于佛学思想的次一级存在，而是与其佛学思想并驾齐驱的，两者有着同等的地位。如此才能更清晰地梳理支遁诗歌作品的玄佛融合特色。

### 一、咏怀诗

本文所涉及的支遁诗歌，所用的版本是张富春先生的《支遁集校注》，不再另外做注释。该书正文分上下两卷及补遗。而本文分析的对象主要是上卷的诗歌，而将下卷中的书、铭、赞作为参考。

上卷的内容包括《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土山会集诗三首》《咏利城山居》《咏禅思道人》《四月八日赞佛诗》《咏八日诗三首》《五月长斋诗》《咏大德诗》，共十八首。这些诗歌，从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咏怀诗和咏赞诗。

咏怀诗以抒发自我感怀为主，可以《咏怀诗五首》《抒怀诗二首》《咏利城山居》为代表。这部分也是支遁诗歌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

支遁在《咏怀诗五首》中数次提及了他个人的历程，以及不同人生阶段的心境。这五首，不仅大量地用到了老庄以及道教的概念，还化用了很多典故，玄言色彩浓郁。以《咏怀诗·其一》为例：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中路高韵溢，窈窕钦重玄。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壘壘沈情去，彩彩冲怀鲜。踟蹰现象物，未始见牛全。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

这显然是一首玄言诗，通篇所用的词语、典故，都可以在包括《诗经》《楚辞》等的典籍里找到渊源，其中涉及的“三玄”及其他的道家典籍为多，又以《庄子》为最。

比如“含虚”出自《老子》中的“致虚极，守静笃。”“象物”出自《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处，是故谓之象。”“逐物”与《庄子·天下》中“惜乎！惠子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相应。“逍遥”二字更是带有鲜明的《庄子》印记。《庄子》中不仅有专门章节《庄子·逍遥游》进行论述，这个词汇也见于其他篇章。如《庄子·天运》写道：“今子有大树……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见牛全”出自《庄子·养生主》：“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忘筌”出自《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玄学术语的借鉴、“三玄”典故的化用，都可以证明玄学对作者诗歌创作的影响之深。若是点到为止，单纯从玄学角度来解读，将这首诗歌作为支遁表达自我追求超然物外的逍遥之境，似乎也未尝不可。

但若是认为这密集的、浓厚的玄学作为外衣底下，游走的是支遁的佛学思想，也并无不妥。一是当时僧人为了让佛教思想更易被接受，谈佛论道时，惯常用玄言来指代佛教思想。支遁“即色游玄”，便是以“玄”代“空”。而一旦将诗歌中作为核心的“玄”理解为“空”，整个诗歌的面貌也就有了变化，生出新的味道——诗歌中所提及的年少的波折，后来的流离失所，以及修行中的种种心迹体悟，都是作为僧人的支遁的一种自我观照，是他“即色游玄”思想在诗歌中的表露。

因此，关键的枢纽在于对“重玄”二字的解读。这个概念在这首诗歌中以顶针的手法出现了两次，可见是诗人要表达的重心所在。

“重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原本无疑是玄学概念。但支遁的“即色游玄论”中，本就有意以“玄”代“空”。唐代清凉山大华严寺沙门澄观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卷一中指出：“言重玄者，亦即空空，语借《老子》。《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咏怀诗·其二》中：“涉老哈双玄，披庄玩太初。”这

里的“双玄”意即“重玄”。而在这一首中，还出现了“空”这个似乎带有佛学色彩的词汇。“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如同“玄”可被借用为“空”，这里的“空”亦可解释为“无”之意，两者是同义词的。其后紧接着的就是“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途”。两者之间同样是以顶针的手法，由“无”来衔接。与其“即色是空”的思想也是契合的。

《咏怀诗》其余三首以及《抒怀诗二首》中也都出现了“玄”这个概念。《咏怀诗·其三》：“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咏怀诗·其四》：“慨矣玄风济，皎皎离染纯。”值得注意的是，“染”是一个有着鲜明佛学色彩的词汇，丁福保在《佛学大词典》中解释为：“常曰染垢染污，不洁不净之意。”此外这首中还出现了“习本”这个佛教术语——“珈蓝：当知诸业有三因：习、本、有。”<sup>①</sup>《咏怀诗·其五》：“超超分（介）石人<sup>②</sup>，握玄揽机领。”这一首中，亦出现了一个佛学术语“化期”，即“坐化之期”。《述怀诗·其一》：“长想玄运夷，倾首俟灵符。”

《述怀诗·其二》：“总角敦大道，弱冠弄双玄。”

除了“玄”之外，“道”也是诗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玄，道，空，其实在诗歌中的内涵是相似的。只是“道”也好，“重玄”也罢，虽可被借用为“空空”，但未必一定是“空空”之意。

张富春先生在《支遁集校注》中，似乎有意地想要将支遁诗歌中的概念与其玄佛融合思想做对应。在注释中，同一个概念时常会尽量注明其在道家、儒家及佛家典籍中的应用。或是这些诗歌中玄学的印记实在太过鲜明，比重太大，为了平衡起见，除了诸如“染”“化期”“习本”之类的佛教术语外，对有些两可甚至渊源本与佛教无太大关系的概念，也会偏向其与佛教典籍的关联。

如《咏怀诗·其五》中的“愿得无身道，高栖冲默靖”，对“高栖”一词，张富春先生以梁朝慧皎《高僧传》卷四《竺潜伏传》中的“虽高栖之业，刘所不及”为解；对“冲默”，则引用了唐代道宣《广弘明集》中的僧肇《鸠摩罗什法师诂》、梁朝僧佑《出三藏记集》中收录的僧肇所作《长阿含经序》中的用语。《咏利城山居》中的“长啸归山林，潇洒任陶钧”，注释“陶钧”时引用了唐代

① （东晋）支遁著，张富春注：《支遁集校注》，第93页。

② 张富春在《支遁集校注》中认为“分”误，当作“介”。介石人，谓操守坚贞之人。见第98页。

沙门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史记》、杜甫诗等为解。但事实上，高栖本就有隐士之意，与支遁同时代的陶潜《饮酒》诗之九中有句：“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同样是陶潜的手笔，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道：“（孟嘉）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陶钧”则可以在《庄子·齐物论》中找到渊源：“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可见不涉及佛教也无损于诗意的理解。当然，词汇只是载体，在本土生长发育、积淀深厚的玄学有着天然的优势，外来的佛教要融入其中，借用并进而赋予其新的内涵，也在情理之中。张富春先生的这些注释对于了解佛教典籍对中国原有文化的吸收也不无裨益。

从整体上看，这一类诗歌中表现出的的是一个落于尘网，力求超脱的隐逸者形象。支遁所向往的，是“愿投若人踪，高步振策杖”（《咏怀诗·其三》），“愿得无身道，高栖冲默靖”（《咏怀诗·其五》），“长啸归山林，潇洒任陶钧”（《咏利城山居》）。历经人间风波，看惯万物变迁，他希望能回归山林，找寻精神的安居之所。

但是结合支遁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他的“即色游玄”思想，不能否认其中所蕴含的佛理。不仅玄言中含有佛理，而且文本中也涉及了不少佛教词汇，它们不仅点缀了诗歌，令其文本的表现更加丰富，也体现了支遁玄佛双运的深厚功底。尽管其中对般若性空的思想探讨得并不深入，但对于诗歌创作而言，这种延伸本就不是必须的。毕竟文学创作并非是理论著述。正如东晋的名士们在论及佛教时，其实并不关心般若学内部的理论，支遁在创作时，也没有必要去刻意区分两者，只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既是“咏怀”，更重要的是诗人自我表情达意的需要。回归到诗歌，若是以“得鱼忘筌”衡量之，佛理或玄言都是竹筌，支遁本人的情感与理想才是那条鱼。

## 第一节 缘起

“佛教确立，实自东晋。”<sup>①</sup>据《魏书》记载，汉明帝时佛教已开始传入中国，但佛教的影响力始终徘徊于沙门之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甚微。真正将其内化为中国主流思想文化一部分的，是东晋时。当时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僧人，游走

<sup>①</sup>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

于名士之间，支遁正是其中之一。他将佛教般若学与玄学思辨相融合，在佛教领域提出了“即色游玄论”，在玄学领域提出了“逍遥新义”，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融合了玄佛思想，在文学领域开拓出了新的空间。

支遁的玄佛融合思想，实则是当时处于碰撞中的社会思潮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思潮之一，是玄学的兴盛。汉末以来，朝局动荡，社会分裂，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得以松动，玄学在此期间得以兴起。到了东晋之时，更是一家独大，玄言清谈成为权贵名流交往中最为重要的活动。支遁正是凭借着自己在玄学上的独特见解得以游走于名士之中，成为权贵的座上宾。

思潮之二，是佛教的本土化。儒学的松动造成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空白，被玄学所补充。外来的佛教也在这间隙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僧人们不仅在般若学上各抒己见，展开激烈的论辩，而且为了更好地融入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弘法者也往往有意将玄学作为过渡的桥梁，以令佛教立足。

身处社会剧变、思潮激荡中的支遁，其本人深厚的玄学和佛学上的修为，又让这玄佛思想在他身上的融合成为了可能。他一方面以玄谈佛，所提出的“即色游玄论”，便是以“玄”指代“般若性空”；另一方面引佛入玄，解读庄子《逍遥篇》标有新义，为时人所推重。在诗歌创作上，他也卓有建树，被郑振铎赞誉为“在诸和尚诗人是最伟大的一位。”<sup>①</sup>除此之外，支遁还留下了“养马”“放鹤”等妙事，更为其本人助添了魅力。

于佛教而言，支遁是一位高僧；于玄学而言，他是一位名士；于文学而言，他是一位诗人。集有三重身份的支遁，即便在俊杰林立的魏晋之际，也是光芒闪耀的存在。因此，无论从哲学史角度还是文学史角度看，支遁都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对象。

## 二、咏赞诗

如果说咏怀诗更专注于支遁个人在尘世中的历练，以及对高远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玄或佛是两可的，展现出的是一个名士的形象，那么在咏赞诗中，支遁更多展现出的则是一个高僧的形象，用诗歌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佛教徒对佛学的倾慕以及在佛学上的修行与精进。尽管这些诗作中同样洋溢着玄言的色

<sup>①</sup>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彩,但这些玄言显然是围绕着佛学展开、为其服务的。

这类诗歌包括《咏八日诗三首》《五月长斋诗》《土山会集诗三首》等。

有的以礼赞佛祖、佛教为主,如《咏八日诗三首》。《百丈清规》卷一有云:“月旦、月望、初八、廿三,四斋日。”八日为斋戒日,可见这三首均与佛教斋戒相关。

《咏八日诗·其一》:

大块挥冥枢,昭昭两仪映。万品诞游华,澄清凝玄圣。释迦乘虚会,圆神秀机正。交养卫恬和,灵知溜性命。动为务下尸,寂为无中镜。

“大块”出自《庄子》,指大自然;“两仪”出自《周易》,指天地。在这天地自然间,万物自由生长,生机勃勃,为释迦摩尼的到来营造出庄严华美的氛围。在其感召之下,自己也进入了凝神恬和的境界,终得以脱离躯体,领略到寂静空无之美妙。

《咏八日诗·其二》:

真人播神化,流淳良有因。龙潜兜术邑,漂景阁浮滨。伫驾三春谢,飞辔朱明旬。八维披重藹,九霄落芳津。玄祇献万舞,般遮奏伶伦。淳白凝神宇,兰泉涣色身。投步三才泰,扬声五道泯。不为故为贵,忘奇故奇神。

这一首以华丽的辞藻表现了个人在斋戒过程中精神上的历程。用了很多具体的物象来展现抽象的神思的游走、净化,很好地展现了支遁“即色游玄”的思想:他写明媚的物象,着力描写它们,最后依然是要脱离它们的,即“不为故为贵,忘奇故奇神”,超脱出万物的分别,找到唯一的、永恒的智慧所在。

《咏八日诗·其三》:

缅哉玄古思,想托因事生。相与图灵器,像也像彼形。黄裳罗帕质,元服拖緋青。神为恭者惠,迹为动者行。虚堂陈药饵,蔚然起奇荣。疑似垂曦微,我谅作者情。于焉遗所尚,肃心拟太清。

这首主要是表达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恭敬之情。诗歌围绕释迦牟尼象的制作而展开，细致地描写了其衣着冠冕的颜色材质，由外在的象进而写其神采，认为他是世人应当学习的楷模，能够救治世人出离苦海。

有的侧重于表现自己在修行中的体验以及对佛教的理解，试以《五月长斋诗》为例。佛教中的三长斋月指的阴历正月、五月、九月三个月份。这首诗的背景是夏令开始、天气转热的五月长斋日：

炎精育冲气，朱离吐凝阳。广汉潜凉变，凯风乘和翔。  
 令月肇清斋，德泽润无疆。四部钦嘉期，洁己升云堂。  
 静晏和春晖，夕阳厉秋霜。萧条咏林泽，恬愉味城傍。  
 逸容研冲蹟，彩彩运宫商。匠者握神标，乘风吹玄芳。  
 渊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长。壘壘罗摩虚，德音畅游方。  
 罩牢妙倾玄，绝致由近藏。略略微容简，八言振道纲。  
 掇烦练陈句，临危折婉章。浩若惊飙散，囿若辉夜光。  
 寓言岂所托，意得筌自丧。沾濡妙习融，靡靡轻尘亡。  
 萧索情牖颓，寥朗神轩张。谁谓冥津遐，一悟可以航。  
 愿为海游师，棹柁入沧浪。腾波济漂客，玄归会道场。

这首诗歌将时节的变迁，景物的荣衰，与修行者内心的感受紧密结合。虽然用词和典故很多依然出自玄学典籍，如“匠者”、“寓言”等，但这些始终是围绕着个人的修行体验展开，用以形容修行过程中的感受以及所达到的境界。它们只是披着玄学的外衣，内核是佛学。或者说，这些词汇在这首诗里产生了新的生命力。如在《咏怀诗·其一》中表达为“所贵在忘筌”，与其本义“得鱼忘筌”相去不远，而“意得筌自丧”的立意更进了一步。但与原本目的性强烈的动作不同，在诗句中将“筌”作为了“丧”的主语，更彻底，更自然，更形象地展现出了修行之美妙，与般若性空的境界相暗合。

看似枯寂的修行，在诗歌里被支遁写得光华灿烂。修行者内心的经历的曲折与收获的美妙在他的笔下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无论是春晖还是秋霜，无论炎热或清凉，繁华或萧条，这一切都是“色”之表征，为修行者必须经历而又希冀超

脱的“筌”。最后的归旨，则是成佛，是开悟之后，救众生于苦海。

如上所述，无论是咏怀诗还是咏赞诗，支遁一以贯之地表露着自己修道求玄的决心。所不同的是，在咏怀诗中，这种追求多指向山川自然，为了摆脱世俗而倾向于隐逸生活，展现出了作为名士的风采。而在咏赞诗中，引领他前行的高蹈理想具象化为了佛教理念，展现出了作为高僧的风范。无论是名士还是高僧，支遁将自己的情感以及对玄学、佛学的理解融会于斑斓多彩的玄言以及凝练高深的佛学术语中，显露出了作为诗人的灵气与才华。

## 第二节 对玄言诗的突破

玄言诗兴起于西晋末，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这是当时士人好谈玄风在诗歌创作上的表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引《续晋阳秋》时，更详细地追溯了玄言诗形成的历史及其后的流变：

（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sup>①</sup>

“三世之辞”指的是佛教的轮回思想，指代其教理教义，与“至过江，佛理尤盛”相呼应。许询与孙绰为一时文宗，而支遁虽然在文中没有被提及，但据陈允吉先生所言：“而名僧支遁尤开东晋时代风气之先，询为当时援佛入玄的带头人物，又是许、孙等人精神上的导师。”<sup>②</sup>孙绰、许询的玄言诗大多湮没散失，所留不多。

但是《续晋阳秋》的这段话中遗漏了两个重要的人物：阮籍与嵇康。葛晓音在《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历来的说诗者从未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用玄言抒情说理的风气实由正

<sup>①</sup>（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徐传武点校：《世说新语》，第107页。

<sup>②</sup>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始诗人阮籍、嵇康首开其端，晋宋人因之而视他们为玄言诗的远祖，这无疑是正始玄风直接影响文学的结果。”

因玄言天然带有的思辨色彩，自其诞生以来有谈玄说理的弊病存在。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批评的：“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是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如第一章第一节中所述，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阮籍与嵇康不满于黑暗的现实，始终生活于忧患之中，无法自主的黑暗环境的压抑，激发了他们作为个体的生命意识，并在诗歌中表现出对生死、是非、浮沉、贵贱等命题的追问。运笔之间，不乏玄言，如“死生自然理”“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遗物弃鄙素，逍遥游太和”“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等，干瘦无味。但是他们有真切的现实关怀，将诗歌作为表达自我的一个符号，寄托了深沉的情感；没有就玄理展开大篇幅的论述，而是凭借着足够的才华平衡情与理，令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充沛生命情感结合于诗歌之中，因此玄言诗的弊病并不突出。

过江之后，玄风大畅，玄言诗也随之盛行。大量玄言诗虚浮无物，才招致了钟嵘的批评。但转机也因佛教的介入而出现。随着玄学与佛学的融合，玄言诗展现出了新的特色。引佛入玄，不仅为僵化的玄学理论注入了活力，也为枯燥无味的玄言诗带来了新意。当时涌现出了一批既有文学修养，又熟悉玄学清谈的名僧，如竺道潜、慧远等，支遁正是其中之一。

支遁的诗歌对玄言诗的突破，也是对钟嵘所言关于玄言诗的弊端的突破。钟嵘对玄言诗的批评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自正始以来，关于生死、忧患等的探讨一直是玄言诗的重要命题，有绝望中的与世沉沦，也有幻想中的隐逸飞升，但这些命题不仅在后来的创作中被模式化的呆板艰涩的玄言词汇所束缚，在思想上也陷入了停滞。而支遁的“即色游玄”思想不仅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丰富了玄言诗的理趣，唤醒了生命中的另一种可能，而且他还在笔下倾注了自己的生命体验，辅之以过人的才华，使得诗歌气韵生动，极富感染力。以《咏怀诗·其二》为例：

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辔，领略综名书。涉老哈双玄，披庄玩太初。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俯欣质文蔚，仰悲二匠徂。萧萧柱下迥，寂寂

蒙邑虚。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涂。道会贵冥想，罔象掇玄珠。怆怆浊水际，几忘映清渠。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

这首诗中充斥着大量的玄言，但读来并不觉得枯燥无味，而是追随着诗人的思绪，与之一起俯仰天地，感其所感，悟其所悟。

开篇塑造了一个孤独的求道者的形象，而后描述了这个求道者在修行中的心路历程。阅读老庄时也曾产生过愉悦之情，但这种愉悦并不能抵消在生命流逝中的那中悲伤。庄子、老子，如今安在？“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但继而笔锋一转，“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涂”，从时光流逝、人事易迁的感伤中超脱了出来。这种超脱，是感悟到万物性空的超脱，既然性空，悲伤自然也就可以坦然以对了。最后的“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既包含了道家的离尘绝俗之意，亦是般若学的由色而空的另一种表达。

由此可见，一方面，支遁的“引佛入玄”为诗歌带来了新的生机。新鲜的佛教词汇的加入，以及原有的玄学词汇的新义，带来了诗歌的陌生化<sup>①</sup>效应。这种陌生化打破了阅读中的惯性与惰性，生成了另一重的阅读愉悦体验。更重要的，则是其中佛理与玄理融合所生成的新的理趣，让诗歌的境界得以在玄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另一方面，支遁对情感的把握，以及运笔的才华，让其诗歌能够跳脱出“析理”的枯燥而显得骨肉丰匀。伴随着不同的修行过程，人物的情感在不同阶段经历了孤独、恬愉、悲伤、寂寞、安宁。而即便最后“与神明居”的安宁，又再次强调了“人事”之萧索，可见其情感的表达不是线性的，而是富有层次感的。与此同时，支遁还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和表现方式，让诗歌灵动起来。对仗，如“涉老哈双玄，披庄玩太初”“萧萧柱下迥，寂寂蒙邑虚”等；顶针，如“消液归空无，无矣复何伤”，以“无”连贯，让行文运气更加畅达；反问，如“无矣复何伤”；此外，叠词、虚词错落其间，更让诗歌整体上呈现出张弛有度、错落有致的面貌。

可见，就思想境界而言，支遁的诗歌中跳跃着的般若性空的思想，与玄学思

<sup>①</sup> “陌生化”是俄国文艺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想相融合，造就了新的理趣。就文本表现而言，情感的丰沛与辞藻的讲究，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对支遁诗歌，后人也有很高的评价。马一浮云：“林公诗为玄言之宗。义从玄出而诗兼玄义，遂为理境极致。林公造语近朴而恬淡冲夷，非深于道者不能至，虽陶、谢何以过此。”<sup>①</sup>他将支遁的诗歌称为“玄言之宗”，认为其高度与陶渊明和谢灵运相当，这主要就其思想境界与艺术风格而言。而支遁与谢灵运在诗歌上的关联不止于此。

清代诗人沈曾植在《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中又说：“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又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说：“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一语道破支遁诗歌与山水诗之间的关联。

### 第三节 为山水诗之先声

关于山水诗的产生，影响最大的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的这段话：“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关于此论，后世有不同的解读。有持肯定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挥发的，如清代的沈德潜认为：“《明诗篇》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见游山水诗以康乐为最。”<sup>②</sup>也有对山水诗的起源时间持有异议的，如钱锺书认为：“山水方滋，当在汉季。”<sup>③</sup>并以荀淑和仲长统为例：“荀以‘悦山乐水’，缘‘不容于时’；统以‘背山临流’，换‘不受时责’。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sup>④</sup>然而文中只提及了两人乐山好水之行，与诗歌无涉。另还有先秦说、建安说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山水作为意象早在先秦诗歌诞生时就已出现，但山水

① 丁敬涵：《马一浮诗话》，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② （清）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32页。

③ 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36页。

④ 同上。

诗作为诗歌的一个类型，有其独特的定义。陶文鹏和韦凤娟认为：“山水诗，就是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诗歌。山水诗并不仅限于描山画水，它还描绘与山水密切相关的其他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称之为山水诗，只是中国古代诗学约定俗成的概念”<sup>①</sup>。在玄风盛行之前，虽然很多诗歌中也出现了景物描写，但视野多局限于宫室楼台；而随着政局的动荡，不少官宦士人转而投向山林，隐逸之风兴起，山水才逐渐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得到重视。

政局的动荡，玄风雨隐逸之风的盛行，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出现，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而玄言诗与山水诗，两者更是有着交互的空间。如葛晓音所言：“正始以来，玄言文学和山水诗已先后在玄风影响下产生，到东晋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多数作品中的玄言就是将山水玄理化和佛理化，这样就必然形成玄言诗赋中夹杂着山水描写的特色。”<sup>②</sup>

玄言诗重在谈玄说理，其中的山水也成为了诗人阐发自然之道的意象。刘宋时的画家宗炳在《画山水诗序》一文中写道：“夫圣人以神发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试以支遁《咏怀诗·其三》为例：

暕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尚想天台峻，仿佛岩阶仰。冷风滴兰林，管籁奏清响。霄崖育灵藹，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苍苔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化士，外身解世网。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隗隗形崖颓，罔罔神宇敞。宛转元造化，缥瞥邻大象。愿投若人踪，高步振策杖。

这首诗歌中的天台山，俨然是诗人心所追求的玄圣之道的化身。为此，诗人用华丽的辞藻详细地描写了各种美好的景物，冷风、兰林、丹沙、芳芝……仅仅是这些物象的存在，已经烘托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天台妙境；而这些物象，又不仅仅只作为物象而存在，诗人将它们作为玄圣之道的化外，赋予了其灵性。“霄崖育灵藹，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山水之道，与玄佛之道，

<sup>①</sup> 陶文鹏，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页。

<sup>②</sup> 葛晓音：《老庄告退山水方滋——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第73页。

得以互通。

支遁在模山范水上下了极大的笔墨，但是山水并不是他的旨趣所在。写山水，是为了写其求佛问道。这也是玄言诗与山水诗最为根本的区别。但是如果将其中的玄言成分弱化，就不失为一首优秀的山水诗。在《土山集会诗三首》的序言中，支遁写道：“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静拱虚房，悟外身之贞；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可见亦是游览山水之作，只是因其中蕴含的玄佛之理，所以归类于玄言诗。因此，不妨将支遁的诗歌视为山水诗之先声。

若是与谢灵运的诗歌作对比，两者间的关联或许更见明晰。

谢灵运出身门阀士族，但仕途失意，转而寄情山水。而且他本人与支遁一样，都是玄佛兼修。他最为著名的诗歌是《登池上楼》，可与支遁的《咏怀诗·其三》相互参照：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池上楼在庄园之中，严格来说，并非山水。但彼时的门阀士族，地产雄厚，庄园之中往往也囊有山川。而且诗人在此所寄托的，与对朝堂相对的山水的寄托别无二致。抛开池苑与山水的具体物象区别，归旨是一致的。

与支遁的诗歌相比，有两处较为明显的区别：一、支遁的诗歌，修道之路再曲折，最后都能达到一个理想的归宿，为心目中的玄理所引领，因而其基调总体是向上而行、向道而行的，显得明快宁静。而《登池上楼》中，虽然也有玄理的成分，如“进德智所拙”，但都是围绕着自己的苦闷心绪展开的。而这种愁绪并不期待通过修道开悟而得解。“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进退两难，挣扎徘徊。二是对于山川景物的描写，二人都不吝笔墨。但支遁笔下的景物似有灵性，带有玄妙的色彩；而谢灵运的笔下，它们是诗人用以转移自己愁绪的一个客体，带有情感色彩，却与玄思距离远甚。或者说，谢灵运有意地将自己的情感以景物的方式做了外化处理，将之作为凝视自我的一个投射。山水与自我的分离，也让

山水诗得以脱胎而出，成为独立之一体。

但在这些不同之外，又显然存在着不少相近之处。比如对景物的描摹，在个体生命意识的强调，对隐逸的向往，以及因诗人的才华而彰显出的辞藻的美丽与文气的畅达。

由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支遁的诗歌何以为山水诗之先声。

一、支遁诗中对山水的描写，令人神往，这本身对山水诗的发展就是一种助力。如萧驰认为：“支遁的诗展开了一个更为蛮荒亦更为寥廓的山林世界。诗中塑造的形象冥迹于云岑之中，愈使人感到山林本身的意义。”<sup>①</sup>在认识到山林的意义之后，将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行创作也就成为了可能。

二、支遁的诗歌中游动着他的即色思想。“色即是空，色复异空”，具体的物象与抽象的玄理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支遁很注重在各色山水物象上寄托他的玄妙哲思；而山水诗，也是在对山水的观照上有所寄托。

三、注重文采。支遁在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对山水物象的描摹细致而富有光彩，这在后来山水诗的发展中也得到了延续。

---

<sup>①</sup> 萧驰：《佛法与诗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32页。

## 结语

“敦之觉父，志在婴儿”。

这是支遁《座右铭》中的最后一句，也是整篇铭文的归旨所在。觉父指的是佛陀，如支遁在《阿弥陀佛像赞》中写道：“觉父<sup>①</sup>喻予而贵言，真人冥宗而废翫”。婴儿则出自《老子》，指的是道家追求的本真状态。老子对其极为推崇，数次提及：“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这或许也可作为支遁对玄学和佛理的态度：两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都是其修道目标，是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没有界限，才是真正的融合。

正是因为达到了玄佛融合的境界，支遁才能从容地游走于两者之间，在玄佛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这一思想渗透至了他的文学实践之中。他所开创的“即色宗”位列“六家七宗”之一；他的《逍遥篇》注解标新理于向、郭之外，被尊称为“支理”；他的诗歌创作，既富有哲思，又有着高超的文学价值，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不容低估的价值。

支遁的这些努力和成就，无论就理论而言还是就实践而言，都有效地弱化了外来的佛教为本土文化所接纳的障碍，令其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他本人也借此确立了自己在世间的三重身份，熠熠生辉于史册：高僧、名士、诗人。但正如玄佛无需分别，这三重身份也不过是游玄之色，一如他在诗歌中所倾心描绘的山水景物。“色即为空，色复异空”，这些身份重要，但或许没那么重要。

<sup>①</sup> 原文为“学文”，当为“觉父”，见张富春《支遁集校注》第400页。



## 历史地理专题





## 20世纪初期西方摄影师在川藏地区的摄影活动与殖民主义话语研究

孔晓萌（浙江海洋大学）<sup>①</sup>

### Western' s Photography Activ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early 20 Century

**内容摘要：**20世纪早期，西方殖民主义浪潮汹涌发展，起社会兴起异域文明的探索。1900年-1937年间，以西德尼·甘博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摄影活动家频繁活动于中国川藏地区进行了大量人类学与社会学拍摄，并留下丰富影像资料。甘博等人通过大量拍摄川藏地区民众的衣食住行、谋生手段、边缘人等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习惯，与西方摄影团在非洲和美洲等地的影像拍摄活动一起，为西方构建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材料基础。本文利用馆藏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杜克大学的一批影像资料为研究对象，运用跨学科的视觉文化理论与殖民理论对其进行视觉分析，通过对西方社会在川藏地区的拍摄活动进行研究可知，历史照片既保留了当时川藏地区珍贵的自然、社会历史瞬间，又受到拍摄者的主观目的、审美习惯以及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物质现实与秩序想象交织的特点，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进行集体想象、试图垄断话语权的一种表现方式。

**关键词：**川藏地区 清末民初 西德尼·甘博 影像史料 殖民主义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estern colonialism surged and its societies began to explore foreign civilizations. From 1900 to 1937, a group of Western photographers such as Sidney Gamble traveled to the Sichuan-Tibet region of China frequently, where they conducted a large number of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photos, and left a wealth of image data. Gambo and others took a large number of photos of the people's

<sup>①</sup> 孔晓萌，女，河南南阳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从事文化史、教育史研究。

clothing, food, housing, transportation, livelihood, and daily life and behavioral habits of marginalized people in Sichuan and Tibet. Together with the image shooting activities of Western photography groups in Africa, America and other places, they constructed a colonial discourse system for the West. Using image materials collec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Duk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visual culture theory and colonial theo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m, and explain the shooting activities of Western society in China. Historical photos not only retain the precious natural and social historical moments of Sichuan and Tibet at that time, but were also affected by the subjective purpose, aesthetic habits and popular ideology of the photographer at the tim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weaving of material reality and orderly imagination.

## 引言

外国传教士对川藏地区的探索兴趣由来已久,由于清朝没有建立成熟的科学研究机制,<sup>①</sup>川藏乃至边疆地区是西方势力可进入的空白区域,是传统上消失在民国统治者眼中的地区,也是思想的空白区域。政治当局的软弱与变化无常,思想理论上的缺乏混乱使得这一片区域对于西方来说大有可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等理论在科学的包装下进入到中国的视域内,成为衡量现代性的标准机制。外国游历者中不乏地质学家、博物学家,他们科学的背景可较好地弥补传统文献缺乏准确数据,以想象迷信来记述事物的缺陷。

本文所依托的20世纪早期中国川藏地区的影像史料,主要是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1917年6月至9月同居住杭州的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F.费奇(Robert F. Fitch)、牧师约翰·H.亚瑟(John H. Arthur)一起深入到四川西北部羌、藏居住的边远山区,拍摄的数百张关于当地人民的生活、劳作、文化和风俗的照片。现在可在杜克大学图书馆网站上查阅<sup>②</sup>。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藏“国际传

---

<sup>①</sup> Benjamin Elman, "China and the World History of Science, 1450 - 1770," *Education about Asia* 12, no. 1 (Spring 2007): 40 - 44.

<sup>②</sup> 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影像集, 见 <http://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

教士影像档案”（International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IMPA）<sup>①</sup>项目，收集了 1860-1960 年欧洲、北美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拍摄记录的影像。其中在中国地区拍摄的有 12406 幅，这其中四川地区 786 幅，云南地区 40 幅，西藏地区 9 幅。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外收藏的中国历史影像得到在各个大学、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整理和公开，它们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辅助信息。

本文所主要依赖的文化理论一为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视觉文化理论。西方现代视觉研究的先驱是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他将符号学、结构主义引入到影像研究中，促进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大众文化研究和影像语言解读。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明室》<sup>②</sup>、《显义与晦义》<sup>③</sup>、《符号帝国》<sup>④</sup>等。另一位重要的视觉文化研究学者是英国艺术史家 E.H.贡布里希（E. H. Gombrich）。贡布里希主要从心理学入手解读图像的含义，进而分析图像被人们理解的方式，分析图像在寓意、象征的社会功能，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sup>⑤</sup>。

二为萨义德所著的东方主义理论体系。萨义德认为，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东方学”（Orientalism）是一种西方人轻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欧洲对东方文化及其历史的关注是因为“有助于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sup>⑥</sup>，是“（欧

① 南加州大学“国际传教士影像档案”，见 <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landingpage/collection/p15799coll123>

② [法]罗兰·巴尔特：《明室：摄影札记》，赵克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③ [法]罗兰·巴特：《显义与晦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

④ [法]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

⑤ [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杨成凯等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将摄影作品作为一个视觉话语系统，综合运用图像学、符号学手段围绕“视觉现代化”（Visual Modernity）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这方面，由 Getty 艺术研究中心出版的《笔刷和快门：中国早期影像》一书从社会学、影像人类学、艺术史多个角度切入，阐述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表述方式的戏剧性转变，细致分析了早期中国摄影在视觉文化研究的语境下呈现的多种权力关系的可能性，展露了视觉性和现代性研究的视角。彭丽君的《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探讨了视觉文化与现代性转向的相互关系，分析在特定文化背景中视觉材料对现代文化主体的建构过程，关注中国社会视觉现代性形成的社会因素。书中涉及到摄影、石印、电影、戏剧、广告等不同种类的视觉材料。

⑥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 2 页。

洲)在东方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符号”<sup>①</sup>，“东方学”是由西方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包含着西方对东方上千年认识的积淀，并成为了一种知识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sup>②</sup>。

西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率先开始了利用影像史料研究西方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殖民地形象，为本文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思路。德国历史学者西斯·赫弗(Sissy Helff)和斯特方尼·米歇尔(Stefanie Michels)编著的《全球化影像：记忆·历史·档案》<sup>③</sup>旨在研究殖民地影像在西方社会“全球观念”塑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英国历史学者詹姆斯·瑞安(James R. Ryan)所著《帝国的图像：摄影与大英帝国的视觉化》<sup>④</sup>中认为，摄影在帝国想象的地理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再现了帝国想象中的地理场景，而且利用广泛的科学、艺术、商业与政府的大量论述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帝国。美国学者莎拉·弗雷泽(Sarah E. Fraser)发表的《中国的面貌：摄影在塑造形象中的作用1860-1920》<sup>⑤</sup>提出，分析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外国影像塑造了中国人“野蛮”、“未开化”的形象，并且深刻影响到了之后西方中国形象的认识。这些研究对本文有相当的启发。

## 第二节 图像的历史分析法

现代影像理论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图像分析方法。图像的意义区别于文字的意义，它是由一系列镜头语言构成，解读影像意义必须回溯影像的生成和流通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也要关注图像拍摄者本身的主体特征以及对拍摄对象的选择和表达模式。当代摄影艺术理论认为照片的“真实性”是极端片面的。照片中保留了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瞬间，从物质存在的角度说照片的内容是真是存在

① 同上，第8页。

② 同上，第9页。国内学者在后殖民主义民族形象研究领域中也有所建树，如周宁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周宁认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

③ Sissy Helff, Stefanie Michels, *Global Photographies: Memory - Histor - Archives*, Transcript-Verlag, 2017.

④ James R. Ryan,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⑤ Sarah E. Fraser. *The Face of China: Photography's in Shaping Image, 1860-1920*, Getty Research Journal, No.

的。这也是影像文本具有实证意义的内涵所在，它一定是对其时其地的客观现实的捕捉，我们通过照片可以观察到拍摄对象在当时时空下的所有表层符号。但是照片有自身的影像语言和表意逻辑，简而言之是对“事实的简化”<sup>①</sup>，“（摄影的真实性）是一种偶然性”<sup>②</sup>。瞬时的、个体的影像记录具有极端的表象性，是基于历史场景被摄影师“引用”<sup>③</sup>所得来的，由摄影师基于自觉不自觉的心理动机创造出的能够引发观看者主观想象的符号系统。它是摄影师强加给拍摄对象的一种组合秩序，永远无法等同于拍摄客体。

图像分析要素包括：影像的题材、构图、用光等技术层面特点，以此揣摩拍摄意图，还要包括拍摄对象的神态、状态分析与拍摄者的关系。正是因为影像语言具有极端的表象性，单从个别的、具体的照片信息入手很难落实到一个规律的、实证的意义，必须在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全部中、外影像资料，将具体的镜头语言解读与统计归纳的方法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总结出研究对象的阶段性特点，最后形成系统的影像语意信息以供研究。当代历史学研究更加着重挖掘影像媒介本身的潜力，流通方式和照片拍摄的原因。当代史学关注照片的文化意义，包括它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话语中的意义，以及它的政治内涵。

照片在物质层面上是具体历史的表象，在描述层面含有社会观念的印迹。这就要求历史研究在涉及到影像材料的时候必须充分尊重和利用影像的这些本质特征。蕴含在影像背后的具体信息是历史活动的落脚点，影像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空隙张力和辩证统一为影像史学研究提供了空间和前提。对照片的解读，是以其意义的生成性和主观性为前提的。如果单纯将照片视为客观存在的镜像，对其意义的阐释将不能进行，影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阐释价值将无从谈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照片失去了它的证据性和纪录性。照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都要纳入影像史学的考量中。

由此，我们可以将影像作为历史证据，解读历史的一种手段。最重要的是

---

① [瑞士]约翰·伯格，[法]尚·摩尔：《另一种影像叙事》，张世伦译，台北：城邦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19页。

② [法]罗兰·巴特：《明室》，赵克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③ [瑞士]约翰·伯格，[法]尚·摩尔：《另一种影像叙事》，张世伦译，台北：城邦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8页。

展示它的真实意义,以及意义的产生方式。作为对象的照片已经过了充分的语境化,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分析。“影像观察”的简单概念已成为包含生产者,出版商和观众的互动过程。照片中的符号——即概念化、归类后的照片内容的元素——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下得到不同的解读。从中我们能认识到图像组织知识和编织意义网络的方式。因此,将符号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可以揭示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照片最有可能的预期意义。

### 三 以西方人在川藏地区的摄影活动为案例

在理解了解读照片的要素和方法之后,本文试图以20世纪早期西方摄影师对中国川藏地区进行的拍摄活动及其生产的照片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这批照片背后的历史情境。

#### (一) 摄影师活动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大量西方摄影师来到中国进行拍摄,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影像资料,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英国摄影师约翰·汤普森(John Thomson, 1837-1921),以及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 1844-1929)等。西方人在川藏地区的拍摄的影像,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观察和认识的视觉文化传统的影响。最早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拍摄活动的西方人是法国外交官方苏雅(Auguste François, 1857-1935),他在1896年-1904年居住在中国,先后被任命为法国驻龙州领事和法国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西德尼·D·甘博(Sideny D. Gamble, 1890-1968)是美国社会学家和业余摄影师,他曾于1908年、1917-1919年、1924-1927年、1931-1932年四次来华。在华期间,他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工作,担任社会调查和教育方面的干事,在职务之余对中国城乡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甘博在中国拍摄了5231张照片和彩印幻灯片(其中黑白照片4671幅,手工上色幻灯片460幅,包含在朝鲜、日本、俄国和美国拍摄的小部分照片),由其后人捐献给杜克大学图书馆。甘博1917年进入川藏地区拍摄。根据笔者统计,甘博在川西地区拍摄的有529幅。甘博的镜头尤其关注在历史剧变对区域社会的影响,表现出他敏锐的学术直觉和人文关怀。史

景迁曾赞誉甘博是“足以代表中国一个时代和文化的西方摄影师”。<sup>①</sup>

从来华摄影师的身份上看，他们一部分是受雇于西方的图片社的职业摄影师，他们镜头下的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需要满足西方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需求。随着摄影技术的革新，特别是19世纪末小型照相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机会拍摄和留下照片。流传至今的绝大多数历史照片都是由业余摄影师所拍摄，他们的主要职业往往是来华传教士、学者、官员，记者，或者身兼数职。从拍摄活动上看，他们的拍摄活动是服从于他们的职务需求的，或需提供给西方政府及图片公司、或致力于人类学研究之用、或是传教功能做所需；从其产物——照片上看，其艺术完整性不及职业摄影师，受自身主观拍摄需求和兴趣偏好影响更多。但是在对西方视角的反映上，是与时代趋同的。并且非职业摄影师所受到的美学训练较少，更不容易形成固定的拍摄习惯与审美偏好，从而更加直接的表现西方对中国的观察视角。

## （二）照片内容的选择与表达

### 1. 展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人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西方人首先观察到的对象，也是传播到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知识的主要内容。在早期来华传教士和画家留下来的中国图像中，不少是关于中国生产、劳作的场景如耕犁、纺纱、编织等，以及对中国特有的生产工具如独轮车、水车的描绘。这些关于生产劳动的图像资料能够带来关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直接信息。在这种的视觉文化影响下，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生产劳动场景的影像表达已形成了特定的模式。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西南部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前工业时代，生产力水平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货物的运输方式无外肩扛马驮，运输道路也是相对原始的泥土路和石板路。西人影像对这一地区交通运输状况的呈现，往往通过拍摄人货对比强烈的运送场景和较为特殊的运输方式，来凸显生产方式的原始性。

图 1<sup>②</sup>是传教士摄影师爱德华·曼利在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拍摄的照片，

<sup>①</sup> [美] 史景迁：《甘博在中国》，见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夏晓霞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4 页。

<sup>②</sup> 图片见南加州大学“国际传教士影像档案”：<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82839/rec/1>

内容为两个背运竹编背篓的男子。从照片的背景和道路情况来看应该是在农村地区。从被拍摄者的姿态可以推断,很有可能是摄影师叫住了两位正在赶路的男子,并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中最为突出的部分显然是男子背上层层叠叠的背篓。摄影师也是出于对这一点的关注才拍摄了这张照片,并将背篓置于画面构图的正中心。他特意在文字说明中写道“这些竹篓被将被运送到灌县的市场,照片背景中有吊索桥。在灌县附近一条河边的道路旁,两名男子的背部高高堆叠着编织的背篓。”<sup>①</sup>

同样的场景时常出现在西人的镜头下,在曼利拍摄的另一幅照片(图2<sup>②</sup>),同样突出了搬运货物夸张的尺寸。类似这种头顶货物的图像,常常见于西人的照片中,如恩斯特·威尔逊在茂县拍摄的“三个运茶的男子”(图3<sup>③</sup>)。通过大量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头顶货物”的这一特殊的运货方式成为西方人重要的关注点,形成了一种符号化的影像表达模式。

20世纪以后美国与欧洲国家已经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机器文明”道路上来。“头顶/背负”货物这种独特、原始的代表中国乡村地区原始运输方式的对于来自美国出身巨贾的甘博而言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些货物运输的照体现了西方摄影师对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观察,对关于该地区落后、原始的群体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2.选择底层人群

聚焦社会底层群体,表现他们的贫穷的生活状态和身体形象,是西方人重要的拍摄题材。如这幅甘博拍摄于瓦寺土司官寨的羌族妇女照片(图4<sup>④</sup>)。照片中妇女和儿童头戴民族传统的头巾,女性倚靠在农舍的木柱边上,旁边的儿童衣衫破陋,背负着更小的孩子。两个拍摄对象呈现出丰富的可供解读和联想的表情。

乞丐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群,西方人对乞丐的拍摄,往往采用近景特写的方

<sup>①</sup> 同上。见南加州大学“国际传教士影像档案”: <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82839/rec/1>

<sup>②</sup> 图片和文字见南加州大学国际传教士影像档案”: <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82866/rec/236>

<sup>③</sup> 见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图书馆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 Eastern Asian Historical Photograph Collections, Photographs of Ernest Henry Wilson - 1910-1911, 编号 W293682\_1

<sup>④</sup> 图片见杜克大学西德尼·甘博影像集: [https://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18B-174/](https://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18B-174/)

式，聚焦乞丐身体的残疾部分。例如曼利拍摄的一名乞丐（图5<sup>①</sup>），照片的文字描述为“‘残废的乞丐’，一名身体残疾的男子每只手中握着石头或木头的手柄，显然用作移动的支撑物。”显然这名残疾人特殊的行动方式引起了拍摄者的兴趣。又如传教士摄影师阿奇博尔德·亚当斯（Archibald Adams）在雅州（今雅安）拍摄的这名乞丐（图6<sup>②</sup>），着重突出了他头上巨大肿块。不管是俯拍的视角抑或面部表情的局部特写，都让人很容易将他们的身体缺陷和悲惨的社会境遇联系起来。

### 3. 聚焦罪犯、刑罚

中国社会的刑罚一直是西方视觉文化中野蛮、落后东方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带着刑具的犯人、或者正在执行的斩首场面都不乏在西方镜头中出现。这些照片所隐含的是中国政府机构和官方的形象。民初动乱的社会环境削弱了地方精英的控制力，社会秩序相对混乱。地方政府会使用公开行刑的方式来威慑土匪流寇地痞。除了刑罚手段原始和野蛮之外，照片之中往往并没有体现出有效的、正面的官方形象，（这可能与民初军阀混战，频繁革命导致的地方权力的空白有关。）这使得照片的观看者难以将刑罚手段与法律、法治等现代观念联系起来。如图7<sup>③</sup>，甘博在四川拍摄的两位服刑的犯人拉拽树枝，着重突出了这种相对原始的刑罚方式。

### 4. 体现西方元素

西人影像中的西方元素也是表现该地区族群形象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一类照片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的直接体现。

第一类照片，是直接对比相同类别的东西方元素，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展现出突出的视觉张力。如图8<sup>④</sup>中甘博拍摄的同行的摄影师向中国人展示照相机，记录下三位中国男子好奇围观的神态。西方人拍摄的中国影像有一个常见的场景，即一群中国人好奇、迷茫地面对镜头。这一类型照片中，出场或未出场的照相

① 图片见南加州大学“国家传教士影像档案”：<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82848/rec/220>

② 图片见南加州大学“国家传教士影像档案”：<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53138/rec/9>

③ 见杜克大学西德尼·甘博影像集：[https://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32A-172/](https://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32A-172/)

④ 见杜克大学西德尼·甘博影像集：[https://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18B-179/](https://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18B-179/)

机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入侵者，参与了记录普通的中国百姓对于西方事物的态度。

第二类是间接反映西方因素在中国影响的照片，这一类照片一般出现在传教士摄影师的镜头中。如卫理公会传教士肯尼斯·梅（Kenneth William May）拍摄的云南的一户基督教家庭（如图9<sup>①</sup>）。照片中男主人身穿汉族的长衫，女主人身着少数民族服饰，所有人物都衣着考究，表情自然而欣慰。画面中间摆放着西式的座钟。照片反映出这是一户家境殷实的家庭。照片的文字说明写到“Ee氏夫妇一家，我们 Universal Spring 教会的成员”<sup>②</sup>表明了人物的基督教徒身份。其中的东西方元素（如中式家具和西式座钟）与人物表情等内容，将西方的技术产品以及更重要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家庭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充实联系起来。这些元素体现了一个隐而未发的含义，即富足殷实的中国人主动接受了西方的宗教和科技。与这种场景产生强烈对比的，是西人镜头中未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普通中国家庭的肖像照，如另一幅幅拍摄于松潘地区的藏族家庭合影（图10<sup>③</sup>），一家三口站立在简陋的帐篷前，表情拘束，衣衫破旧。又比如教会学校孩童和老师的合影，照片中儿童衣着整洁，整齐排列，与其他照片中孩子们简陋的衣着和呆滞的表情产生了强烈对比。这些照片在暗暗提醒观看者，西方人给中国社会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然而，我们并不能直接得知是否是基督教信仰为这家人带来了幸福，或者“未开化”的藏族家庭生活不易，而是西方摄影师通过这些画面诱导观众得出上述结论。

### （三）照片所呈现之特点

贫困、落后是川藏地区族群形象最大特征。几乎所有普通民众的照片都表现出这一特点。直接表现贫困落后的，简陋的衣着，破败的居住环境，原始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方式，以及极为有限的家庭财产，这些都是西方人照片中最为常见的元素。另外是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精神空虚，缺乏秩序，对于“文明”事物的迟钝。这一特点主要是通过人物表情来表现的，且刻意表现中国人在面对西方

① 图片见南加州大学“国家传教士影像档案”：<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48553/rec/44>

② 原文为：Mr & Mrs Ee and family. Members of our church at Universal Spring. 来源同上。

③ 见南加州大学“国家传教士影像档案”：<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83077/rec/103>

文化时的好奇或愚钝的场面，不论是面对摄影镜头，还是唱机，甚至是西方人自身。将西方人最熟悉的“现代文明”事物与中国人的陌生感联系在一起，塑造出一个隔离于“文明”之外的人群的集体特征。而事实上，对于陌生事物的无知、好奇甚至恐惧乃是人之常理；西方人的这一观察视角，本质上是西方的自我认知和定位的体现。

西方人影像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和政府形象是：社会治理混乱，政府能力不足，统治方式野蛮，社会发展停滞。相对于个人形象而言，“社会”和“政府”是抽象的概念，在照片中不能直接出场。历史照片中的国家社会形象是在结构性的人物形象与现代社会观念的有机联系中概括、归纳出来的。例如，西方人镜头中大量出现的乞丐（照片聚焦他们残疾的身体部位），流浪的儿童，或者承担重体力劳动的老妪，这些照片让人心生怜悯的同时，也让人得出对本地区政府缺乏能力的相关结论。这种“弱势群体观察法”，在新闻摄影、社会纪实摄影中一直被广泛运用，它的“以偏概全”的能力已成为影像叙事的基本特征之一。此外，西方摄影师拍摄的川藏地区的士兵，呈现出的混乱和不专业，其本质也是政府能力不足的体现。而对枷锁、肉刑以及砍头等刑罚的拍摄，则帮助塑造了该地区野蛮、原始的统治方式，直接反映出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的认识。

#### 四 照片的历史语境

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认为，对某一民族“体质特征”的描述并不尽然是客观的身体内外特征表述，社会文化的主观因素在选择、想象和建构典型族群形象特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明珂将民族特质特征的想象与建构称之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影响该民族的体质构成内涵”<sup>①</sup>。影像史料所体现的族群形象，也无不体现了社会文化的集体“选择、想象和建构”，特定形象在生成和流传过程中被意识形态化。

##### （一）职务需求和拍摄目的不同

摄影师的身份特征对其拍摄动机有决定性的影响。萨义德说，“（西方人）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其次才是具体的

<sup>①</sup>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页。

人。”<sup>①</sup>强调了政治倾向在西方人的主体性中的显著地位。本文涉及到的西方摄影师均为业余摄影师，在拍摄活动之外，他们还有着各自的主要身份。如方苏雅和魏司是驻华公使，恩斯特·威尔逊是植物学家，西德尼·甘博是社会学者，爱德华·曼利是传教士。不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学术目的，西方摄影师总是在寻求差异化的观察视角，一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元素才是他们努力挖掘的。因此，西人镜头往往聚焦于“头顶货物”这种夸张的运输形式以及乞丐的身体缺陷部分。对于传教士团队而言，他们不仅仅要通过“落后、贫穷”的影像内容来表现殖民地民众亟待救助的形象，而且也拍摄有关“整洁、规范的教会医院和学校”或者“幸福的信徒家庭”之类的照片来反映活动成果，用明显的对比来表达殖民地民众“从野蛮到文明转变”的复杂信息<sup>②</sup>。

## (二) 意识形态差异

从更长时段的东西方视觉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西方摄影师的川藏影像，可以看到，西人镜头下的川藏族群形象是对西方“中国形象”观念的继承，是殖民主义视觉文化的具体体现。

西方人对川藏族群形象的认知是西方对中国长期观察和认知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创作的绘画、照片和其他材料如游记、报道和学术研究，共同在西方人观念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中国形象。周宁认为，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向传统、话语体制有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使得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出“稳定的、共同的特征”<sup>③</sup>。西方关于中国的视觉形象方面有两个重要的源头：一是近代以来与欧洲“中国观”变化密切相关的中国人视觉形象的发展史；二是在9世纪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摄影文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视觉表达，包括以“科学考察”为目的的人类学、民族学摄影。从纵向上看，这些影像材料中包含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社会自16世纪以来对中国的认识和观念沉淀的结果；从横向上看，欧洲视觉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作为西方世界

<sup>①</sup>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页。

<sup>②</sup> 有关传教士拍摄的殖民地影像背后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英国历史学家T·杰克·汤普森(T. Jack Thompson, 1943-2017)以欧洲传教士团队在非洲拍摄的影像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见T. Jack Thompson, *Light on Darkness? Missionary Photography of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12.

<sup>③</sup> 王寅生编《西方的中国形象》(上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序，第1页。

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构成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特别是殖民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些影像形象不仅构建出一个“西方优于东方”的视觉符号表达体系，并且参与到了中国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基本认知和判断之中。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印象是已经固定的，先验的。摄影只是为了佐证之前的刻板印象。19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表述逐渐固化和模式化，诸如停滞、落后、专制的国家形象，残缺、劣等的民族性格等等，成为了这一时期西方人认识、表达、演绎和建构中国形象的标准范式。种明显的优劣论是19世纪种族主义观念的体现。周宁认为种族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人种的优劣体现在生物学层面，民族的优劣体现在文化和精神层面”<sup>①</sup>。另一方面，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与“民主、进步、文明”的西方现代性完全相对立的，西方观念中的“中国”是西方生成的关于现代性“他者”的“一整套规训知识、发挥权力的表述系统”<sup>②</sup>，不仅为西方现代性的自我认知提供了想象基础，也论证了殖民扩张和“西方中心论”的合理性，为西方控制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撑。

西方人观念形成了对中国形象的固有认知，而长期、系统地输入带有一定特征的中国影像也反过来维持和强化了这一文化传统。国内学者对近代西方人来华游记的研究发现，“精英哲学与大众传说层次上的中国形象，构成旅行者的见闻的期待视野”，他们来到中国不是“发现”什么，而是“证实”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例如“孟德斯鸠说中国是用棍棒统治的专制帝国，他们就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严刑酷法的资料”<sup>③</sup>。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西方人的拍摄思路。美国艺术史学者莎拉·弗雷泽（Sarah E. Fraser）认为，西方人拍摄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像尤其具有一种普遍性，集中体现在与“暴力和服从相关联的负面的、异域的形象”<sup>④</sup>。这一形象特征在西方人对川藏地区的观察记录中得到了继承。因此，西人影像中体现的川藏族群形象不是孤立的，这些形象在视觉传统上属于西方对“东方/异域”长期观察的一部分，在思想文化上属于西方根据自身文化诉求塑造的“中国

①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6页。

② 王寅生编著：《西方的中国形象》，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周宁序，第11页。

③ 王寅生编《西方的中国形象》（下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526页。

④ Sarah E. Fraser, The Face of China: Photography's Role in Shaping Image, 1860-1920, Getty Research Journal, No. 2 (2010), p. 39.

形象”的一部分，统一于西方现代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构成的整体之中。

19世纪强势的工业文明和殖民主义文化此时仍余威不减，一些以科学研究为出发点的学科如民族学、人类学和测量学等，很大程度上扮演者为西方殖民主义开疆拓土的角色。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西人对东方的影像记录都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偏见，但是西方人拍摄、制作的东方民族形象，几经流传，出现在西方社会的媒体和普通民众面前时，很难不沾染上或者迎合西方社会对东方的偏见或模式化观念。西方摄影师所塑造的中国川藏地区的族群形象，旨在满足西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需求，用以佐证、衬托或者反衬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正统性和合理性，是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有目的的侵犯。<sup>①</sup>西人镜头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和边疆民众形象深刻地契合了这一需求，并统一于西方对东方殖民地社会的想象整体之中，进而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支撑材料。

## 五 结论

西方摄影师通过聚焦各种前现代的生产方式、贫困的生活状态以及残疾体征、刑罚等内容主题，使得这一地区的族群形象呈现出“落后、贫穷、野蛮”的负面特征。

这首先是西方摄影师在这一区域进行拍摄的目的和出发点不同，其次是客观因素如拍摄状态、与拍摄对象的沟通关系等对照片内容产生影响。其根源在于西方摄影师受到其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西方影像中川藏地区族群形象之所以如此呈现，本质上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对中国边藏地区的刻板想象。西人影像中体现的川藏族群形象在视觉传统上属于西方对“东方/异域”长期观察的一部分，在思想文化上属于西方根据自身文化诉求塑造的“中国形象”的一部分，统一于西方现代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构成的整体。

影像并非完全客观的，体现了被摄影师强加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受到当时的时空因素诸如社会关系、田野关系、审美取向、拍摄目的的影响。影像的史学考察需要将照片看做拍摄者意图的生成物。拍摄活动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和客观实在的反应，它们受到技术的制约，也受到当时的审美习惯、拍摄传统、观看兴趣

---

<sup>①</sup> 王晓德：《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第511页。

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摄影活动由此具备了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

## 参考文献

- [1]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 [3]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4]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5]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6] 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 [7] 王寅生编著《西方的中国形象》[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
- [8] [法]罗兰·巴尔特:《明室:摄影札记》[M],赵克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9] [法]罗兰·巴特:《显义与晦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 [10][法]罗兰·巴特:《符号帝国》[M],孙乃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 [11][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M],李申,王遵仲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 [12][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M],杨成凯等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 [13][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 [1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5][美]史景迁:《甘博在中国》,见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M],夏晓霞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

[16] Christopher Pinney. *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1.

[17] James R. Ryan,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8] Jeffrey W. Cody and Frances Terpak, *Brush and Shutter: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M], Getty Publications, 2011.

[19] Michael Aris,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M],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 南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僧侣群体探析

陈名扬（宁波财经学院）<sup>①</sup>

### A Study on the Buddhist Monk Community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内容摘要：**在南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僧侣数量众多，以中日禅僧为主体。南宋宁波海丝中国僧侣主要来自长江流域相关省份，宗派上多系禅宗临济宗、曹洞宗，又以临济杨岐系为大宗。自1208年至1264年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宁波禅宗发展达到历史顶峰，诞生了大量巨匠，海内外学徒云集天童、育王两寺。南宋宁波海丝域外僧侣主要来自日本，他们久慕南宋江南禅风之盛，以系统学习宋禅及“五山文化”为目的，经明州与博多间定向航线入宋。日僧在甬留学时间一般五六年，长则十多年，回国后在传教方面多有较大成就。南宋宁波海丝中外僧侣在精神思想方面具备寂默自省、脱落明白、悲智双运、利乐有情、一气契同、千差一家等共通特质，对以“五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南宋，宁波，日本，禅宗，五山文化

**Abstrac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numerous Chinese and foreign Buddhist monks on the Ningbo Maritime Silk Road, most of whom were Zen monks from China and Japan. The Chinese monks related to the Ningbo Maritime Silk Road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inly came from provinces related 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Most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Linji and Caodong sects within the Zen sect, with the majority belonging to the Yangqi sect in Linji.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from 1208 to 1264,

<sup>①</sup> 陈名扬（1991—），博士，宁波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东亚海域文化交流史。本文系宁波市2023年度第二批市哲社规划课题（年度申报课题）“南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人物群体研究”（课题编号：G2023-2-72）的研究成果。

Ningbo Zen Buddhism reached its peak in history, giving birth to a large number of great Zen monks. A large number of monks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were concentrated in Tiantong Temple and Ashoka Templ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foreign monks who came to Ningbo were mainly Japanese. They had long admired the prosperity of Zen in the Jiangnan regio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wanted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Song Dynasty Zen and the Wushan Culture. Therefore, they sailed to China via a directional route between Mingzhou and Boduo. Japanese monks usually study abroad in Ningbo for five to six years, and for as long as more than ten years. Most of them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missionary work after returning to Japa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monks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piritual thinking, such as silent introspection, insight into truth, disinterested wisdom and compassion, to bring benefits and peace to all living beings, and all under heaven are one family. They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discourse, represented by the Wushan Culture.

Key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Ningbo; Japan; Zen; Wushan Culture

南宋时代的东北亚区域，诸国共享的高级意识形态为儒学和佛教，均来自中国。相比面向现实社会需求、与民族文化特性直接关联的儒学而言，超越了现实社会、追求精神自觉的佛教更有跨越民族国家的吸引力。也正是南宋，在经过唐、五代系统化沉淀转化后的中国化佛教流派——禅宗，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生长力量。一方面，禅宗以江南为中心，大范围进行传道活动，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与热情扶持；一方面，作为集神秘严肃与直白亲民于一体的新佛教，受到了日本、高丽等国僧俗的瞩目与崇敬。

中国佛教禅宗东传，是南宋东亚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对于东亚海域以“宋型”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心理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具有超越时代的深远意义。而浙江宁波（南宋时先后称明州、庆元府，即今宁波，本文统称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东亚港城之一，同时身为南宋时代东北亚第一大港城，在中国佛教禅宗东传的进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因此，宁波不仅在中国范围内有“东南佛国”的美誉，更在彼岸日域有着“圣地

宁波”的尊称。

一切思想文化创造、交流及融通的主体都是人。正是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通过多维互动，才促成着价值认识的趋近，以及共同话语、心理及社会习俗的形成。在南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文明大通道上，往来碧海蓝天、历经鲸波鼉浪的最重要的人物群体为中外僧侣。他们是南宋东亚诸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代表着当时东亚国际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本文拟在南宋宁波海丝人物传记资料整理基础上<sup>①</sup>进一步探析南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僧侣群体，试追溯南宋东亚区域思想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宁波因素。

## 一、南宋宁波海丝中国僧侣群体考论

南宋时，宁波文化极盛。儒学方面诞生了以“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者群体，他们师承象山心学而有新见，史称“四明学派”。此外，宁波史上卓有影响的“三王”之王应麟（另二位为王安石、王阳明）也诞生斯土斯时。在儒风浓盛的南宋宁波，佛教文化也极发达，据楼钥（1137-1213）记实：“以吾乡一境计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才十数，而佛庐至不可数。”<sup>②</sup>此时，宁波佛教僧众高达八千人之多，且大多为禅师，禅风浓烈。具体来看，如临济宗大宗师大慧宗杲住持阿育王寺时（1156-1158），慕名参学者络绎不绝，寺众最多时高达一千二百人，史称“裹粮问道者万二千指，百废并举，檀度响从，冠于今昔”<sup>③</sup>。禅宗发展至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国家确定“五山十刹”为全国最高等级禅宗寺院，更以“五山”为最。“五山十刹”成为东亚禅宗的高峰与方向，是海内外禅僧的向往地。其中，“五山”中天童寺、阿育王寺及“十刹”中雪窦寺位于宁波，它们与宁波大慈寺、瑞岩寺、宝庆寺、栖心寺等一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坐标。

南宋宁波海丝中国僧侣为数甚多，笔者经详阅语录、寺志等各类文献，谨从

<sup>①</sup> 刘恒武、陈名扬、钱彦惠著：《宁波海丝“活化石”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待刊。

<sup>②</sup> （南宋）楼钥《望春山蓬莱观记》，《攻媿集》卷5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1页。

<sup>③</sup> （宋）祖咏编：《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中华大藏经》第7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3页。

中选取颇具标志意义的二十七名进行考论。二十七名僧侣名讳如右：真歇清了、宏智正觉、大慧宗杲、大休宗珙、足庵智鉴、栖心维那、妙智从廓、虚庵怀敞、佛照德光、长翁如净、北磻居简、痴绝道冲、无准师范、大川普济、虚堂智愚、兀庵普宁、西岩了惠、别山祖智、物初大观、环溪惟一、寂圆智深、希叟绍县、兰溪道隆、大休正念、东岩净日、横川如珙、无学祖元。以上僧侣均曾在宁波说法，在海上丝绸之路之上具有一定影响力。

首先，从籍贯上来看，除数名僧侣籍贯不详外，以上僧侣主要来自以下省份：

四川籍十位：真歇清了（绵州安昌县）、北磻居简（潼川府通泉县）、痴绝道冲（遂宁府长江县）、无准师范（隆庆府梓潼县）、兀庵普宁（成都）、西岩了惠（蓬州蓬池县）、别山祖智（顺庆府）、环溪惟一（资州盘石县）、希叟绍县（四川）、兰溪道隆（涪江郡兰溪邑）。

浙江籍七位：长翁如净（明州苇江）、大川普济（庆元府奉化县）、虚堂智愚（庆元府象山县）、物初大观（庆元府鄞县）、大休正念（永嘉县）、横川如珙（永嘉县）、无学祖元（庆元府鄞县）。

安徽籍三位：大慧宗杲（宣州宁国）、大休宗珙（和州）、足庵智鉴（滁州）。

江西籍二位：佛照德光（临江军新喻县）、东岩净日（南康军都昌县）。

山西籍一位：宏智正觉（隰州隰川县）。

福建籍一位：妙智从廓（长溪县）。

由此可以推知，南宋宁波海丝中国僧侣主要来自长江流域相关省份，尤其以长江上游四川及下游浙江为主要来源，其次是安徽、江西。这与南宋时佛教禅宗发展的地域分布趋势一致。

其中，为数众多的蜀僧不远千里到“五山”求法、传道是南宋时期比较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元代学者危素称：“宋自南迁，都虎林，大刹相望，其说法居尊席者，多蜀之大浮图师，若无准范公、北磻简公辈，声光震辉，号为极盛。”<sup>①</sup>该现象的出现，与蜀地唐宋佛教文化隆盛、多产禅宗祖师（如马祖道一、圆悟克

<sup>①</sup>（元）危素《雪窗悟光禅师塔铭》，见（清）释德介纂辑：《天童寺志》卷七塔像考，《中国佛寺志丛刊》第85册，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512页。

勤)及宋蒙四川战争等因素有关。<sup>①</sup>而浙江本系江南佛教中心,五代吴越国时期更以佛教为国教,宗脉衍传至南宋,诞生了长翁如净等一系列在东亚佛教世界声名震动的浙江籍大德高僧。

其次,从宗派上看,以上僧侣除栖心维那宗派不详外,其他悉属佛教禅宗。虽然南宋宁波佛教也有天台宗、律宗等宗派,但禅宗明显占据主流,在海上丝绸之路之路上发挥主要作用。具体来看,南宋宁波禅宗主要分临济宗、曹洞宗两系,临济占主流。以上禅师中属临济宗的有:大慧宗杲、妙智从廓、虚庵怀敞、佛照德光、北磻居简、痴绝道冲、无准师范、大川普济、虚堂智愚、兀庵普宁、西岩了惠、别山祖智、物初大观、环溪惟一、希叟绍县、兰溪道隆、大休正念、东岩净日、横川如珙、无学祖元;属曹洞宗的有:真歇清了、宏智正觉、大休宗珙、足庵智鉴、长翁如净、寂圆智深。

禅宗自达摩开创以来,至唐、五代主要发展为五个流派:沩仰、云门、法眼、曹洞、临济。有“一花五叶”之誉。南宋时,在以宁波为代表的江南禅宗中,又以临济、曹洞为主流。沩仰在北宋已式微,云门、法眼在北宋达到顶峰后在南宋已无影响力。

从具体禅脉看,以上临济宗禅师中,除虚庵怀敞属临济黄龙系,其他均属临济杨岐系。杨岐系中,杨岐虎丘系十三名:痴绝道冲、无准师范、虚堂智愚、兀庵普宁、西岩了惠、别山祖智、环溪惟一、希叟绍县、兰溪道隆、大休正念、东岩净日、横川如珙、无学祖元;杨岐径山系六名:大慧宗杲、妙智从廓、佛照德光、北磻居简、大川普济、物初大观。杨岐虎丘系中,杨岐虎丘无准系七名:兀庵普宁、西岩了惠、别山祖智、环溪惟一、希叟绍县、东岩净日、无学祖元。这与南宋宁波海丝史上禅宗临济杨岐系占对外交流主导,以及日本国虎丘无准系隆盛的情形相符。

以上曹洞宗禅师中,均系丹霞子淳一脉,法脉世系为: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青原行思→石头希迁→药山惟俨→云岩昙晟→悟本良价(曹洞宗)→云居道膺→同安僧丕→同安观志→梁山缘观→太阳警玄→投子义青→芙蓉道楷→丹霞子淳→真歇清了、宏智正觉。其后,真

<sup>①</sup> 参见陈名扬《南宋“五山”蜀僧住持群体及其弘法研究》,《第十九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杭州:灵隐寺,2022年,第501-502页。

歇清了→大休宗珙→足庵智鉴→长翁如净→寂圆智深。在南宋宁波海丝史上的曹洞宗，丹霞子淳一脉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者，从时间上来看。南宋宁宗朝庆元元年（1195）以前，宁波禅宗属于大宗师开宗立派时期。如绍兴元年（1131），真歇清了在昌国县梅岑山（即今普陀山，时属明州）宣讲曹洞禅法，成为普陀山禅宗开山祖。宏智正觉于建炎三年（1129）住持天童寺，长达三十年之久，致力于举扬“默照禅”。大慧宗杲于绍兴廿六年（1156）住持阿育王寺，“看话禅”得以广布开来。虚庵怀敞于淳熙十六年（1189）住持天童，将禅宗传于入宋求法日僧荣西，使得禅脉东传。

自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到理宗景定五年（1264）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宁波禅宗发展达到历史顶峰，诞生了大量巨匠。如长翁如净，嘉定十七年（1224）住持天童，大扬默照禅，使得天童寺成为东亚曹洞宗修学中心。无准师范于绍定二年（1229）至绍定五年（1232）住持阿育王寺，“四方来学，云趋水赴，求参堂者，或累旬月而不得，间有得者，如登龙门”<sup>①</sup>。痴绝道冲嘉熙三年（1239）至淳祐四年（1244）任天童寺住持，兼主阿育王寺，往来说法两山间，“众归如海，复见宏智昔时之盛”<sup>②</sup>。

此外，西岩了惠于淳祐十二年（1252）至宝祐四年（1256）任天童寺住持，期间兼权阿育王寺。虚堂智愚于宝祐四年（1256）至景定五年（1264）住持育王。同时，别山祖智于宝祐四年（1256）至景定元年（1260）住持天童。以上禅师在天童、育王说法之日，海内外学徒云集，使得天童、育王成为东北亚国际禅修与传习中心。

从东渡情形来看，天童寺是宋末渡日高僧最主要的起点，“天童寺—三江口—一定海口”是最繁忙的宁波境内海丝经行路线。较有名气的最早东渡禅师为寂圆智深，他在其师如净禅师示寂后，于绍定元年（1228）应法兄希玄道元之请，从天童出发渡日弘法，后成为日本曹洞宗第二道场宝庆寺开山。南宋最有影响力的东渡禅师为天童寺首座兰溪道隆，他于淳祐六年（1246）应日僧明观智镜之请，率弟子义翁绍仁、龙江德宣等自天童渡日，成为第一位在日本宣传纯粹临济

<sup>①</sup>（元）觉此《环溪惟一禅师行状》，见《环溪惟一禅师语录》，《禅宗全书》第4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sup>②</sup>（清）释德介纂辑：《天童寺志》卷3《先觉考》，《中国佛寺志丛刊》第84册，第219页。

禅的中国高僧，是镰仓纯粹禅风的真正开创者。大休正念于咸淳五年（1269）从天童出发渡日，协同兰溪道隆在日弘阐纯粹禅。无学祖元于南宋最后一年即祥兴二年（1279）以天童首座自甬渡日弘道，为镰仓五山第二瑞鹿山圆觉寺开山，是兰溪道隆以后又一位在日本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宁波高僧。

以上选取分析的禅师在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史上都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他们不仅在江南、全国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且在东北亚海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他们自成体系、引人深省的禅学思想有关，一方面还与他们严慈相济的弘道风格与平易近人的个人修养有关。

无论是临济宗还是曹洞宗，都讲求“坐禅”的重要性。临济大宗师无准师范座下日本弟子如云，个个苦参苦修，均欲接临济正脉流布东瀛。其中，日本奥州松岛山圆福寺开山性才法心在随无准参学九年中，晨昏研究学问，坐禅时常“骨齧肿烂”，然“志气不挠”，最终得以嗣法。<sup>①</sup>事实上，无准教法虽然严格，但对于每位参谒学僧十分爱护，他认为：“主法人当行平等慈，以接来学。”<sup>②</sup>他在一次结制上堂时说：“健时要坐禅，困时要打眠，肚饥须喫饭，陆地要行船。”<sup>③</sup>并告诫大众“不得违戾”。无准禅师将“坐禅”与“打眠”“喫饭”并称，表明了他对大众参学生活的关心。

曹洞大宗师长翁如净对禅僧修学“坐禅”极为重视，在天童时曾告诫道元等：“跏趺坐，乃古佛法也，参禅者，身心脱落也，不要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始得。”<sup>④</sup>因此道元归国后，其核心要务便是普劝“坐禅”。道元《永平清规》一依其师严苛教法，明确规定一天早晚坐禅细则，对于穿着、动作、神态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虽然如净门风严苛，但在指导弟子求学上平易近人。据道元《宝庆记》，他到天童后即给住持如净上书，请求“不拘时候，不具威仪，频频上方丈，欲拜问愚怀”，如净答复称“元子参问，自今

① [日]师蛮撰：《延宝传灯录》卷二，《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8册，东京：佛书刊行会，1912年，第56-57页。

②（南宋）无准师范《复崇福尔长老》（1242），见[日]圆心编、[日]方秀校：《东福开山圣一国师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第134页。

③（南宋）无准师范撰；（南宋）断桥妙伦、环溪惟一、月坡普明等编：《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二，《禅宗全书》第45册，第703页。

④ [日]道元著；[日]默地说三辑：《承阳大师圣教全集》第三卷《永平广录》，东京：永平寺出张所，1909年，第247页。

已后，不拘昼夜时候、著衣衲衣，而来方丈问道无妨，老僧一如亲父之恕子无礼也”。<sup>①</sup>也正是如净禅师给予道元随时参学的时机，使得道元有缘成长为曹洞巨擘。

## 二、南宋宁波海丝域外僧侣群体考论

南宋时，以“五山”为世界禅学中心的浙江集聚了海内外众多英才。日本、高丽等国僧侣纷纷跨海来浙求学，尤以日本求法僧为数最多。南宋宁波海丝域外僧侣群体主要是日僧。

在日本，入唐求法学僧有“入唐八家”之说，分别是：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叡。<sup>②</sup>特别是唐德宗贞元廿年（804）同批次入唐的最澄和空海，他们学成归国后相继成为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创始人。以上僧人在日本均以“入唐”学法经历相标榜，这成为他们在国内开宗立派的主要合法依据与权威来源。最澄、空海等入唐归朝开派祖师是日本僧人的集体偶像，他们的事迹成为南宋时期入宋日僧的重要动能。

此外，入宋日僧在本国时或从宋人或从师门处听到的南宋江南禅风之盛也成为他们慕名求学的精神功能。如明庵荣西在受到宋通事李德昭等介绍宋禅之盛后，生发出强烈的航海求学之志；希玄道元则是从荣西、明全等师门老师处得知宋禅之盛，后与明全和尚航海来宋求学。

路线方面，南宋明州（今宁波）与日本九州博多（今福岡）形成了定向航线，即“明州↔九州肥前松浦郡值嘉岛↔博多湾”。这是南宋时期东北亚最为繁华的一条经贸文化通道，大量中日商舶经此航线往来，这些商舶上时不时搭载入宋求学的日本僧侣。

南宋宁波海丝日僧群体入宋求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为日本寺院或旅日宋商的资助。前者代表如日本达摩宗僧人练中、胜辨作为大日能忍的弟子，受其师资助入宋；后者代表如圆尔辨圆，其受旅日宋商纲首谢国明赞助入宋。

南宋宁波海丝日僧群体入宋年龄方面，主要集中于二十三至四十三这一年龄段区间。三十三岁及以前入宋代表：明庵荣西二十七岁入宋，不可弃俊苻三十一

① [日]道元著；[日]默地说三辑：《承阳大师圣教全集》第三卷《宝庆记》，第1页。

② [日]岛尾新编：《东アジアのなかの五山文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第31页。

岁入宋，希玄道元二十三岁入宋，圆尔辨圆三十三岁入宋，南浦绍明二十四岁入宋。三十四岁及以后入宋代表：明全和尚三十九岁入宋，神子荣尊四十岁入宋，心地觉心四十二岁入宋，无关普门三十九岁入宋，寒岩义尹三十六岁入宋，彻通义介四十岁入宋，白云惠晓四十三岁入宋。

虽然以上所列举的禅师归日后（明全除外）均取得斐然的传道成就，但不同年龄入宋的僧人在心态、目的、学习能力、处境等方面依然有细微区别。

在心态与目的上，以明庵荣西和彻通义介为例。荣西入宋，目的就是系统学习宋禅，承嗣法脉，希望回国后能够开宗立派。年龄较大的彻通义介来华前已是道元法嗣，他入宋的目的是进一步学习以天童寺为代表的“五山”建筑等技艺以及祖庭清规等，以便归国后完善曹洞道场。

学习能力上，以圆尔辨圆和神子荣尊为例。南宋端平二年（1235），两人一同入宋。同样在无准师范门下参学，圆尔辨圆因年轻，精力与学习能力更强，和师友语言交流无障碍。而神子荣尊年龄稍大，“以语言不通无所契”，最终先归国，归国前给圆尔说：“吾先归国，建立精蓝，令师开堂。”<sup>①</sup>

处境方面，以希玄道元和心地觉心为例。希玄道元在到达庆元后第三年，听闻如净禅师新任天童住持，便前去参学。当时如净禅师六十二岁，面对二十岁刚出头又特别虚心求教的道元时表现出喜爱之情，称“老僧一如亲父之恕子无礼”，道元因而获得正传曹洞家风的机缘。心地觉心四十多岁时在得到圆尔辨圆写给无准师范的推荐信后入宋，结果无准禅师刚示寂，新继主径山的痴绝道冲次年也示寂。接着，他遍谒大佬，“屡扣禅关”，终无所得。在宋徘徊五年后，在庆元大梅山遇日本源心和尚指点，最终在杭州无门慧开处开悟。甚至还有因年龄较大、抵抗力差，入宋后不久即病歿的。如明全和尚，曾任建仁寺住持的他三十九岁来庆元，不久即患病，宝庆元年（1225）病歿于天童寺了然寮。因此，入宋日僧处境与其年纪可谓不无关系。

南宋宁波海丝史上的日僧群体入宋后在宁波接受系统性禅宗教义与教义学习，学习多十分刻苦，回国后在传教方面多有较大成就。

首先，学习年限方面。南宋宁波禅宗祖师授徒教学年限不固定，学习时间

<sup>①</sup> [日]师蛮撰：《本朝高僧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2册第295页，转引自郝祥满著：《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38页。

一般根据学僧能力与相关机缘决定。最长有十四五年的，一般也有五六年。如下列：

- 明庵荣西，在宋学习五年（1187-1191），主要在明州天童寺参学；
- 不可弃俊苻，在宋学习十三年（1199-1211），主要在庆元景福律寺参学；
- 希玄道元，在宋学习六年（1223-1228），主要在庆元天童寺参学；
- 心地觉心，在宋学习六年（1249-1254），主要在庆元、杭州参学；
- 无关普门，在宋学习十二年（1251-1262），主要在庆元、杭州参学；
- 寒岩义尹，在宋学习十五年（1253-1267），主要在庆元大慈寺参学；
- 白云惠晓，在宋学习十四年（1266-1279），主要在庆元瑞岩寺参学。

其次，教学内容方面。南宋宁波禅宗祖师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禅学教义精髓，禅宗教仪方面则严格遵从“五山”禅林清规制度。教义教学融入日常教仪，教仪日常则是对教义的实践，两者回互佐证。

入宋日僧普遍珍惜在宗师面前的参学机会，在宁波学习十分勤苦，以道元禅师为典型。道元在天童寺苦学苦参，废寝忘食，这是其成就万世道业的重要原因。据日本《承阳大师小传》：

大師淨祖に參見したまひしより、天童の僧堂裏にましまして、寒暑を忘れ寝食を忘れ、其の脇曾て席に着かず、孜々汲々日を以て夜に繼ぎ、只管面壁して打坐し、佛祖の大道を參究したまひ、而して朝參暮請も亦曾て廢したまはず、其の此の事に於いて暫時も放過せられざることは、恰も頭上に將に墜ちんとする巖石を戴き、脚下に萬仞の懸崖を履むに齊しく、求道の心念至切燉くが如く、參究の功業日に益々成熟す。<sup>①</sup>

这段记实可说展现了道元勤苦参学的精神。也正是在此般学禅、传道的炽热精神激励下，南宋宁波参学日僧群体才最终获得理想中的洞、济“正脉”，载誉归国。

南宋宁波海丝日僧群体在继承的禅宗具体法脉上，以临济宗为主体，其次曹洞宗。其中，临济正传代表有：明庵荣西、圆尔辨圆、心地觉心、无关普门、白云惠晓、樵谷惟仙、南浦绍明等。他们多属临济杨岐系（圆尔辨圆、心地觉心、无关普门、白云惠晓、樵谷惟仙、南浦绍明），该系下无准师范一支最盛：圆尔

① [日]道元著；[日]默地说三辑：《承阳大师圣教全集》第一卷《承阳大师小传》，第13-14页。

辨圆（嗣无准师范）、无关普门（嗣断桥妙伦）、白云惠晓（嗣希叟绍昙）、樵谷惟仙（嗣别山祖智）。明庵荣西则属临济黄龙系，嗣虚庵怀敞。曹洞正传代表：希玄道元。道元禅师继承的正是上述曹洞丹霞子淳一脉：丹霞子淳→真歇清了→大休宗珙→足庵智鉴→长翁如净→希玄道元。

以上入宋日僧均系大师座下亲传弟子，不过也有特殊嗣法情形，以大日能忍为代表。大日能忍并未入宋，而是委托其弟子练中、胜辨入宋，将其开悟语转呈时阿育王寺住持佛照德光。德光见其真挚、机警，承认了授受关系，正式付法。因此，大日能忍隔海成为佛照德光法嗣，属临济杨岐径山系。

南宋宁波海丝日僧群体回国后多能开宗立派、建寺制规，恢宏“五山”宗风，将独具宋风宋韵的中国化佛教禅宗完整传播至日域。其代表为：

明庵荣西，在天童虚庵怀敞座下学成归国后，开创京都第一座带有禅宗风格的寺院建仁寺，成为日本禅宗临济宗开山，被誉为日本“禅祖”；大日能忍，隔海求得阿育王寺佛照德光嗣书后成为日本达摩宗开山，该宗传至彻通义介时并入日本曹洞宗；不可弃俊苒，在庆元景福律寺如庵了宏座下学成归国后，开创京都泉涌寺，成为日本律宗“北律”开山；希玄道元，在天童长翁如净座下学成归国后，开创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成为日本曹洞宗鼻祖；圆尔辨圆，在径山无准师范座下学成归国后，开创日本京都东福寺，成为在日本弘传纯粹临济禅的第一位日本僧人；心地觉心，在护国无门慧开座下学成归国后，开创日本纪州兴国寺，成为日本临济宗之普化宗开山；无关普门，在净慈断桥妙伦座下学成归国后，开创京都南禅寺，成为日本临济宗南禅寺派始祖；樵谷惟仙，在天童别山祖智座下学成归国后，开创日本信州安乐寺；等等。以上禅师在日本国内均有较大影响，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重要使者。

### 三、南宋宁波海丝中外僧侣精神思想的共通特质

#### （一）寂默自省、脱落明白

作为因宗教文化联结的南宋宁波海丝中外僧侣群体，他们对有无、人生、世界这一系列根本命题反复进行哲学反思与对话，寂默自省、脱落明白是他们精神思想的共通特质。

中国化佛教禅宗源自印度佛教，属大乘佛教空宗（即中观）一脉。因此，在

辨析、参悟“有”和“无”的过程中认识人生与世界成为禅宗修行关键。唐庞蕴居士云：“十方同一会，各自学无为。此是选佛处，心空及第归。”<sup>①</sup>悟“空”之后，重现佛性、选佛及第成为修行的重要目的。

大慧宗杲在阿育王寺时曾说法称：“佛法要妙，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无心得，不可以语言造，不可以寂默通。”<sup>②</sup>虽说如此，从实相与虚空中发掘孤心，寂默自省确是参禅必经之路。

如何判别自省有得，南宋宁波禅学祖师各有方便之说。无准师范用“明白”二字直接表示，他在法语《示瑜上人》中称：“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若端的一到明白之地，无有丝毫拣择之心，亦不见有丝毫憎爱之相，廓然荡豁如大虚空，无所障碍。”<sup>③</sup>也即，修行参禅需有“无我”之心，去“拣择”，去“憎爱”，方有可能“洞然明白”“佛祖命脉”。

相对于大慧的临济“看话禅”而言，宏智正觉、真歇清了在天童、育王倡导的曹洞“默照禅”更加注重以“坐禅”为寂默自省主要方式的参悟路径。真歇清了法裔如净禅师在历主各寺中大力推动“坐禅”，并以“脱落”二字检视学徒是否自省有得。如净曾说：“夫坐禅，乃第一莫瞌睡，虽是刹那须臾，猛壮为先。”<sup>④</sup>也即要求学僧把握坐禅时光，哪怕是“刹那须臾”间，也要寂默发力。

道元禅师记录其在天童寺大悟的机缘称：“师因入堂，惩衲子坐睡云：‘夫参禅者身心脱落，只管打睡作么？’予闻此语，豁然大悟。径上方丈，烧香礼拜。师云：‘礼拜事作么生？’予云：‘身心脱落来。’师云：‘身心脱落，脱落身心。’予云：‘这个是暂时伎俩，和尚莫乱印。’师云：‘我不乱印你。’予云：‘如何是不乱印底事。’师云：‘脱落脱落。’予乃休。”<sup>⑤</sup>

① (唐)庞蕴撰；(唐)于颀编：《庞居士语录》卷下，《禅宗全书》第39册，第255页。

② (南宋)大慧宗杲撰；(南宋)雪峰蕴闻编：《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五《大慧普觉禅师住育王广利禅寺语录》，《禅宗全书》第42册，第264页。

③ (南宋)无准师范撰；(南宋)断桥妙伦、环溪惟一、月坡普明等编：《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三，《禅宗全书》第45册，第727页。

④ 按：此为道元记录，见《承阳大师圣教全集》第三卷《永平广录》，第247-248页。又，如净语录有云：“今朝九月初一，打板普请坐禅，第一切忌瞌睡，直下猛烈为先。”见《天童如净禅师语录》卷上，《禅宗全书》第45册，第450页。道元“虽是刹那须臾”一句的记录当更完整。

⑤ (南宋)长翁如净撰；(南宋)无外义远编：《天童如净禅师遗录》，《禅宗全书》第45册，第480页。

道元继承了如净正脉，“坐禅”与“脱落”成为其教法大经。道元在日本上堂说法称：“佛佛祖祖家风，坐禅辨道也……不可虚度今时光阴也。应当救头燃，而坐禅辨道者与。佛佛祖祖，嫡嫡面授，坐禅为先也……坐禅者，身心脱落也。”<sup>①</sup>此一句，可谓曹洞修行要诀。

## （二）悲智双运、利乐有情

大乘佛学远取诸物，发广大慈悲之愿，禅宗也继承了这样的思想。悲智双运、利乐有情是南宋宁波海丝中外僧侣群体精神思想的共通特质。

释迦牟尼佛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sup>②</sup>无准师范庆元说法称：“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sup>③</sup>禅宗大师面对“悉有佛性”的众生，发慈悲心，并首先针对佛弟子进行教化。

禅宗往往通过坐禅、洒扫、应对等日常生活，以及古哲耆宿的公案话头，参究深玄却近人的禅理，最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希叟绍昙在咸淳五年（1269）入主庆元瑞岩寺时，即喝道“一踏牢关百杂碎”<sup>④</sup>，也就是说，进入禅门传播禅法，就是要摒弃世俗规矩带来的执迷，真正实现返躬自省，普度众生，成就佛性。

痴绝道冲性格直爽、坚毅，被世人认为“门庭高峻”<sup>⑤</sup>，在选拔宗派传人方面严格把关。同时，他随和慈悲，勤于接引学人。痴绝禅师住持各寺有一特殊习惯，即“每日一篋付侍者，有求其语者，投之篋中”<sup>⑥</sup>，为了“无孤其诚意”<sup>⑦</sup>，等到大家都就寝后，伴着烛光，他便耐心地逐一答疑解惑。

如净禅师上堂称：“我为法王，于法自在，霁寒破夜，霜月行空，安稳众

① [日]道元著；[日]默地说三辑：《承阳大师圣教全集》第三卷《永平广录》，第247、249页。

② [日]道元著；[日]默地说三辑：《承阳大师圣教全集》第一卷《正法眼藏佛性》，第295页。

③（南宋）无准师范撰；（南宋）断桥妙伦、环溪惟一、月坡普明等编：《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一，《禅宗全书》第45册，第666页。

④（南宋）希叟绍昙撰；（南宋）法灯等编：《希叟绍昙禅师广录》卷三《庆元府瑞岩山开善崇庆禅寺语录》，《禅宗全书》第46册，第283页。

⑤（南宋）尤焯《〈痴绝禅师语录〉序》，见《痴绝道冲禅师语录》，《禅宗全书》第45册，第242页。

⑥（民国）释莲萍纂辑：《天童寺续志》卷下《表贻》，见《中国佛寺志丛刊》第86册，第324页。

⑦（南宋）长翁如净撰；（南宋）无外义远编：《天童如净禅师遗录》，《禅宗全书》第45册，第475页。

生，故现于世。”<sup>①</sup>明确表明了禅宗利乐有情的宗旨。如净《涂田》诗：“劖断潮头大海枯，十方公界佃官租，寥寥万古平如掌，不许傍人扬契书。”<sup>②</sup>表达了对平民生活的同情。

又如某天，希叟绍县在瑞岩寺上堂时说法，称“天地不仁，人心招感，田稼如云，一风消散，农家血泪流，肝肠断”，表达了他对南宋末年人民艰苦生活的痛心。同时，他又指出，遭此乱世，惟有如“林间衲子”一般，“有亦不知，无亦不管，圆蒲拥雪衾，缀钵盛香饭，放憨一饱万缘空，冷笑傍人忙似钻，灼然如是，万两黄金也合消”<sup>③</sup>。表面上看似态度消极，实则隐显了其悲智双运、利乐有情的佛教人本主义内蕴，也即一个普通人面对世事的变动多无应付能力，惟有沉静如常，发皇佛性，任心自在，方可在无视外界事物变化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 (三) 一气契同、千差一家

在禅的世界中，佛法真理并无畛域之分。如净禅师上堂称：“山河不隔越，处处是光明。”<sup>④</sup>如净又称：“一念万年，一气契同，万象生成。”<sup>⑤</sup>无准师范在雪窦寺说法称：“万别千差处，事同一家；事同一家时，万别千差。”<sup>⑥</sup>无准禅师在庆元清凉寺说：“佛法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及国土。有世界以光明而作佛事，有世界以香饭而作佛事，有世界以寂默无言无说而作佛事，有世界以梦幻、镜中像、水中月、热时焰、呼时响，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是故‘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sup>⑦</sup>一气契同、千差一家也是南宋宁波海丝中外僧侣群体精神思想的共通特质。

① (南宋)长翁如净撰；(南宋)无外义远编：《天童如净禅师遗录》，《禅宗全书》第45册，第475页。

② (南宋)长翁如净撰；(南宋)文素等编：《天童如净禅师语录》卷下，《禅宗全书》第45册，第469-470页。

③ (南宋)希叟绍县撰；(南宋)法灯等编：《希叟绍县禅师广录》卷三《庆元府瑞岩山开善崇庆禅寺语录》，《禅宗全书》第46册，第285页。

④ (南宋)长翁如净撰；(南宋)无外义远编：《天童如净禅师遗录》，《禅宗全书》第45册，第475页。

⑤ (南宋)长翁如净撰；(南宋)无外义远编：《天童如净禅师遗录》，《禅宗全书》第45册，第477页。

⑥ (南宋)无准师范撰；(南宋)断桥妙伦、环溪惟一、月坡普明等编：《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一，《禅宗全书》第45册，第676页。

⑦ (南宋)无准师范撰；(南宋)断桥妙伦、环溪惟一、月坡普明等编：《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一，《禅宗全书》第45册，第668页。

无准师范认为真理存在于世界各处，而弘道的关键则在于得人，他将此理念概括为：“道无南北，弘之在人。果能弘道，则一切处总是受用处，不动本际而遍历南方，不涉外求而普参知识。如是则非独此国彼国不隔丝毫，至于及尽无边香水海那边更那边，犹指诸掌耳。”<sup>①</sup>正因他在“千差一家”视野下热情接引弟子，“天下之士，归之如市”，时人称：“佛鉴之门，人材杂遝”<sup>②</sup>，“其得人，视同时诸老为最盛”<sup>③</sup>，“正续崛起而振之，是为十六世，光明隽伟，奔走海内，学者指双径为道之所在，而迫趋之”<sup>④</sup>。

嘉熙二年（1238），圆尔辨圆以无准顶相求赞，无准禅师自赞曰：“大宋国、日本国，天无垠，地无极，一句定千差，有谁分曲直，惊起南山白额虫，浩浩清风生羽翼。”<sup>⑤</sup>中日两国虽“万别千差”，但在无垠无极的禅世界中其实也是“千差一家”。可以说，无准禅师通过他的弘道实践践行了其“千差一家”的禅学世界观。

日本宽元四年（1246），大佛寺改名永平寺，道元禅师上堂说法称：“天有道以高清，地有道以厚宁，人有道以安稳。所以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世尊有道，虽是恁么，永平有道，大家证明……天上天下，当处永平。”<sup>⑥</sup>道元将曹洞大本山取名“永平”，一则因佛教传入中国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一则寄寓了天下世界永远和平的禅学旨趣。

## 余 论

①（南宋）无准师范《示日本然上人》，见《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三，《禅宗全书》第45册，第726页。同卷中，无准师范赠日僧圆尔辨圆法语《示日本尔侍者》中也有这句，事在嘉熙元年（1237）十月，参见[日]圆心编、[日]方秀校：《东福开山圣一国师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第132页。又，《示日本尔侍者》即无准墨迹《与圆尔印可状》，现为日本国宝，日本京都东福寺藏。

②（南宋）物初大观《西岩禅师行状》，见《物初贖语》卷廿四，载许红霞辑著：《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00页。

③（南宋）无文道璨《径山无准禅师行状》，见《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六，《禅宗全书》第45册，第778页。

④（南宋）西岩了惠《日本国丞相藤原公舍经记》，见《西岩了慧禅师语录》卷下，《禅宗全书》第46册，第464页。

⑤[日]圆心编；[日]方秀校：《东福开山圣一国师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第133页。全文见《无准师范自赞顶相》，绢本设色，尺寸124.8×55.2cm，日本京都东福寺藏。

⑥[日]道元著；[日]默地说三辑：《承阳大师圣教全集》第三卷《永平广录》，第159页。

在南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史上,中外僧侣群体数量庞大,他们以明见心性、授受禅脉、弘化兆民为核心的交往功能。他们的日常参学生活主要在天童寺、阿育王寺等“五山”寺院中展开,授受内容除去禅学精髓外,还包括在禅学基础上创生的一系列“五山文化”。在这里,“五山文化”特指在中国江南禅院“五山”中创造、传承的中国化禅宗文化艺术,包含文学、书画、雕塑、建筑以及清规等。如以长翁如净、无准师范为代表的宁波“五山”大德,除将禅脉印证于留学日僧外,还悉心传授当时东亚世界高级文化形态“五山文化”。而以希玄道元、兰溪道隆为代表的宁波中外“五山”高僧,则跨越碧海蓝天,将南宋“五山文化”带到日本。

比如文学方面,日本禅僧或渡宋求法,直接学习宁波“五山文学”,或携归、翻刻南宋“五山”经典著述,并以之为学习模范,将宋代“五山”禅集文体、著述结构及宋式词汇、禅语表达方式融入书写实践与禅林生活,从而熔铸为日本“五山文学”。<sup>①</sup>书画方面,宁波“五山”禅师墨迹、顶相画以及四明佛画等经入宋求法僧之手大量输入日本,成为日本“五山”墨迹、顶相画及各类佛画创作的模仿对象,产生了吉山明兆等一众明州画派谱系传承人。雕塑方面,以东大寺南大门石狮为代表的石刻及以泉涌寺朱金漆韦陀菩萨像为代表的木雕是南宋宁波“五山”雕塑艺术东传的代表。建筑方面,日本古代佛寺建筑三大样式中,“大佛样”(即“天竺样”)与“禅宗样”两种风格都与南宋宁波“五山”有直接关联。南宋宁波“五山”清规更通过兰溪道隆、希玄道元等中外高僧传播至日本,是中国禅林清规东传的主线。<sup>②</sup>

南宋宁波中外僧侣互动与“五山文化”持续百来年的越海东传是宋元东亚文化史上的大事件。作为南宋中华文化话语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南宋宁波中国僧侣群体生活简朴、作息规律,同时思想明快、兼擅文艺,创造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又跨越了民族国家的“五山文化”,他们与入宋日僧一道,具备寂默自省、脱落明白、悲智双运、利乐有情、一气契同、千差一家等珍贵的精神特质。来自宁波或来到宁波参学的中外僧侣,将注重向心发力、明心见性、镇国护民、宇内攸

<sup>①</sup> 陈名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南宋“五山”蜀僧与海上丝绸之路》,《宋史研究论丛》第三十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84页。

<sup>②</sup> 参见刘恒武、庞超《试论荣西、道元著作对〈禅苑清规〉的参鉴——兼论南宋禅林清规的越海东传》,《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62-68页。

同的南宋国民宗教禅宗临济宗、曹洞宗越海东传日本，同时将附属于禅宗教义的“五山文化”也深植日域，使得宋式生活方式与艺术审美东渐，并且超越了禅林，扩散到世俗社会，使得日本镰仓、室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宋风化”，甚至“明州化”（即带有宁波文化的底色）。

正如在南宋海上丝绸之路史上极富盛名的道元禅师在自赞顶相时自称：“且道唤作什么，且唤作伊天童儿子。”<sup>①</sup>南宋东北亚区域思想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宁波有着紧密关联。南宋宁波是东亚人类交往过程中宝贵的中介与枢纽，而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南宋宁波海丝中外僧侣群体在中华文化话语国际传播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他们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史上熠熠发光的群星。南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僧侣群体给我们留下的一系列海丝史上的物象、事象、众生相<sup>②</sup>，其背后是具有“宁波风格”的普适性价值理念，无疑对当代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

① [日]道元著；[日]默地说三辑：《承阳大师圣教全集》第三卷《永平广录》，第352页。

② 刘恒武《跨越海洋的输日佛教石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2日第8版（国家社科基金专版）。

## 胶莱运河再研究

于波(山东华宇工学院)<sup>①</sup>

### Re-Study of the Jiao Lai Canal

**摘要:** 始修于元朝的胶莱运河贯通山东半岛, 连接胶州湾与渤海湾, 是今山东省重要运河遗迹。以往相关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之处, 故本文检视《道光重修胶州志》、《道光重修平度州志》、《乾隆莱州府志》、《民国高密县志》等方志史料作补充研究。开凿胶莱运河主要源于漕运需求, 其停漕也非一纸诏书而定。胶莱运河对古代社会意义重大, 不仅分担了内河漕运压力, 而且一度成为明清两朝后备运输路线。时至今日, 应加强对其关注与研究旨在促进山东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 并带动区域社会发展。

**关键词:** 胶莱运河; 漕运; 海运; 方志

**Abstract:** The Jiaolai Canal, built in the Yuan Dynasty, runs through the Shandong Peninsula and connects Jiaozhou Bay and Bohai Bay. It is an important canal relic in today's Shandong Province. There have been many controversies in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 past, so this article examines local chronicle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Daoguang Rebuilt Jiaozhou Chronicles", "Daoguang Rebuilt Pingduzhou Chronicles", "Qianlong Laizhou Prefecture Chronicles", and "Gaomi County Chronicl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supplementary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iaolai Canal was mainly due to the demand for water transportation, and the suspension of the canal was not determined by an imperial edict. The Jiaolai Canal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cient society. It not only shared the pressure of inl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but also became a backup transportation rout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day, attention and research

<sup>①</sup> 于波(1994-), 男, 山东章丘人, 历史学硕士, 山东华宇工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山东运河史。本文为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项目成果, 项目名称: 国家大运河公园建设背景下胶莱运河历史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 23WL(Y)200。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andong Grand Canal Cultural Park and promote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Jiaolai Canal; water transport; maritime transport; local chronicles

胶莱运河始修于至元十八年（1281），元政府采用姚演开河计划，并由阿八赤（亦称来阿八赤）监督开凿而成，<sup>[1]1626</sup>时南起胶州麻湾，北至掖县海仓，<sup>[2]2139</sup>全长约300余里，<sup>①</sup>以平度县姚家村为分水岭，南北分流，沟通胶河、沽河等多条河流。

自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实施以来，各省深挖大运河文化遗产，推动运河沿岸建设。胶莱运河作为山东重要运河遗产之一，应得到更多关注。然而长期以来，学界重点关注的是京杭大运河，而对胶莱运河的研究成果甚少。

国内有关胶莱运河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前，李秀洁著有《胶莱运河—中国沿海航运之枢纽》<sup>[3]</sup>一书，该书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展开探讨，主要涉及胶莱河流域地理概况与胶莱运河开凿历史等问题。第二阶段是1980—2000年，此阶段只有史念海与李宝金作专文论述。史念海在《中国的运河》<sup>[4]223</sup>一书中对简要陈述了元朝胶莱运河开凿与停运。李宝金《元明时期胶莱运河兴废初探》<sup>[5]85-89</sup>一文着重探讨了胶莱运河兴盛与湮灭的原因。第三阶段是2000—2010年，薛磊《元代的胶莱运河》<sup>[6]71-72</sup>一文从元朝胶莱运河的开凿、启用与废弃等方面做专文探讨。另有霍有光《评开凿胶莱海洋运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sup>[7]1-4</sup>一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对当代是否重开胶莱运河提出质疑。其中2006年是研究胶莱运河的高峰，山东青岛召开了胶莱人工海河论坛，会议共收录30余篇文章，涉及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多个层面，论坛围绕“胶莱运河是否具备重开条件”这一主题展开。第四阶段是2010年至今，主要有王君、丁鼎《元明胶莱运河兴废考略》

<sup>①</sup> 关于胶莱运河长度说法颇多，《海运编》等史料记为350里；《道光重修胶州志》中记为370里；李宝金认为胶莱河全长200多公里；王君、王婷婷使用133公里的说法；《道光重修平度州志》中记282里；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水志·水利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记为130公里。造成不同记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文献记载起止点不同，二是各个时期胶莱运河长短有变，三是里程计算单位不同，清末以前1里约是今1.152里。《道光重修平度州志》中的记载：胶莱河自丁家工二十里至陈家闸三十里，至吴家闸三十里，至窝铺闸二十五里，至亭口闸三十里，至周家闸三十里，至玉皇闸三十里，至杨家闸三十里，至新河闸三十里，至海仓闸七里，至蛤蜊场五里，至斗沟口十五里入北海，凡二百八十二里。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胶莱运河全长300余里更接近实际里程。

<sup>[8]</sup><sup>18-23</sup>、封明静《元明时期胶莱运河研究》<sup>[9]</sup>、王婷婷《胶莱运河研究》<sup>[10]</sup>等数篇文章进行论述。

以往研究多使用正史资料,探讨“胶莱运河历史进程”与“重开胶莱运河能否实现”两个问题。虽然研究比较全面,却仍有进一步探究之处,这有利于深度发掘胶莱运河历史文化遗产。本文欲结合方志资料,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胶莱运河开凿缘由与时间争议。第二,胶莱运河停漕之争。第三,后世复议开河原因。第四,胶莱运河的社会价值。

## 一、胶莱运河开凿缘由与时间争议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东征西讨后建立起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后忽必烈打败南宋政权建立元朝,并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七年(1270)，“大都共有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sup>[11]</sup><sup>1347</sup>。全国户籍总数约一百三十七万户，[1]1345仅大都在册人口约占户籍总数的十分之一，此不算商人、驻军人数，粮食消耗可想而知。《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sup>[11]</sup><sup>2364</sup>元大都虽然远离江南，但大都的粮食物资又离不开富庶的江南地区。因此，漕粮如何北上大都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元初使用“河-陆”相结合的运输方式，“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途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京师”<sup>[11]</sup><sup>2364</sup>。“河-陆”运输效率低下，损耗较多，有鉴于此，元政府又选择效率更高的运输方式—海运，并于至元十一年(1274)开辟了第一条海运路线：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码头，北至密州胶州界灵山洋一带，最后行月余至成山，共计水程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sup>[11]</sup><sup>339-340</sup>相较于“河-陆”运输方式，海运的效率大为提高。

然而，元政府在海运路线开辟之后，又为何要开凿胶莱运河？

《道光重修胶州志》有云：“胶州志以为元人海运凿此，避登州成山之险。自明至国朝凡漕运梗塞必议海运，议海运必议修胶莱河。”<sup>[11]</sup><sup>339-340</sup>有学者据此认为“避成山之险”是开凿胶莱运河的主要原因。<sup>[10]</sup><sup>17-18</sup>

笔者认为，“避成山之险”不能视作开凿胶莱运河的主要原因。首先，没有遗留史料证明开凿胶莱运河与“避成山之险”有直接关系。其次，纵观元朝历

史，海运伴随王朝始终，长达万里的海路，艰难之地绝不止成山一隅。除上述海道之外，后有两条新开海道，具体如下：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扁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家岛至之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至元三十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岛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目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sup>[11]339-340</sup>

元朝海运路线成熟，从刘家港出发有三条海路可达莱州湾，进而入直沽。三条海道开辟于胶莱运河前后，且均走成山海域，因而“避险”一说不是主要因素。

“避险”之说不能被视为开凿胶莱运河的主要因素。李宝金补充了另一说法：宋元以降，胶莱一带经济发达，成为胶莱运河开凿的主要经济动力。<sup>[5]86</sup>板桥镇、海仓镇作为贸易重镇，带动着胶莱一带经济发展，同时带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此观点难经推敲，板桥镇于宋朝迎来了发展的顶峰，其依靠的是海路交通与榷场贸易，并不依赖南北沟通的运河。

《道光重修胶州志》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恰好说明这一点，其内容为：元丰六年（1083），起居郎杨景略出使高丽后想要于板桥镇立海神庙。时在密州为官的苏轼嫌板桥镇湫隘，上书迁海神庙于登州，最终景略不从。板桥镇虽是地势低洼，但却发展为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朝臣兴高丽往来由此”<sup>[11]335</sup>。除此以外，在北宋与辽、金对峙的背景下，板桥镇也承担着商品交换的职能，“元祐三年（1088），以板桥镇为胶西县兼临海军使，仍置板桥市舶司”，“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置板桥榷场与宋互市”<sup>[11]335</sup>。市舶司、榷场先后设立于此，考古出土的大量遗物<sup>[12]17</sup>展示着它曾经的辉煌。

另外，就板桥镇与麻湾的地理位置而言，两点相隔一定距离。因此，板桥镇与开凿胶莱运河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除以上说法外，封明静认为“对外扩张”<sup>[9]20-21</sup>也是修建胶莱运河的原因之一。此观点有待商榷，中原王朝进入朝鲜半岛、日本岛地区有陆路、海路可供选

择。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多次选择海、陆并进的方式进攻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政权。以唐朝贞观十九年(645)一次军事进攻为例,“李世绩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我不意。夏四月,世绩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我城邑大骇,皆闭门自守”,“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度辽水,趋建安城,破我兵,杀数千人”,“张亮帅舟师,自东莱度海,袭卑沙城”<sup>[13]256</sup>。

材料中提到的行军路线有三条:一是出通定(今新民市),渡过辽水,抵达玄菟(今在东陵)。二是营州都督张俭,沿海北进,渡过辽水,到达建安城(今盖州市)。三是张亮从东莱(今龙口)过海,攻打卑沙城(今属大连)。唐初分多线进入辽东地区,说明此时前往朝鲜半岛交通要道已经贯通。

另外,唐朝与日本交往频繁,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至中原地区进行各项活动。大致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是日本横渡大海至长江口登陆,再由扬州沿大运河北上,过楚州(今江苏淮安)可顺淮水至海州。二是从日本出发到达朝鲜半岛,横渡黄海,在登州上岸后南下海州,再经楚州沿通济渠至汴州,然后到达洛阳、长安。对此已有学者进行阐述<sup>[14]45</sup>。既然中原王朝进入朝鲜半岛、日本岛地区路线如此成熟,元朝又何必大费周章,显然军事征伐并不是开凿胶莱运河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漕运需求是元朝贯通海路运输的主要因素,胶莱运河在此背景下开凿,其余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原因如下:其一,海路运输漕粮事关国计。如《元史·食货志》中云:“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致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sup>[11]2481</sup>至正元年(1341)后,漕粮海运数量渐少,至正十九年(1359)、二十年(1360)仅有十一万石,至正二十三年(1363)彻底停运。

[1]2482-2483

由此可见,海运自忽必烈始直到王朝末年方停,其峰值时可达三百万石之多,同样也意味着海运压力巨大。

其二,胶莱运河开通后,分担了海运压力。如《大元海运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参政不鲁迷失海牙等奏自江南每岁运粮一百万石,从海道来者十万石,阿八赤、乐实二人新挑河道运六十万石,济州奥鲁赤所挑河道运者三十万石。”<sup>[15]50</sup>按照上述记载,从海路而来的漕粮中实际有六十万石走胶莱运河

进直沽地区，十万石不经过胶莱运河。<sup>①</sup>显然，胶莱运河开通后承担了一定的运粮任务。

毫无疑问，“漕粮如何北上”是元朝面临的重要问题，其发展海运之时胶莱运河得以修建，“漕运”是开凿胶莱运河的根本因素。新河修通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海运距离，分担了海运压力，然而慢慢走向了衰败。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新河在“避险”、“行军”等问题上作用巨大，元朝理应多方维护，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也说明，后人颠倒了因果，以结果推测缘由，陷入历史的怪圈中。

关于胶莱运河另一争议是明朝王献开河的具体时间。此阶段工程有二，其一是开凿马濠运河，其二是修建九闸。

《明史》记，嘉靖十九年（1540）副使王献建言于马濠开河，最终“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sup>[2]2140</sup>的马濠运河（现称为马濠）开通。《明史》记为嘉靖十九年（1540），方志中则言：“嘉靖十四年，副使王献开胶莱新河，未竟开。”<sup>[16]389</sup>

《道光重修胶州志》中亦有同样记载，并言“嘉靖十六年春正月，王献凿马家濠”<sup>[11]339</sup>，明人崔旦作《海运编》中记为嘉靖十七年（1537）<sup>[17]16</sup>。

马濠运河到底开凿于何时？参见明人蓝田《新开胶州马濠之记》碑（此碑现存黄岛区薛家岛官厅村）可知：王献于嘉靖十四年时着手开河计划，在山东巡抚胡纘宗的支持下于嘉靖十六年动工，《明史》记载应为讹误。

同样，有关第二年修建九闸的说法亦是讹误。嘉靖二十年（1541年），王献继续修建海仓口、新河、杨家圈、玉皇庙、周家、亭口、窝铺、吴家口、陈村九闸，以调节河道水位，并置浮梁，建官署以守。<sup>②</sup>王君认为此九闸修建于元朝时期<sup>[8]21</sup>，然而笔者翻阅其参考的《道光平度州志》、《乾隆莱州府志》等地方史志均无明确记载。《明史》对此记载为“设九闸、置浮梁，建官署以守”<sup>[2]2140</sup>。

考明人崔旦作《海运编》可知：“嘉靖十七年，宪副王公献慨然自任，飭材鸠工，闸石基址，屡获旧迹，而新河之事兴矣。”<sup>[17]16</sup>其在《闸壩考》中记述：“窃观新建石闸，仅存者三分之一。新河闸口，石大颇完。吴家口闸、陈村闸、

<sup>①</sup> 史料中“从海道来”指漕粮不走胶莱运河，绕过山东半岛进入直沽地区，并不是说胶莱运河漕粮不走海路。

<sup>②</sup> 引自青岛市情网，[http://qdsq.qingdao.gov.cn/szfx\\_86/sjqdsz\\_86/slz\\_86/dephdzt\\_86/202204/t20220414\\_5491356](http://qdsq.qingdao.gov.cn/szfx_86/sjqdsz_86/slz_86/dephdzt_86/202204/t20220414_5491356)。

窝铺闸、亭口闸、周家庄闸、玉皇庙闸、杨家圈闸，倾颓不堪。岿然仅存幸耳，昔年王公献创建之时，财乏民疲，只以速成为功，不以久远。”<sup>[17]20</sup>据此材料而言，明嘉靖十七年（1537），王献于元朝旧闸基础上完善而成的。后因王献调离，胶莱运河分水岭处未能畅通。

综上所述，马壕运河工程于嘉靖十六年（1536）完工，并于嘉靖十七年（1537）修缮运河闸壩。此次动工是后世修缮胶莱运河的唯一一次实践，不仅缩短了漕船北上胶州的距离，而且为马壕沿岸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自兹南北商贾舳舻络绎往来不绝，百货骈集贸迁有无，远迩获利矣”<sup>①</sup>。

通过挖掘方志等史料可知，胶莱运河的开凿始于漕运需求，“避成山之险”等并非主要因素。另外，关于马壕运河开凿时间出入较大，方志记载明显早于《明史》记录，这是以往学者容易忽视的。那胶莱运河何时停漕呢？

## 二、胶莱运河停漕之争

关于胶莱运河停漕时间学界也有多种说法。李秀洁认为运河被废于至元二十年（1283），后至元二十一年（1284）引发了朝中较大争议，最终忽必烈罢胶莱新河<sup>[3]65-66</sup>；李宝金以至元二十七年（1288）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的罢废作为胶莱运河停漕的标志<sup>[5]88</sup>；王君认为胶莱运河被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3）<sup>[8]21</sup>。那元朝何时开始弃用胶莱运河呢？

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胶莱运河成，每年运输两万余石粮食，时“火鲁火孙等奏，阿八赤所挑河道以南，用船一百九十四只，运粮四万八千九百六十一石。其船一百零四只内损坏乞粮五千五十一石外，船九十只该粮二万三千九百九石”<sup>[15]47</sup>。此次运输，只有约一半漕粮成功抵达。阿八赤解释为船体不坚、路途遥远。无论如何，胶莱运河已经开始使用，同年<sup>②</sup>元政府弃用胶莱运河的诏书业已下达，“二十年（至元），胶莱河运船坏，诏更治海运”，记述者详细说明了缘由：“新河口潮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于是罢新河事海运……而粮舶过暴风

① 蓝田：《新开胶州马濠之记》，引自青岛市情网 [http://qdsj.qingdao.gov.cn/szfz\\_86/qdsj\\_86/2019nd1q2019n4y\\_86/lshm\\_86](http://qdsj.qingdao.gov.cn/szfz_86/qdsj_86/2019nd1q2019n4y_86/lshm_86)。

② 关于何时下诏停运的说法不一，有史料言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元二十二年（1285）。封明静文中采用的是前者，王婷婷文中则采用后者。

多漂覆……诸漕卒代偿捞掠，惨毒自杀者相继……按察官莫敢言，荣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见证，吾自当也即上奏诏免征胶莱运卒赔粟。”<sup>[18]366</sup>

吊诡的是诏令下达后，仍多次下诏停漕。如上文中提到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元二十七年（1290），“罢胶莱海道运粮”<sup>[11]337</sup>；至元三十一年（1294）御史台官员玉速贴木儿与漕臣囊加觥、万户孙伟，右丞麦术丁等人辩论，最终“阿八失（赤）河所用水手五千、军五千、船千艘，畀扬州省教习漕运。今拟以此水手军人，就用平滦船，从利津海漕运。世祖从之，阿八失所开河遂废”<sup>[11]1626-1627</sup>。

由此可见，胶莱运河停漕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纸诏书而定，即便诏书下达，漕运官员依然使用距离较近的胶莱运河进行运输。开始弃用并不能说明胶莱运河无法使用，关键在于其运输效率不高。明朝建立之初，仍用胶莱运河运输漕粮。《山东通志》中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会通河成，始罢海运，并罢胶莱运。”<sup>[19]3465</sup>说明直到永乐年间会通河畅通之后，才停止了胶莱运河的漕运。不能否认的是，即便胶莱运河依然承载着漕运职能，却逐渐失势，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胶莱运河泥沙淤积严重。胶莱运河沟通海道，最初船舶需要借助海潮之力进入运道之中，稍有不慎便会船毁粮沉。另外，随潮水涨落，大量泥沙淤积河道，阻碍漕船。元人曾纂文曰：“余尝乘船过之询土人云，此河为海沙所壅又水潦积淤，终不能通，徒残人耳。”<sup>[11]337</sup>《民国高密县志》中有关张居正开河史料也提到：“水挟淖沙而入必复淤，时张居正柄国不听督促，抚按开数尺果皆砾石黑沙难施畚口，费帑金十二万乞无成功方止。”<sup>[20]303</sup>可见泥沙淤积成为古人使用胶莱运河的主要阻力。

其二，胶莱运河水量不稳定。运河水量决定其能否通航，山东半岛季节性降雨明显，夏秋多、冬春少。雨量骤增之时，胶莱运河水量增加，可能造成水患。同时，冬春季节水量较少，运河难以维系。对比内河航运中的南旺水利工程，可窥一斑。运河南旺段，以汶河之水进行有效补给，水满时可用南旺等湖泄水，缺水时则反补运河。胶莱运河流域则缺少湖泊蓄水，缺水时无补给之力。即使雨水丰沛的季节，胶莱运河中间河段水量仍不容乐观。方志中言：“大沽河秋水泛涨，极是汹涌，恐为河害。北折而王家口约三十里，水势匀停，工半事就，殊不为难。折而吴家口至孙家口不足二十里，水微小。奏功颇难，然以人力胜之。似

亦无足虑者十余里至分水岭，水至此几绝流。”<sup>[16]42</sup>由此可见，胶莱运河水量并不稳定。

其三，元政府已然知晓胶莱运河运力不佳，故在漕运上做出弥补。首先，继续开创海道，从事海运。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世祖同意了“用平滦船，从利津海漕运”<sup>[11]1626-1627</sup>的方案。其次，修内陆运河，补充运粮。《元史》中载：“至元二十年（1283），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于扬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三省造船千艘于济州河运粮”<sup>[11]2364-2365</sup>，济州河承担一定运粮工作，但是河运只作为元朝漕粮入京的补充路线。

### 三、明清复议开河原因

翻阅方志可知，明清时期曾多次提议重开胶莱运河，正统、嘉靖、隆庆、万历、崇祯、雍正等朝均有讨论。参见下表：

明清两朝重议胶莱运河统计表

时间	事件	出处
嘉靖十四年	副使王献开胶莱新河，未竟开。	《乾隆莱州府志》 《道光重修胶州志》
隆庆四年	侍郎徐枋开胶莱河，寻罢。	《乾隆莱州府志》
隆庆五年	尚书刘应节言遣官开胶莱河，寻罢。	《道光重修平度州志》
万历四年	徐枋开胶莱新河	《道光重修胶州志》
万历三十年	诏开胶莱河，寻罢之。	《乾隆莱州府志》
万历三十七年	御史颜思忠言开胶莱河	《乾隆莱州府志》
崇祯十一年	巡抚都御史曾樱请帑金十万开胶莱河，终不开。	《乾隆莱州府志》
雍正三年	内阁学士何国宗视胶莱河，罢议，永不疏浚。	《道光重修平度州志》

明清两朝是内河漕运发展繁荣时期，并且运河沿线形成了33个工商业城市。为何内河航运发展之时会复议开河？王君认为，“黄河屡决，漕运受阻”是胶莱运河重开的契机，<sup>[8]22</sup>王婷婷等亦持相同观点。<sup>[10]31</sup>笔者认为，除上述因素外，官民忧患意识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以士大夫刘应节为例，其于隆庆五年（1571）上疏遣官开胶莱运河。[18]367《乾隆莱州府志》中详细记述了其上疏内容：

有识之士谓宜别通海运与漕河并行，以备意外之防……此工一成，凡有数利也。海潮所致，风帆顺利，不过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致，□然成渠，以后可免剥浅之费、挨帮之守、挑濬之劳，其利二也。循港而行，遇风则止，无放洋覆溺之害，内避黄河迁徙之虞，其利三也。漕运之粟，率踵而致，一石海运脚费既省，则兑支加耗自宜减省，其利四也。吴越荆湖诸省之粟，查照先臣邱濬所载议，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河复迅速，彼或有滞，此尚可来，是□利而俱图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载千石，足载河舟所载之三，海舟率十五人可减河舟用足之半，退军运伍俾□水战之备，可创边海之寇，其利六也。仍查复□初济边事例，每年以发数万石以济辽蓟军饷亦可省空运之费，免招买之苦，其利七也。

——《议开新河疏》<sup>[16]263</sup>

在奏疏中，刘应节阐明了复开胶莱运河的七点利处，具体可以归结为：省时、省力、省费、保漕，并且可以加强海防，改善运军生活<sup>[21]71-72</sup><sup>①</sup>。同时刘应节上疏第一句就已点明主题“以备意外之防”，其忧患意识主要源于三点：

第一，内陆运河时常受黄河影响而阻塞不通，为此明清两朝多次新修短程运河以避黄河。清人陆耀《山东运河备览》中提到明、清两朝三次避河行运工程：

“明初阻塞，借资于河，宋礼重濬会通，粮艘不至阳武，避镇口以上黄河之险数百里”，“李化龙开泲口，粮艘不由徐、吕，避董口以上黄河之险又三百里”，“国朝靳文襄公辅开中、阜二河，粮艘由仲庄入口，后又改由杨庄，并避宿、桃以上黄河之险又二百里。”<sup>[22]887</sup>黄河是东西流向，运河是南北流向，黄、运交汇地区漕船通行难度大，甚至有沉船风险，故而要减少黄河水流影响，保证漕运。

第二，现行漕运制度的弊端，漕运过程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明史·食货志》中记：“历代以来，漕粟所都，给官府廩食，各视道里远近以为准。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sup>[21]915</sup>明朝漕运制度经历了支运、兑运向长运的转变，由民运为主向军民合作，再到军运为主的过渡。<sup>[23]68</sup>以兑运法为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

<sup>①</sup> 明朝漕运军士生活凄苦，当漕粮运输中损失一定数量后，运输者注定要受到惩罚。其中对军官降职，停止支付薪水，对士兵发配前线。另外，受惩罚者也要弥补损失。

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sup>[24]13</sup>。

第三，沿海倭寇之苦，倭寇是有明一朝面临的主要问题。《明史》载：“洪武初年，倭奴数掠海上，寇山东、直隶、浙东、福建沿海郡邑。”<sup>[25]507</sup>倭寇袭扰沿海地区，致使明政府施行海禁政策，“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sup>[25]1300</sup>。故此，刘应节设想使用海运节约下的运军可用于加强海防，同时保证漕粮沿海北上路线畅通。

可惜的是方志记载中的重开计划均是不果而终，关于停工原因，隆庆五年的报告中给出答案如下：

海运胶州南海麻湾至北海海仓三百余里，可避大洋两千理之险，屡经勘议难开，具述于左。隆庆五年，奉旨委多官查勘，具莱州府知府、济南府同知青州府推官、掖县知县杨起元等揭称亲诣胶州麻湾等处，南自龙家屯，北至海仓一带勘毕。龙家屯四里三十步水浅不过三五寸，每日潮至不能打壩断水难施挑濬之工，店口三里有大沽河横冲带沙淤塞河，虽挑深遇沙塞前功尽弃。韩家口六里二百四十步具岡勾沙石，此处难撤水，不便挑濬。赵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长十余里，水深一二尺，河底具系岡勾石且有大有者，若欲深凿极为费力。杜家口至吴家闸三里余，系小沽河口横冲细沙，恐难壩治。吴家闸至谭家西南口止七里，其间具有淤沙岡石，其沙皆系白河水带来。谭家西口至分水岭共九里，白河全无接济，旱则先干，涝则冲决。窝铺分□至楚家口十里多流沙。楚家口至集□湾五里，□□□□现河口夏秋雨多，即有大水带沙入河，冬春干涸。董家庄至陶家庄四里余，内有崗石，一遇秋雨泊（笔者注）水湧入，无雨则干。□家庄至秦家圈泊水冲开沟口数道，雨则泛涨，无雨则干，并无□□□□，河底俱有沙石。谢家口至玉皇庙十一里，至于闸内，沙石相半，挑濬工费比之他处颇大。谢家口至杨家圈（笔者注），河岸水势似有端绪，说者谓新河可开或触目于此耳。杨家圈至新河闸□比之南□一带，虽似稍宽欲西引潍河但□□□沟引之无益，况潍河地势反下难以引入昌邑，又居□□□流所当祥议。新河闸至海仓，流沙壅满难以行舟，挑□□□颇大。新河系东省通衢，凡经过见者，起问此新河议开之端，由于此耳量得。潍河韩信壩口河中到东岸高三丈四尺，若濬沟撤水，必几四丈迤东。

中有高阜处所将不止于四丈矣，潍水难引委为的确。分水岭口东南老地周围开凿三丈余，上层至岸坚土四尺，中层岡石五尺，以下四尺俱是松软靡沙，旋挑旋隳，工役难施。两海通贯必深以六七丈始得，两平宽一十余丈始免崩岸。经费非百余万，程限非六七年不能成也。其功且轻言耶！两海开口尤属（笔者注）谬论……

——《胶莱河停工考》<sup>[16]42-43</sup>

通过上述材料可知，胶莱运河各段地形复杂，泥沙淤积严重，水量不稳定，耗费较多，难以轻言重开。除刘应节外，许多有识之士也注意到运道阻塞带来的弊端，未雨绸缪，建言开河。如正統年間邑人王坦曾建言：“往者江南常海运，自太倉抵膠州。州有河故道接掖縣，宜浚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險數千里，較漕河為近。”<sup>[2]2139</sup>

运道受阻的客观现实，加之官民的忧患意识成为明清两朝复议胶莱运河的重要因素。

#### 四、胶莱运河的社会价值

胶莱运河无论在历史的长河中，或于当今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笔者翻阅方志资料，作补充论述。

第一，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商人聚集海港，贸易物资。胶州湾自运河开通后更加繁忙。因此，胶州地区从商者多。《道光重修胶州志》载：“商大者曰装运、曰典当、曰银钱、交易皆一言为券，无悔改者。遇凶荒能急公周，乏其馀菽粟布帛、海错酒蔬之属，较近邑颇多贫者易于谋生。”<sup>[11]163</sup>可见胶州商业之盛，这与胶莱运河密不可分。

第二，加强了山东半岛海防与社会治安。胶莱运河开通后，兵防随即改变。运军成为运河沿岸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如上文刘应节提到设想利用运军加强海防。山东半岛一直是倭寇的侵扰地区。莱州兵营的设置，就是以“倭警创设”<sup>[16]93</sup>。另外，在运河沿岸重要地区增设巡检司以加强社会治安。洪武初年，明政府于掖县城西北设海仓巡检司<sup>[16]94</sup>。

第三，促进地方商业市镇的兴起。以平度新河镇为例，新河是胶莱运河的另一称呼，相较于已有的胶河等自然河流，文献中又记为新河。平度新河镇以新河

命名,成为沿岸商业市镇之一。新河镇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今青岛、烟台、潍坊三市交界,北接莱州、西临昌邑。在方志记载中,平度州、昌邑县均出现“新河集”<sup>[16]59</sup>的称呼,笔者考应为一处。乡村集市是商业市镇兴起的基础,后逐渐发展为今新河镇。

第四,胶莱运河是中华文明精神特征的重要例证。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明特征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sup>①</sup>元朝重用汉人开凿胶莱运河的过程,实是游牧为主文明主动融入农耕为主中原文明的过程。毫无疑问,胶莱运河的开凿吸收了传统河道工程经验,同时又是跨河联海的创新,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放大历史视角来看,胶莱运河工程开凿后勾连了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了古代中国对外联系,这体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深入发掘胶莱运河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增进文化自信,以文化带动区域社会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

## 结语

胶莱运河作为山东运河工程之一,是古代漕运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考察其开凿、停漕、及后世复议的历史片段,使我们对古代社会有更清晰的认知:运河是维系王朝稳定的重要手段,实现运河畅通离不开政府统筹,但也要兼顾自然条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诚如柯林武德所言:“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sup>[26]11</sup>。同时,在如今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如何对待胶莱运河历史文化遗产,这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的现实问题。我们应加强运河遗迹保护工作,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彰显中国文化特征。

## 参考文献:

- [1]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3] 李秀洁:《胶莱运河—中国沿海航运之枢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sup>①</sup> 参见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 [4]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济南：山东人民年出版社，2022年。
- [5] 李宝金：《元明时期胶莱运河兴废初探》，东岳论丛，1985年，第2期。
- [6] 薛磊：《元代的胶莱运河》，历史教学，2006年，第1期。
- [7] 霍有光：《评开凿胶莱海洋运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水利经济，2007年，第5期。
- [8] 王君、丁鼎：《元明胶莱运河兴废考略》，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 [9] 封明静：《元明时期胶莱运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 [10] 王婷婷：《胶莱运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 [11]（清）张同声修，李图等纂：《道光重修胶州志》，道光二十五年版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 [12]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著：《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文物图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 [13] 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
- [14] 刘永连、刘家兴：《从漂流人故事看唐代中外海上交通和海外认知——以〈太平广记〉资料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 [15]（元）赵世延，揭傒斯等纂修：《大元海运记》上卷，收入《史料四编》，广文书局，1972年。
- [16]（清）严有禧纂修：《乾隆莱州府志》，乾隆五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 [17]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崔旦《海运编》，据借月山房汇钞本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年。
- [18]（清）保忠、吴慈修，李图、王大钥纂：《道光重修平度州志》，道光二十九年版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 [19]（清）杨士骧等修 孙葆田等纂：《山东通志》，光绪年版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
- [20] 曹梦九：《民国高密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21]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

[22]（清）陆耀：《山东运河备览》，《中国水利史典·运河卷》，2015年。

[23]胡克诚：《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古代文明》，2016年，第2期。

[24]（明）王琼：《漕河图志》，《中国水利史典·运河卷》，2015年。

[25]《明太祖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1962年。

[26]（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 政治经济专题





#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based on CiteSpace

Weiman Sun, Xiaojian Cheng, Lu Zeng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up>①</sup>

**Abstract:**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a crucial topic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consistently garne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n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o being relevant to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of specific countrie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elect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this work uses bibliometric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 cutting-edge subjects and changing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The findings show a tendency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in terms of study themes and methodology,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search for causes, real-world trajectories, and empirical cases serving as the primary focuses of previous studies. Future themes in international status study will center on how competing and cooperative nations' quest of status impac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well as how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volves within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methods for strengthening China's position as a major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goal of creating a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alysi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tatus; Bibliometric analysis; Data visualization; CiteSpace

## Introduction

---

<sup>①</sup> Weiman Sun: Department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P.R. China Xiaojian Cheng, Lu Z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P.R. China Lu Z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0200321037@m.senu.edu.cn (LZ)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has witnessed significant changes, transitioning from the bipolar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o a unipolar world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sequently evolving towards a "multipolar" era.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U.S. hegemony, the slowing development of major power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Russia, and the rapid rise of Asian countries have led to a noticeable shift in the global power center. This shift has resulted in a succession of rises and fall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various nations. Statements such as "India is seek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an emerging great power" [1], "Russia is attempting to restore the glory of its past as a major power"[2],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riving to maintain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a superpower amid relative decline" [3] clearly indicate that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become a key objective of foreign policies for nations worldwide.

States, non-state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all included in the no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which includes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and levels of influence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t encompasses not just a country's geopolitical standing and strength but also attributes including standing,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s such, studie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rom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andpoint.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study material gathered from the SSCI, it carried out a methodical examination of this field. By using this approach, we hope to uncover the trends in global status research, highlight important academics and organizations, and suggest avenue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Even with the large amount of material compiled in the SSCI database,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st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sift through voluminous literature in order to pinpoint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The software CiteSpace was the preferred tool us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CiteSpace is a Java-based programme for bibliometric analysis that combines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data mining algorithms, and bibliometrics to display the findings as nodes and link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study material gathered from the SSCI, it carried out a methodical examination of

this field. By using this approach, we hope to uncover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highlight important academics and organizations, and suggest avenue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 **Research data and methods**

### **Data source and search strategy**

All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obtain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on January 8, 2024.

The data retrieval strategy is listed as follows: (I) Title= "Status Theory" or "Status Politics" or "International Status"; (II) Document type=article or review article; (III) Language= English; and (IV) Time span = 1990-2023. For meso-level citation top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were chosen, and for micro-level citation top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was selected. The specific search formula is depicted as follows: (((TI=("Status Theory" or "Status Politics" o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LA=(English))) AND DT=(Article OR Review)) AND DOP=(1990-01-01/2023-12-31).

Subsequently, a total of 1113 relevant articles were acquired. After manually deleting irrelevant documents and removing duplicates with CiteSpace software, a total of 257 valid articles were acquired,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literature records were determined as "Full Record and Cited References", with the documents exported in the "plain text file" format. The exported data included titles, keywords, references, etc., all of which were then further analyzed.

### **Analysis tools**

CiteSpace is a citation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based on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 software's technical foundation primarily rests on co-citation analysis theory and pathfinder network algorithms [4]. CiteSpace makes it possible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and visualize specialized area literature. Researchers can identify key trajectori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turning points of academic fields by using

CiteSpace's dynamic, temporal, and diversified graphs. It also enables the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articular field, ultimately facilitating predictions about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is paper conducted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y adopting CiteSpace to map the inform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nalyze both the past and current status,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Specifically, CiteSpace was used to create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and burst maps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literature, and methods such as co-author and co-affiliati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quantitatively and visually analyze international status-related studies [5].

Additionally,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s were combined with this approach to provid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pertinent literature, thereby systematically 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 Resul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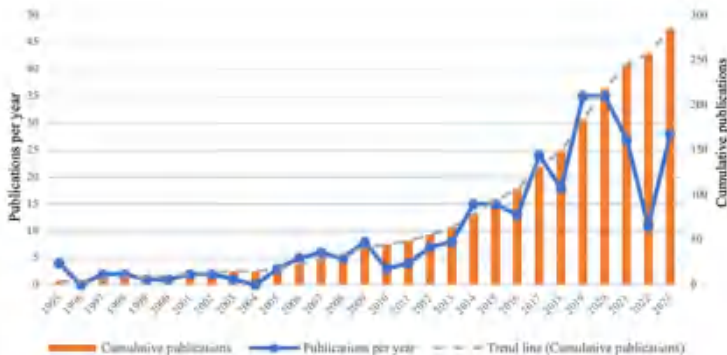
### Number and research trends of article published

The variation in the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indicated the progress and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a field. As of December 31, 2022, a total of 257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theme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According to the search result,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demonstrated an overall trend of annual increase, with a relatively fast increasing speed. From 1995 to 2011, the averag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was fewer than five. However, there was a steady progression phase between 2012 and 2021, reaching a peak in 2019 and 2020 (Fig 1).

This tre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various factors, notably the power shifts taking place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merging powers (mainly China, Brazil, India and Russia, but also other countries like Indonesia and South Africa) follow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decline in the power and prestig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epening of multiploidization. Especially,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great powers

and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global discourse have been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recent research boom. However, as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become more critical and questioning of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there has been a decline in enthusiasm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Fig 1. Annual trends of publica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 Analysis of author collaboration

Analysis of author collaboration revealed the core authors and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authors. In this paper, Price's Law from bibliometrics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core authors, using the formula  $M = \frac{N}{\sqrt{N_{max}}}$ . In this formula,  $M$  represents the minimum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y core authors, and  $N_{max}$  represents the maximum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y any author [7]. According to search results, 6 was the maximum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 author might have in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making  $N_{max}=6$ .  $M=1.83$  was the result of entering these values into the formula. As a result, authors are regarded as core authors if they have 2 or more publications.

A total of 256 authors were researched, with their relationships plotted by 82 connecting lines. The core authors include Deborah Welch Larson, Pal Roren, Kai He, Joshua Freedman, Huiyun Feng, Jonathan Renshon, Andrej Krickovic, and Joslyn Barnhart, noting that they had been active in academics and possess a larger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mong them, Deborah Welch Larson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with 6, while the other authors have published fewer than 4 papers. Some

of the nodes had connections with several authors nearby at the same time, indicating that the existence of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Despite the observation of a relatively significant collaborative network headed by Thomas J Volgy, the overall level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is still limited.

###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regions**

The country module in CiteSpac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untries/regions related to the articles. As shown in Table 1, the key countries/reg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greatest number of the articles were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Germany, Australia, and Denmark.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Russia, Sweden, and Japan were the top 6 countries/regions with the highest centrality, indicating the superior quality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se countries/regions. Three main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First of all, preserving hegemony and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traditional great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Russia are among the nations that best illustrate this.

Second, rising powers demonstrate a keen aspiration to compete for a more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status. China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in this field, which explains i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tudy. This aspect can also be used to explain why, due to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Germany and Japan aggressively aspire to become major players in world politics.

Finally, medium-sized nations show a clear concern for their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roles. These countries typically lack the capacity to actively seek for positions of great power, rather, they deliberately participate in low-politics affairs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nd discourse. This includes, among others, Australia, Denmark, and Sweden.

**Table 1. Top 6 countries/regions with the publications and centrality.**

Country	Centrality	Country	Number of publications
USA	0.63	USA	84
UK	0.27	UK	39
Germany	0.26	China	17
Russia	0.25	Germany	16
Sweden	0.15	Australia	13
Japan	0.14	Denmark	11

###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s was carried out via the institution module in CiteSpace, which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jor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made to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According to search results, the British Library (33 public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9 public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8 public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7 public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7 public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5 publications), and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5 publications) were the institutions with more than 5 publications.

Additionally,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significant networks have been formed by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Russian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Shenzhen University. These partnerships, meanwhile, are still very scattered and haven't come together to form robust academic cooperative networks.

### **Analysis of most cited publications**

Table 2 lists the top 10 most cited articles in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which can help research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se studies. The highest cited publication, with a citation frequency of 310, was Larson and Shevchenko's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published in 2010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when dealing with diplomatic relations by examining the 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of China and Russia in reaction to U.S. dominance in this area[8].

The second most cited work, with a citation frequency of 281, was Hurrell's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published in 2006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s article explained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made by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 response to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shifting global society. It also examined their current and future strategies: their standing as regional powers; how they behav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ow they interact with the US, etc. [1].

The third most cited article, with a citation frequency of 162, was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tus recognition" published by Wolf in 2011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Drawing on insights from mor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psychology, this article brought the idea of social respect in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linked variou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a country's status [9].

The remaining highly cited articles covered a range of topics related to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such as how states constructed thei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how it interac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y states failed to achieve great power status, how rising powers confront and interact to the trans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s,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tatus-seeking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 a state's diplomatic rank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how states shaped thei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how international status affects conflicts and militarization among states.

**Table 2. Top 10 most cited publications**

Serial Number	Lead author and Year	Title	Journal Where Published	Cited frequency
1	Deborah Welch Larson (2010)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0
2	Andrew M. Hurrell (2006)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81
3	Reinhard Wolf (2011)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tus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Theory	162
4	Christopher Clapham (1998)	Degrees of statehoo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9
5	Ian S.Lustick (1997)	The absence of Middle Eastern great powers: Political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03
6	David Scott (2008)	The great power 'Great Gam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e logic of geography'	Geopolitics	85
7	William C. Wohlforth (2018)	Moral author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ood states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tatus seek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84
8	Marina G. Duque (2018)	Recogniz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A Relation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81
9	Shogo Suzuki (2008)	Seeking 'Legitimate' Great Power Status in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s and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UNPK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7
10	Jonathan Renshon (2016)	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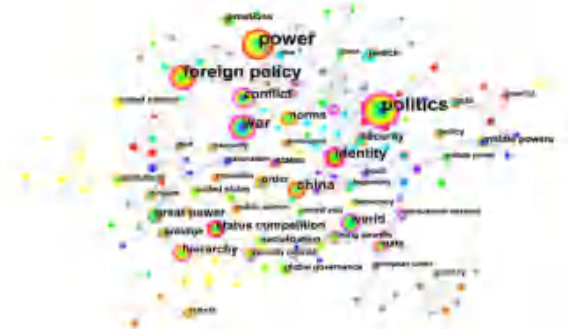
##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By identifying the most common keywords in the sample literature,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can shed light on the subjects and regions that researchers were most interested in studying. According to the search result, a total of 360 nodes and 1155 links were found based on keyword co-occurrence, with a network density of 0.0179. This can be seen in a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diagram (Fig 2) and a list of core keywords (Table 3).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bout frequency, "power,"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war," "identity," "China," "conflict," "great power," "hierarchy," "world," and "emotions" reflected the major contents in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over the past 33 years. The frequencies of remaining keywords were all below 10. Furthermore, Table 3 shows that the most frequent keywords and the keywords with the highest centrality largely overlapped. This implies that these keywords had important bridging roles within the research area, spanning the broad content of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It is clear from the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that major world powers—especially rising powers like China—were the focus of much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Within a state-driven framework, it represents a hybrid political ambition and pursuit characterized by nationalism as internal drivers, identity and power as objects of competition, war and conflict as primary forms, foreign policy as a representation, and hierarchy as the core.

Fig 2.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diagram



**Table 3. List of core keywords**

keyword	frequency	centrality	keyword	frequency	centrality
power	42	0.29	emotions	10	0.1
politics	42	0.21	norms	9	0.03
foreign policy	31	0.11	status competition	9	0.03
war	21	0.31	security	8	0.05
identity	17	0.1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0.11
china	14	0.11	global governance	7	0.02
conflict	12	0.2	cooperation	6	0.09
great power	12	0.08	peace	6	0.07
hierarchy	11	0.09	states	6	0.07
world	11	0.06	order	6	0.06

### Keyword time zone analysis

The keyword time zone map depicts the changes in keywords in different periods, so it facilitated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ir ev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providing insights for predicting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research field. After removing keywords with low frequencies, the top keyword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count value from each individual year to draw the keyword time zone map (Fig 3).

As shown in Fig 3, keywords such as 'war,' 'world,' and 'cold war' initially surfaced in 1995. Prior to 2000, these keywords constituted the main research topics of that period, along with 'order,' 'peace,'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ost-Cold War era saw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study, with researchers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order. Academics throughout this time frame centered on high-level political issues regarding security, collaboration, and war and peace.

In the meanwhil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expression “identity”



Summarizations were drawn for the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perspectives:

First, studies on the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One of the pillars and cornerstones of foreign policy, from a legitimization standpoint, is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a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 Because of this, academics typically begin their analysis of problem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status by looking at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Beginning with the three gr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y have evolved a number of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Traditionally, international status was understood by realist scholars as a type of power-based hierarchical ranking. It was defined as a 'collective belief about the ranking of a certain country in valuable attributes (wealth, coercive capability, culture,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status, soci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diplomatic influence)' [8]. Yet, liberals added to the conceptual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by incorporating political systems or ideologies into the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one'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10].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theories, the research agend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taken a new direction, providing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Among these, scholars inspired by Weber'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have expanded the widely observed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that is, people's concern for both their own social standing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groups they identify with—to th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y argued that status is a 'recognized identity,' emphasizing the perceptual nature and soci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11]. This kind of study has succeeded in conduc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paradigm concept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offering a variety of viewpoints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on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Second, studies on the motivations for status-seeking behaviors.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by a n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its hierarchical nature: Firstly, the aspiration to be ranked higher in relation to particular national attributes, and secondly, the desire for other countries to be in agreement with this ranking. The rationalist paradigm was adhered to by scholars who maintain the first

viewpoint, they saw the quest for worldwide recognition as a weapon in power politics by emphasizing the evaluation of costs and benefits in assessing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They asserted that, in order to withstand the pressure of systematic competition in shifting international power dynamics, they specifically aspire to strengthen national security, increase their autonomy, and boost their reputation in line with their power level by attaining international standing. In contrast, other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the micro-level dynamics of emotions rather than on observable material exchanges in an effort to examine how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ffect individuals and global politics. For example, some scholars have examined the emotions of humiliation and anxiety shaped by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xpected and actual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y found that these feelings can influence a nation's desire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9]. Furthermore, some scholars have delved into the domestic politics, arguing that nationalism and group-based emotions are strong intrinsic motivators for rising powers and emerging powers to pursue international status [12]. Others has revealed how the perception and beliefs of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and political elites affect rising powers' demands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13]. In conclusion, research of this kind aids in a deeper comprehension of the mechanics and causes of requests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Third, studies on the strategies of status-seeking practice. As demonstrated by William C. Wohlforth's observation that unipolar and multipolar international systems differ in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strategies chosen to achieve higher international status reflect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4]. Pri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major countries found that initiating and winning wars, engaging in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achieving conflict were vital and successful ways to ga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15]. However, the advent of the nuclear era and the rise in anti-colonial movements raised the dangers of war, conflict, and terrorism to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and security bolstered the system and advanced global peace. As a result, contemporary countries actively look for ways to manipulate international

norms to improve and maintain their international status within a framework of peace and laws. Hegemonies, for instance, frequently employ trade as a tool to preserve their advantages insid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o steady their standing abroad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However, a more practical strategy for achiev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for medium-sized and emerging nations is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dress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particularly lower-order political issues like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governance—or establish a presence in regional or glob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16].

Fourth, cas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examined var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tatus desires and assertion techniques among n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position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ith a comparatively greater focus on the viewpoint of regional countries [17]. Or studying the paths and strategies used by regional powers to ga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during the hegemony's fall from a dynamic standpoint [18]. As well as the crucial part that recognition from a major power play in the process of elevating small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tatus [12]. Simultaneously, researchers have examin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tatus, concentrating on examining vari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jor powers and their assertion practises, including Sino-US, Sino-Russia, and Sino-India [19,3,20]. Additionally, some academics have focused on particular subfie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ghlighting the influence of intervening factors (such as concerns pertaining to human rights, nuclear pow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tc.) on a nation's standing and actions abroad [21-23]. These articles enhanced empirical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by illuminating status competition strategies from a viewpoint distinct from the conventional interest analysis for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g 4.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Table 4. Keyword clustering**

Cluster number	LLR Label	Silhouette	Research topics
#0	competition	0.964	competition; rivalry; power shift;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hegemony; middle power; role theory; role conception
#1	peace	0.954	peac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r involvement; liberalism; trade; politics; Germany; identity; Asia
#2	foreign policy	0.965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spirational constructivism; middle power; hegemony; crisis; China; Brazil; united nations
#3	politics	0.924	politics; reputation; similarity; identity; power; third world; peaceful rise; Latin America; multipolar world
#4	central Asia	0.813	central Asia; rising powers; belt; pacific; south Asia; power
#5	power	0.891	power; reputation; consequences; cooperation; territorial; conflict; prospects; social identity; rise; stability
#6	east Asia	0.908	east Asia; human rights;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Brazil; regional powers; security; anti Americanism
#7	humiliation	0.874	humiliation; recognition; face; dignity; status; self-esteem; group-based emotions;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power
#8	escalate	0.888	escalate; financial incentives; psychology; power;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 school; politics; status competition
#9	patterns	0.984	patterns; aggression; uncertainty; perception; psychology; proximity;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Cluster number	LLR Label	Silhouette	Research topics
#10	civil war	0.993	civil war; emergence; benefi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agmentation; prospect theory
#11	conflict	0.884	conflict; European union; regional security; Israeli Palestinian conflic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tatus
#12	status	0.87	status; united states; realism; Belgium; hierarchy; prestige; russia; conflict

### Keyword burst analysis

Burst analysis was a useful method for discovery of hot terms receiving special attention from relevant scientific communities ov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burst analysis in this study involves such elements as the study subject, the strength value, the first appearance year, the burst start year, the burst end year, and the timeline. The burst analysis of keywords is presented in Table 5.

According to the burst analysis of keywords, keyword 'United States' was first rated with the largest strength value and its burst duration ended in 2007, indicating that early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hegemon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keywords "war" and "conflict" denotes the serious interest that academics had in the ways that wars and conflicts impact a country's status. Regarding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middle power," "emerging powers," and "great power" imply that as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have developed, they hav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distinguished between a variety of research objects, expanding the horizons of such studies. Among these, 'great power' had the longest burst duration, indicating that great power politics continued to be the focus of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Furthermore, since 2018, the terms "norms," "global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council" have been increasingly prevalent. These terms together demonstrated the growing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norm-based strategies in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able 5: Keyword burst table**

Keywords	First Appearance	Strength	Start Year	End Year
United States	2006	1.19	2006	2007
conflict	2006	1.55	2010	2011
middle power	2012	1.63	2012	2014
war	1995	2.47	2014	2017
great power	2014	2.42	2014	2018
emerging powers	2014	1.33	2014	2016
hegemony	2013	1.71	2016	2018
global governance	2016	2.17	2018	2019
norms	2008	1.79	2018	2019
security council	2019	1.90	2019	2020

## Discussion

Through the use of bibliometric research, we can rapidly identify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33-year period, there has been enough study published to offer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without significantly changing overall patterns.

In this article, CiteSpace was used to perform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that had been included in the WOS core set between 1990 and 2022. This is an attempt to fill a research gap in this area. The results of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were categorized a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limitation, and research prospects.

## General information

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have been published worldwide. The previous few decades have seen a sharp rise in quantity, and it is currently in a deep development period with substantial potential for growth. Well-known academics like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Thomas John Volgy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this topic and have established a tentative collaborative network; yet, in general, there is a dearth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comparison between investigations, which impedes the growth of pertine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 growing number of academics are bringing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in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substantially enhancing the pertinent studies and creating a variety of compelling ideas about international status. However,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global status research is challenging due to the inherent inconsistencies arising from disparate methodologies.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ree dimensions are primarily included in current research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namely material, value, and social. At the material level, quantifiable metrics like population, income, technological prowess, and military might are prioritised. Indicators including culture, civilization, political systems, and ideologie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t the value level. In terms of ident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s are highlighted at the social level. While these diverse research viewpoints add to the richnes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studies, they also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core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research hotspot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status represent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require resolution and were primarily identified using keyword analysis.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still debate in academics on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which is a major worry. What is international status? What criteria should be used to determine a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atus?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trategies for seeking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what ways does the no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explain foreign policies? As of right now, opinions on the responses are divided and rely on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defines an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ower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of great interest to scholars; on the other hand, a new area of focus in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is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seeking behaviour of some middle powers and

regional powers.

### **Research limitations**

As Stephen Ward noted, "Despite our reliance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to explain important phenomen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uch as wars and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rising sta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international status affect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remains limited" [6]. This highlights the ongoing debates and divisions in this field. Some of the present studies' deficienci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call for the efficacy of various approaches to be reevaluated. Scholars have typically assumed that a country's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its status, even if this viewpoint does not discount the social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it effectively reduces international status to practises and confuses social ties with actor traits. While it seems intuitively clear that a n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re correlated, academics sometimes find it difficult to offer methodical support for these presumptions. As a result,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knowledge—particularly social identity theory—was introduced and has since taken center stage in global status research.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riticisms about this analogical research approach's usefulness and how it unnecessarily restricts the spectrum of phenomena that may be described by referenc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dynamics.

In terms of research topics, attention to smaller states and quasi-states is still limited.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predominantly centers on sovereign states,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elucidating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pursuits of status by major powers. Therefore, there exists ample scope for diversifying the scope of research beyond this conventional focu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that has already been done frequently ignores the legal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marginalizing the efforts of quasi-states like South Ossetia, Kosovo, and Palestine to obta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Moreover, when it comes to empirical study, scholars frequently overlook the variety of global hierarchies and norms that exist in global society since they nearly always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a whol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status of a

country may differ in several areas, not much research appears to have been done to differentiate them.

### **Research prospects**

This article has investigated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found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According to this, advances in the comprehension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by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can be pursued in four approaches:

First, strengthen scholarly cooperation to advance the paradigmatic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re is currently no established academic cooperation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As a result,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bol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dditionally, it is crucial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aradigms. In particular,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in the analysis of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demonstrated by the way they can be used to explain certain irrational behaviours and concepts in state-to-state interaction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Second, by anchoring the inquiry in actual politics, examine the pragmatic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using empirical data. As previously stated,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must acknowledge the complexity and adap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norms, emphasizing the variations in a country's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well as the status-seeking tactics employed in response to various assessment standards and concern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gradually transition from many specific studies into closely related but distinct study topics, future research must undertake multiple case analyses and broaden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earch to a wider spectrum of players' responsibilities in global governance processes.

Third, provide a methodical research framework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ory's capacity for explanation. On the one hand, a generally recognized methodology

still has to be developed in order to quantify sensory perception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international status. On the one hand, an universally recognized methodology is still necessary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sensory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three analytical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nd individual have been studied in the past. This woul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ory in directing the formulation of foreign policy and forecasting state behaviour, as well as help investigate the link and causal mechanisms between interest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other interests.

Finally, consider strategic options for China's context-specific ascent to great power status. To enable China to actively engag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ject a responsible image as a great power, it is imperative that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take into account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while protect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Furthermore,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matters concerning China's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uperpowers, especially its competitive-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throughout the power shift. Future studies should therefore focus more on practical issues and offer more strategic optio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hina's ascent to promin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volume of publica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would keep rising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cholars with some helpful references by conceptualizing a macro picture of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a core country in this field, exert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 Among institutions, the British Libra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s progressively spearheading the field's advancement. A thorough grasp of this topic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published research, which has exposed the definitions, reasons, and techniques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order to build a more method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research in the

future is probably going to concentrate on investigating interdisciplinary viewpoints and methodologies as well as performing multicase analysis. In brief, there remains a significant untapped reservoir of study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To further expand the area, scholars should employ different paradigms, methodologies, and viewpoints to elucidate and quantify international status.

## **Acknowledgments**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with thanks to Dr. Xiaohong Wan.

## **References**

1. Hurrell AM.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82(1):1+.
2. Scepanovic J. Russia, the Western Balkans, and the Question of Status. *Sage Journals*. November 17, 2022.
3. Stein JG. How not to think like a hegemon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98(5):1615-1633.
4. Chen C, et al.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o-citation clusters: A multiple-perspective co-cit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61(7):1386-1409.
5. Chen C.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57(3):359-377.
6. Ward S. Logics of Stratified Identity Management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2019;11(2):211-23.
7. Barrios M, et al. A bibliometric study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tourism. *Scientometrics*. 2008;77(3):453-467.
8. Larson DW, Shevchenko A.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0;34(4):63-95.
9. Wolf R.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tus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Theory*. 2011;3(1):105-142.

10. Luard 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6.

11. Murray M. Identity, Insecurity,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The Tragedy of German Naval Ambition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Security Studies*. 2010;19(4):656-688.

12. Finnemore M, Jurkovich M. The Politics of Aspi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0;64(4):759-769.

13. Ward S.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 Wohlforth WC.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2009;61(1):28-57.

15. Renshon J. 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6;70(3):513-550.

16. Park A, Confortola GJ. Small State Status-Seeking: Lithuania's Foreign Policy Status Aspirations. *Europe-Asia Studies*. 2021;73(7):1279-1302.

17. Kai H, Huiyun F. Role status and status-saving behaviour in world politics: the ASEAN ca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2):2.

18. Troitskiy M. The Emerging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Regionalism: Structuring Effective Reg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Global Policy*. 2019;10.

19. Larson DW. An equal partnership of unequals: China's and Russia's new status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0;57(5):790-808.

20. Yoshimatsu H.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Geoeconomic Rise: Hedging With a Multipronged Engage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2022;68(4):593-611.

21. Snyder J. Backlash against naming and shaming: The politics of status and emo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0;22(4):644-653.

22. Fink AL, Oliker O. Russia's Nuclear Weapo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Guarantors of Sovereignty, Great Power Status & More. *Daedalus*. 2020;149(2):37-55.

23. Liao JX.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towards Central A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on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acific Review*. 2019;34(3):490-522.

# 数字经济背景下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左玲玲 李浙怡（宁波财经学院）

## Research on Strategies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in Zhejiang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内容摘要：**近年来，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看待，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全省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迅猛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制造业出口作为浙江省出口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浙江省出口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顺应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推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步伐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制造业出口现状的分析，总结出现阶段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数字化人才紧缺、出口商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等。面对新经济形态发展现状结合现阶段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现状和问题，从政府、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对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Zhejiang Province has deeply implemented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during his inspection of Zhejiang, regar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top priority project," vigorously promoting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The province's digital economy has shown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Meanwhile, manufacturing exports,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Zhejiang Province's export trade, hol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province's export trade. Adapting to the wave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xports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become urg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nufacturing exports in Zhejiang Province,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t this stage, such as incomplet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rtage of digital talents, exports still dominated by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export market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new economic form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trade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xports in Zhejiang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por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 1. 引言

在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尖端技术的迅猛推动下，中国数字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发展方向正逐步迈向经济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口贸易也在这场变革中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传统贸易正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凸显，疫情的冲击也持续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然而，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出口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其向全面主动性和局部被动性提升的模式转变，开启了新一轮的转型升级。

在这一背景下，浙江省敏锐地把握住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积极应对挑战。2022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已达到8977亿元，相较于“十三五”计划初期，这一数字实现了翻番增长，在GDP中的占比也跃升至11.6%。更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产业数字化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首位，充分显示出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浙江省民营经济机制优势、集聚优势和营销优势的重要载体，制造业在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据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表现抢眼，出口额高达

34325.4亿元，同比增长15.1%，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近80%。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顺应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已成为当务之急。

## 2.数字经济背景下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现状

### 2.1 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规模

浙江省积极落实“走出去”战略，凭借自身地理位置以及政策优势，审慎度视把握机遇，积极进行调整，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在全球形势动荡、竞争激烈的当代对外贸易仍持续发展，制造业出口贸易仍强劲发展。

观察图2-1可见，2012—2022年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2012年的13990亿元到2018年的21182亿元，再到2021年的30121亿元，从10000亿元逐步突破20000亿元、30000亿元大关，增长态势良好。近年来，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额呈现良好态势的原因不仅包括浙江省制造业基础力量雄厚，“一带一路”倡议等对外贸易政策的支持等，还离不开浙江省政府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以及“一号工程”2.0等政策的逐步推进，浙江省加快数字化改革，完善相关基础设施，积极推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策略，推动制造业转型，提高制造业出口质量与水平，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水平，更好地迎合国际消费者需要。近两年，在战略与政策不断完善与优化过程中，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额增长速度有所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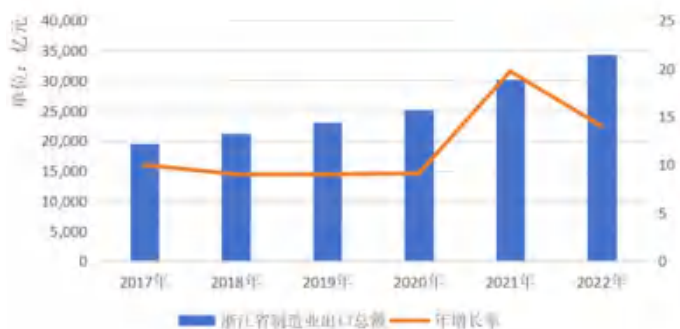


图 2-1 2017—2022年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额及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浙江省商务厅、浙江海关、2012—2022年浙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2 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

由图2-2可知,2017—2022年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中,总体上仍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中,机电产品出口贸易额最多,2022年高达15326.5亿元,所占的比重最大,达44.7%。成为浙江省第一大类出口商品;纺织服装产品是浙江省第二大类出口商品,2022年出口贸易额达5957.6亿元,占比17.4%;其次是八大类轻工业产品,占全省制造业出口总额的15.9%。计算机与通信、生命科学、光电、环保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出口贸易额3453.6亿元,占比仅10.1%。由图2-3得,虽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相比于机电、纺织产品相对较低,但其增长速度较快,出口贸易额从2017年的1272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3453.6亿元,2022年同期增长高达27.3%,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商品虽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是自2017年随着浙江省数字经济各项政策不断落实和深入,以计算机与通信、生命科学、光电、环保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发展后劲十足。



图 2-2 2017—2022年浙江省制造业各类商品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浙江省商务厅、浙江海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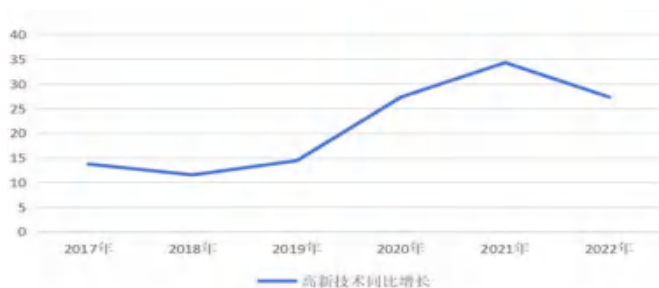


图 2-3 2017—2022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省商务厅、浙江海关

### 2.3 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市场结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由单一逐步走向多元化，由起初的苏联、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发展至世界各地。

从出口市场大洲分布情况来看，根据图2-4可见，2022年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以及北美洲，贸易额占总量的35.6%、25.1%以及18.5%，出口总额分别为12226.5亿元、8606.2亿元以及6335.3亿元，同比增长22%、7.2%、5.1%，仍呈上涨趋势，这也意味着浙江省制造业贸易出口剩余三大洲占比不足21%。就贸易伙伴而言，2022年浙江省排名前三的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美国和东盟，出口贸易额分别为6403.2亿元、5717.3亿元以及4351.8亿元，在出口贸易总额中占比分别为18.7%、16.7%和12.7%，同比增长11.1%、3.7%、27.8%。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首先，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并且有着广泛的互补合作能力与需求，两国企业和消费者都从双边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利益，虽然其增长速度不比欧盟与东盟，但是其仍是主要出口市场，出口占比仍然较大。其次，在“一带一路”贸易政策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发频繁，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加，且由于这些国家现阶段大多处于加快城市建设中，对于浙江省基础设施机电产品、电子信息设备具有较高的需求量，因此，近些年即使在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浙江省对于东盟的出口贸易额和占比增长仍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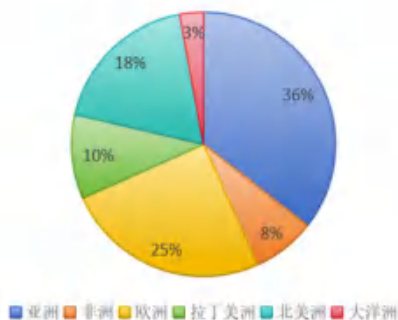


图 2-4 2022年浙江省出口市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省商务厅、浙江海关

## 2.4 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方式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浙江省近年来的出口贸易方式主要以一般贸易为主,如表2-1所示,2017年至2022年一般贸易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出口占比始终占70%以上,鲜明体现了浙江省传统的出口贸易特征。浙江省制造业在一般贸易方式下,从购买原材料到加工装配再到成品都在本地完成,生产流程相对较为独立,即使在2019—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下也保持较为良好的增长态势,这一过程也给本地上下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帮助。在这种趋势下,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加工贸易所带来的高污染、高能耗等问题也逐步得以解决。

表 2-1 2017—2022年制造业出口贸易方式及增长情况

年份 贸易方式与增长	一般贸易出口额 / 亿元	同比增长	加工贸易出口额 / 亿元	同比增长
2017 年	15508	11.3%	1701	8.9%
2018 年	16968	9.5%	1874	2.2%
2019 年	18250	7.6%	1774	-5.3%
2020 年	19863	8.8%	1784	0.5%
2021 年	23685	19.3%	2089	17.2%
2022 年	26928	13.7%	2239	7.2%

资料来源:2017—2022年浙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省商务厅

## 3 数字经济背景下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

### 3.1 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为我国产业转型提供良好的背景以及巨大的发展空间。尽管目前国家的相关法律方面发展迅猛,省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在积极研究省级对应法律法规,但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经过不断打磨积累、完善细化的。也正由于此,数字经济背景下相关法律法规的发展存在一定滞后性。现如今仍有用户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网络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同时,数字经济背景下,许多制造型企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型,完备的法律法规是保证其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基础,而相关法律的缺失也就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约束了数字经济下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也阻碍了数字经济助力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的脚步。

### 3.2 数字化人力资源上存在短缺

浙江省数字型人才存在严重短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浙江省绝大多数制造型企业为中小型企业，而正是这些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往往抱着固守成规的思想，缺乏全局意识和数字化思维，对于数字化转型不迫切，不能及时把握时代发展趋势，难以及时推动自身企业的转型升级，也进一步阻碍了企业出口贸易发展。其次，浙江省数字化人才培养难以满足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步伐。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源素质要求较高，而浙江省知名高校相对较少，不能满足企业对于数字型人才的需求。

### 3.3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度不高

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优化转型的关键。通过近年来相关数字经济报告可以得出，浙江省大多数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水平仍不是很高。浙江省制造型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且中小型企业数量众多。而中小型民营企业往往受限于对于新事物认识、技术能力、资金等方面的原因，面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大、见效慢的形势，不愿意进行深层次从生产、管理、销售、服务等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仅进行部分数字化改造，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缺乏深度融合，使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困难，从而进一步影响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发展。

### 3.4 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相关政策的不断落实，数字化技术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但是由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上看，虽然高新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份额仍然较大，以传统机电、纺织产品出口为主，这些产品对于原材料、劳动力的投入依赖较高，研发水平要求相对较低，产品附加值不高，易受国际成本波动的影响，国际竞争力弱。由此可见，浙江省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尚未摆脱传统要素的依赖，在核心技术领域引进进度较低，在核心技术领域存在“卡脖子”现象，使出口贸易依赖性较高，阻碍了制造业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

### 3.5 制造业出口区域集中度高

由今年来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分布情况来看,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市场分布大洲情况主要聚集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且这三大洲所占比重较大。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东盟、日本等国家,且所占比重仍呈上升趋势。可以看出,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区域集中度仍然较高,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反全球化趋势反扑的当今时代,出口贸易存在一定的风险,倘若某一主要出口国家对本国产品实施针对性措施,那么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便会遭受强烈冲击。

## 4 数字经济背景下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 4.1 政府层面

#### 4.1.1 强化顶层设计,继续完善相关基础设施

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份,目前正处于向数字经济加速过渡时期,迫切需要政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全局性的战略政策,总领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方向,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规范推动数字经济背景下各产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得以良好发展的基石是数字基础设施,将传统制造业相关基础设施与数字化相结合,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至关重要。要继续打造全方位、宽领域的信息共享平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提升数字信息技术,提高数字经济背景下先进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企业间的渗透率,优化生产流程以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水平,调动本省传统制造业主动参与意识,提升积极性。同时继续扩大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5G基站建设投入力度,增加IPV6地址数,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数字化基础。

#### 4.1.2 建设数字安全监管体系,规范发展秩序

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出口转型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现状,有关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加快推动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等相关涉及数字经济下信息管理与保护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规范数字经济下各参与主体的行为,为制造业企业转型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进而推动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转型与发展。同时,浙江省政府应强化数据流检测工作,提高境内与跨境数据流检测能力,建立能够铺货供应链信息的系统解决方案,提高抗风

险能力，有效预防及应对数字经济北极关系数字贸易所带来的经济、税收等各类风险。

#### 4.1.3 引进与培育创新型人才，充实转型后备军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过程中离不开新型数字化高精尖人才这一支持要素，对创新型管理人才要求更高。而面对浙江省数字化人力资源的短缺，需要多措并举，既要注重人才引进又要关注人才培养。在人才引进方面，浙江省各级政府要合理有序增强对高精尖数字型人才的吸引力，加大引进力度，在人才引进中要给予生活保障、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倾斜。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加强校、政、企合作，政府牵桥搭线，加强校企联系、共通合作，培养数字化人才。同时，浙江省各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创新人才基金，举办有关数字化、信息化的相关赛事，培养高校学生数字化思维模式，培养出数字化创新型人才，以满足数字经济发展需要。

#### 4.1.4 培育制造业数字化龙头企业，加快产业协同发展

浙江省政府要对接国际高标准，加大引进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数字化企业，致力于培育世界级高水平制造业数字化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带头浙江省中小型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推动浙江省传统制造型企业转型。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引进投资和整合资源，走“新型化”“数字化”“专业化”道路，对企业采购、物流、销售各环节进行技术的数字化专业改造，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鼓励龙头企业积极上市，将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企业知名度，融入全球化发展步伐。通过世界级高水平制造业数字化龙头企业的打造，可以发挥其的带头引领作用，为其他中小型制造型企业提供详细、可借鉴的建议指导。其次，政府要积极推动产业联盟建设，推动智能园区建设，加大各制造业企业间资源共享能力，推动制造业产业协同发展，提高整体的竞争力。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打造产业创新平台和产学研研究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加大创新技术投入，搭建行业创新研发平台和产业创新技术联盟，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研发中心、实验室，共享关键技术。最后，支持制造业数字化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链赋能平台，重点面向机电、纺织、电子信息等行业，加强整体供应链集聚整合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

#### 4.1.5 完善政府政策支持体系,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为推动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要推动制造业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可以借鉴欧美等国的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策略, 在人力资源、资金启动、税收减免等方面为制造业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支持。同时在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 也应该从实际出发, 立足于浙江省的产业基础以及优势条件, 给予中小型制造型企业更多的财政支持, 设立专项基金、减免税收, 支持其引进高端技术, 推动浙江省众多传统中小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升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另外, 推动产学研合作平台建立, 政府要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联系, 使科技研究成果更高效地转化成实际生产力, 切实提高浙江省制造业发展水平, 提升浙江省制造业商品出口贸易实力。

#### 4.1.6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坚持“走出去”战略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针对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区域集中度较高的现状, 仍要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力度, 不仅要“引进来”, 更要加大“走出去”步伐, 深入开展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合作, 鼓励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建设、“RCEP”等合作发展契机的基础上, 也要作为企业发展坚强的后盾, 为其在报关报检、政策监管方面提供便利。同时, 建立起相对应的风险应对政策, 帮助企业尽可能地降低风险或规避风险。即使在遇到风险时, 也要保护本省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将风险降低, 为制造型企业拓宽国际市场提供坚实的后备力量。

### 4.2 企业层面

#### 4.2.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增加产品附加值

企业自身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唯有锚定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 才可以推动出口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才可以更高效地推动制造业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企业要破除固守成规思想, 组织研发部门开展智能产品创新和数字技术研发, 并及时与市场部门进行衔接, 进行新产品使用推广, 逐步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

#### 4.2.2 深度融合数字化与制造业, 提升出口竞争优势

制造型企业要将数字化融入制造业生产、销售、运营管理的全过程, 主动推动数字化与制造业相融合, 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与配置, 降低经营成本, 提升出

口竞争优势。首先,在生产流程中,企业要善于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将海量信息进行整合并通过MES系统进行信息处理并形成具有时效性的最佳方案,提高出口商品供需匹配度,实现由刚性生产到柔性生产转变,满足国外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资源整合,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水平,打造出口竞争优势。其次,在销售流程中,浙江省制造型企业要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善于利用中国制造网、亚马逊、WISH、eBay等跨境电商平台,改变传统被动的销售模式,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赋能,打造具有自身优势的智能销售平台;最后,在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支持下,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创新企业管理新模式,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数字管理体系,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决策等各方面,以制造企业本身为中心,将数字化管理模式贯穿产品生命周期的全环节,涉及制造企业上中下游供应链,提高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

#### 4.2.3 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打好创新发展基础

数字化人才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企业要保持与各大高校以及研究院之间的联系,加强校企联系、共通合作,培养数字化人才,从高校和科研院中吸纳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真正需要的高层次、专业性高的高素质人才,为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提供后备军力量。在企业内部,在人才培养方面,为员工提供数字化技能培训以及相关课程学习,不断提升相关专业能力,适应数字化转型需要。同时,要制定人才奖励机制,用以激励传统型员工逐步参与数字化相关工作,培养员工数字化转型意识。

#### 4.2.4 把握合作机遇,继续拓宽国际市场

企业要把握“一带一路”建设以及“RCEP”下所带来的区域高度贸易便利化机遇,积极了解相关国家的优惠关税政策,制定市场多元化战略,根据不同国家,采取差异化的出口政策。同时适应性、前瞻性地调整销售渠道,善于利用数字经济下中国制造网、亚马逊、WISH、eBay等跨境电商平台,深入发掘国际市场,积极开拓市场份额,在现有市场基础上进行更多国际市场的开拓,降低由于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而带来的风险。但是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前对出口国家进行调查,以防止经济、政治动荡给企业带来风险。

## 参考文献

- [1]王瑞荣.数字贸易推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J].现代管理科学,2021,(01):114-120.
- [2]覃美英.宁波市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路径与对策[J].对外经贸,2023,(05):12-15.
- [3]樊文静,蒋瑞波.浙江数字贸易发展的对策研究[J].金融经济,2019,(06):39-42.
- [4]吴旻.浙江数字贸易发展的人才瓶颈及对策研究[J].中国商论,2020,(06):246-248.
- [5]尹忠明,史兆晨,王嘉琪.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影响[J].财经科学,2023,(12):132-145.
- [6]张修凡.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J].江南论坛,2024(01):62-66.
- [7]谭茈莹,蔡燕,高宇.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优化路径分析[J].河北企业,2022,(11):43-46.D
- [8]A. M P. Digital trad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2023,55(7).
- [9]Muljono W,Setiyawati S. Digital economy: the main power for digital industry in Indone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de and Global Markets,2022,15

# 中国本土品牌与跨国品牌竞争策略分析

庞玉立（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

**内容摘要：**中国加入WTO后，凸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华为、比亚迪、小米等为代表的本土品牌异军突起，并开始进军欧美市场，并展开了与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本土品牌与跨国品牌的竞争呈现出了出新的特点与发展态势。以技术研发和产业链为核心建构的品牌竞争策略，已成为本土品牌战略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品牌；全球化

## 一、中国本土品牌和跨国品牌的竞争背景

自中国加入WTO后，国内企业与国际品牌之间的竞争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竞争也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成长。一个品牌的实力不仅取决于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情况，还要看它是否能够成功进军国际市场，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上是否具备竞争力。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消费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品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品牌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

那么，如何理解品牌的内涵呢？英语“品牌”(brand)源于古挪威语的“brandr”，意思是燃烧或打上烙印。确实，从词源学意义上来看，古代人们在牛、羊等牲畜身上打上烙印以表明主人，在未干的陶器底部按上指印，或者是在斧头、镰刀、木桶等工具上烙上印记，以表明生产者身份，这些都是品牌的雏形。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增长，品牌印记的使用逐渐普及，从而带来了明显的附加值增长。工业革命后，随着品牌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人们开始运用知识产权的方式来寻求保护品牌，于是商标和商标法也随之产生。商标法第一次出现在1803年的法国，之后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制定了商标法，这进一步推动了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普遍应用。

商标的诞生受到品牌的推动，而商标又进一步促进了品牌的壮大。对于商业经营来说，打造品牌意味着什么？首先，可以识别和区分货物。品牌的形成源于市场竞争，它是区分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重要标志，品牌是独一无二的。

公司的标识和文字设计与竞争对手截然不同,凸显了公司和产品的独特之处,不同品牌代表着产品的差异,所以消费者可以更快更准确地做出购买决策。品牌是消费者认知产品、作出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可以通过识别品牌特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产品特点做出购买决策。其次,品牌反映了产品或业务的核心价值,品牌的价值不仅在于产品与竞争对手的差异,还在于构建独特品牌个性。消费者通过与品牌互动和体验,逐渐建立起对品牌的情感认同,并把购买和使用的经历记录在内心深处,从而培养出对品牌的忠诚。

根据权威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通常会考虑自己的个性特征,选择与自我形象或期望相匹配的品牌。为了彰显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企业在打造品牌形象时极其注重品牌视觉设计,力求展现独特文化和理念,刺激受众积极联想,形成独特品牌认知。消费者对百事可乐的看法是年轻、充满激情和时尚,对可口可乐的看法是代表着美国精神、纯正和酷炫。品牌可以再次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须树立起品牌,这是一种必要的战略观念。人们希望借助品牌来识别产品和企业,通过品牌塑造忠诚消费者群体,从而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优秀的品牌可以引导消费者形成消费依赖,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具备市场扩展的能力,或利用品牌实力进行跨界经营,壮大企业规模。因此,品牌作为市场竞争的重要策略,通常可以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

品牌也是超越产品同质竞争的有效途径。如果产品性能相似或相近,通常企业会降低价格来获得市场竞争力。如果公司能够建立起强势品牌,便可以避免涉及同类产品的竞争,进而获得更高的品牌附加值,从而提高利润。英特尔处理器、微软电脑软件、Louis Vuitton 箱包、兰范香水等知名品牌,都超越了产品同质化竞争的窠臼,通过建立强势品牌,成功脱颖而出,获得了巨大的附加值利益,超越了产品同质化竞争的限制。品牌的价值在于其影响力,尤其是对于强势品牌,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并显著提升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 二、中外品牌的竞争状况与本土品牌成功与失败原因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上,中国品牌与国外品牌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本土品牌正在迎头赶上,在许多领域已经开始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品牌。在许多领域,国际公司的品牌依然处于竞争的领先地位,并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在家电行业，国内品牌已经在竞争中击败了国外品牌，获得了领先地位。电视、空调和洗衣机市场，排名前三的竞争力最强的品牌都是中国国内的。海尔是中国家电行业的领军品牌，在电冰箱、空调和洗衣机领域都名列前茅。

在IT领域，联想在个人电脑市场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是IT行业的领头羊。即使苹果、惠普、戴尔、微软等知名品牌已经失去了以前的绝对垄断地位，国产电脑在短期内依然难以取代它们。

在食品饮料行业中，国内品牌和国际品牌平分市场份额。外国品牌在碳酸饮料、奶粉、速食面、茶饮品和果汁饮料领域一直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红牛和雀巢等。农夫山泉、娃哈哈等国产品牌在白酒、葡萄酒、瓶装水、食用油、速冻食品等领域中表现卓越，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在生活用品行业，国内品牌在国际品牌的竞争中努力寻求突破。日化行业包括香皂、牙膏、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洁肤品、润肤品、洗衣粉等8个领域，外国品牌在其中占据了5个领域的第一名，而国内品牌只有5个品牌跻身榜单，占总数24个。因此，中国本土日化企业仍需要更多类似雕牌、大宝和六神这样优秀的品牌来竞争<sup>①</sup>。

尽管金融领域已经允许外资进入，但本土品牌仍然控制着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消费者规模庞大，使得国内品牌在市场上具有较大优势。这一现象与中国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保守、消费观念较为理性，更加注重产品实用性紧密相关。我国国内品牌在化妆品和奢侈品领域的竞争力相对较弱，而在耐用品领域的竞争优势较为突出。国内品牌在竞争中的优势主要在于性价比高、成本优势明显、价格适中、产品创新快速、产业链整合和市场规模优势都是国外品牌所不具备的。另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国内品牌在外观设计、技术研发方面仍有很多不足之处，要提升品牌的国际化水平及国际传播策略。

### 三、中国本土品牌与外国品牌竞争策略分析

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众多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品牌策略不断扩大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从而对本土品牌形成一定压力，引发了激烈的

<sup>①</sup> 王学评；孙班军；孙芳. 构筑品牌竞争力 [F].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3:197-232

品牌竞争持续不断。在80年代初期,我国本土品牌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跨国品牌开始强势进入市场,不论是德国大众、日本本田、法国雪铁龙等汽车品牌,还是快消品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品牌,西方品牌都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本土品牌的崛起,中国品牌开始与西方品牌竞争市场份额,海尔、格力、美的、娃哈哈、农夫山泉等本土品牌崭露头角,引领本土品牌风潮。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本土企业不断壮大,华为、比亚迪、小米等优秀本土品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开始大规模进军国际市场,使中国品牌声名远播。近40年来,中国市场上跨国品牌竞争策略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要之处在于采取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本地化营销策略。很多跨国公司选择在本土进行生产,这是因为它们的总部所在国通常是经济发达国家,其劳动力成本较高。投资者在决定输出资本时,除了考虑增加市场份额外,也考虑利用本土低成本劳动力来提高产品竞争力。跨国公司为了最大化利润和占据市场份额而制定销售策略,其中包括本地化措施。在国际市场中,广告中越来越重视地域文化因素,这体现了典型的市场本土化特征。<sup>①</sup>美国宝洁公司的广告本土化策略在不同地区有所调整,例如在美国将飘柔洗发水命名为Pert-Plus,而在亚洲地区改名为Rejoice,中文名则为飘柔,以迎合当地市场需求,广告手法也针对不同市场进行了调整。本地化的根本原因是争夺市场。<sup>②</sup>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各大跨国公司都在加大对中国本土化战略的推进力度。

第二,持续降低运营成本,赢得最佳成本。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庞大的城市人口带来的消费能力直接影响着国内外企业的经营状况。在此情况下,国内同类商品生产企业和跨国公司直接竞争,市场份额成为争夺的焦点,成本优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为了降低成本,许多国外企业,如三星、戴尔和伊莱克斯等,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而不仅限于可口可乐、宝洁、联合利华等跨国企业。中国的本地化产业链优势,成为跨国公司竞争的重要因素,有效地降低了企业营运成本。

其次,积极引进国内优秀技术研发和市场经营人才,打造强大的核心团队。

① 许基南.品牌竞争力研究[F].广东: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2:139-158.

② 李怀斌;金荣范.亚洲著名企业核心竞争力经典案例[F].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193-238

许多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地区性研发中心，利用资金优势吸引当地优秀人才，以便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展开研发和营销活动。他们成功地实现了本土化经营，通过吸纳大量国内营运专才，并利用国内技术研发和经营性人才，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优势，有效地提升了品牌竞争力。

#### 四、中国本土品牌的竞争策略

近来，中国市场内各品牌在竞争方面显示出的特点和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高端商品市场通常由外国品牌主导，而国内企业则主要负责低端商品。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化发展，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成为品牌竞争的主要战场。在高端市场，本土新兴品牌与跨国企业品牌展开了激烈竞争，构成了另一片竞争热土。新型本土企业品牌和传统本土企业品牌在价格较低市场上的竞争演变成了另一个竞争层面。随着世贸组织时代的终结，全球贸易将面临更多摩擦、竞争加剧，并且非关税保护措施将会被彻底废除。根据中国政府的计划，市场开放力度和范围将在后续过渡期逐步增加，以实现其承诺。经过研究发现，中国消费市场的现状已经发生变化，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市场营销重心都正在向中国的中产阶层市场转移。两者都将目光集中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从现在开始，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为了提升品牌竞争力，中国企业需要优先加强技术研发，同时利用新媒体传播和市场拓展来吸引消费者，通过整合产业链来专注细分市场，从而赢得品牌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注意以下几点：

提高品牌知名度中国企业对自身品牌的认知仍然相当不足，至今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取决于品牌的竞争力。但是许多中国企业仍然局限于产品导向，忽略了品牌策略，导致品牌经营严重滞后。很多公司普遍认为建立品牌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很多投入都是为了培养其他人的品牌忠诚度。然而，由于缺乏坚定的品牌意识，这些企业最终只能靠微薄的加工费为生，等不到品牌成功的那一天。甚至更糟糕的是，如果过度依赖他人的品牌，就无法从自己品牌中获得可观的利润，企业的努力只能以低价抛售的方式来“浪费”。因此，当地企业需重新梳理品牌认知，从服务、品质到危机处理等方面全面提升，否则将面临被市场所淘汰。

坚持科技创新当前,科技创新是各个品牌在市场上争夺份额,参与竞争并扩大存在空间的重要武器。市场竞争的规律表明,如果企业对技术创新不重视,无论其产品历史悠久、资本雄厚,都必将走向衰败。有些企业仍然只注重产品改进,而忽视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足够的投入进行技术研发,导致品牌创新的支持不足,从而导致产品无法及时满足市场需求,最终被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提高服务质量海尔之所以成为中国唯一能够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之一,是因为消费者普遍认可海尔的优质服务。在服务行业中,建立服务理念是轻而易举的,但要持之以恒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持续不断地提升服务质量才能为顾客创造真正的价值并取得竞争优势。这也是本土企业在发展战略中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

实施全球化战略。中国本土企业必须要适应全球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直面来自不同文化下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挑战,只有了解并满足不同市场和顾客的需求,才能为他们提供令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确保企业持续发展的道路,使自己永远走在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 学术短札





# Cultural Tourism Sloga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rnival --Taking the "shouting" publicity slogans of China's cultural tourism official media in early 2024 as an example

郑哲（安阳师范学院）<sup>①</sup>

**Abstract:** Cultural and tourism slogans are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a cit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houting mike"-style publicity slogans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tourism official media at the beginning of 2024, and proposes that these "shouting mike"-style publicity slogans in the view of cultural revelry liberate people from the official tone of seriousness, highligh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lace, and respond to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audience.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view of cultural carnival, this kind of "shouting" propaganda language frees people from the solemn official tone,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lace and responds to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audience, and creates a good and open public language landscape.

**Keywords:** culture and tourism propaganda language; cultural carnival; local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needs.

## I. Introduction

Tourism is a strategic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 prosperous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has an obvious role to play in driving the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it can also greatly help to realize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China's "14th Five-Year"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 points out tha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eriod, China will fully enter the era of mass tou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still in a period of important

---

<sup>①</sup> 郑哲(1993-),女,河南漯河,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building a city's cultural and tourism br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The most striking question is "how to write the slogan of cultural tourism", because it is not only a high degree of condensation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e of cultural tourism,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business card of a city's cultural tourism to a certain extent. 2024,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e cultural tourism of all parts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24, China's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national strategy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branding function of the publicity language, began a full swing "shouting" style cultural tourism publicity languag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produced a series of "broken circle" effect, and this is not only the national demand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China. Not only is the country's needs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a certain extent highlights China's current carnival, mass cultural ecology.

###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arnival**

The concept of "carnival" originated from Bakhtin, whose logical framework starts from the specific festival of carnival and penetrates into various fields,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specific rituals and becoming a cultural form and a world feeling. According to him, "carnivalization", "rejoices in the evolution of change, in the fact that everything becomes relative, and is opposed to that one-sided and severe officialism of conformity, which arises from fear, from the dogma of respect and change, and which always tries to absolutize the status quo of life 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social system. It is from this solemn officialism that the carnivalesque world feeling liberates people." As such, it contains a vibrant energy that subverts hierarchy and opposes rigidity, and implies an interactiv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hange and renewal. In it, strange and absurd images abound, while the mainstream, official and orthodox parts are depreciated; jokes are made about the yellow bells or the masculine and the white snow, which are degraded; "the things of the utopian ideal and the realities are temporarily fused together in this

overwhelming feeling of the carnival world", and the carnival, if it loses the ideals, will wither and die, it provides a key to the future of imagination, making the future in the imagination in a state of mutability, unfinished, and intertw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present in many ways.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publicity slogans of the official media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2024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ultural frenzy" embodied in this kind of "shouting" publicity slogans.

### **3.The "Shouting Ceremony"-style publicity slogans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tourism official media at the beginning of 2024**

At the beginning of 2024, with the fire of Harbin tourism, Harbin culture and tourism took the lead in "shouting": my name is Ha, drink ah ha, all over the world, who all praise, ice and snow out of slippery, say thousands of miles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shouting the best; my name is Ha, sprinkle snowflakes, my flowers after the opening of a hundred flowers to kill, ten thousand miles of snow is the king of the bomb, I praised the love of the hair together! Subsequently all over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departments hav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shouting" publicity, the most attention then Shandong, Henan two places: "Your name is East, Eastern Province, your side of the crunchy cold; my name is East, the big Shandong, our side is very loud clear; East, East, ginseng sable and antler; East, the big Shandong, Yellow River Taishan and three holes ..... "Henan" I surnamed river, drink goose river, like a moth on fire, famous across the wasted, this work and fame I deprived!" This has triggered a series of follow-up effects, such as Fujian's "swinging style shouting" - "My surname is Fu, Hu, Fu Fu, Hu Hu? ..... Forget it, get off work!" Another kind of magical performance art - "nonsense literature" - has also become popular, initiated by the Cultural Tourism Hunan. Its video posted a tongue twister: "Hunan is the only province in China called Hunan, the only province that is simply called 'Xiang'.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Hunan is not only the place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Hunanese people in the country, but also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where the climate type overlaps exactly with Hunan's climate."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British translator Newmark categorizes bulletins, instructions, propaganda, announcements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s vocative texts (Newmark 2001:40). Obviously, the "shouting" of the official media of culture and tourism will inevitably have the function of appealing to attract the public to travel.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ulture and tourism, such as Harbin's "thousands of miles of ice, ten thousand miles of snow", Shandong's "saints of landscape", Fujian's derision of its accent, and even Hunan, where the content of the "shouting" is unimportant. "The content is not importan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e cultural tourism "shouting" form of public appeal.

#### **Fourth, carnival: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official media "shouting" type of propaganda language of the deeper implications**

If Harbin's "my last name is Ha" is still a "paragraph" type of flirtation, all over the "my last name is X" such as spring sprung up, forming a kind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ficial media "Shouting" type of momentum, it has been upgraded from the initial paragraph to a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influential and meaningful with a "cultural carnival" nature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events, or social events.

For the official media, with this funny and interesting propaganda language, abandoning the traditional value dimension of the yellow bells and dalu, upright and serious, overcoming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acred, facing the aesthetic needs of the public, to create a "shouting" cultural tourism propaganda language, on the one hand, they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of the big time and space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ulture, see the On the one hand, they see the unfinished nature of human soci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overall cultural development, so they actively metabolize the previous cultural form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is metabolism and renewal, this funny and interesting form of literature "symbolically" overcomes seriousness, "nipping all seriousness in the bud," and thus embodies a joyful and bright spirit. Breaking down limited seriousness and liberating consciousness, thought and imagination for new possibilities is, in essence, a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hen we open the comments section of the official media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comment with the most likes is: "The world has finally become a madman the way I like it", for the audience, the first thing they feel is that the "madness" here does not only refer to the experience of madness at the emotional level, but is also a kind of temporary freedom from all kinds of problems, which is a kind of temporary freedom from all kinds of problems. In essence, it is a sense of freedom that releases human nature by temporarily getting rid of all pressures and constraints,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energy that inverts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hierarchy, and equalizes the position of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of all people. It is only when a person's natural nature is restored, and he is free to do as he pleases without fear, that he can laugh. Although this experience is short-lived and utopian in color, it is a clear manifestation of man's desire and pursuit of an ideal world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a hope for th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Early human beings in the stage of ignorance could not have the consciousnes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the low productivity of the society could not provide a humane living environment, but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with the desire to be free from suppression, without restriction, and to live freely and painfully with an intrinsic impulse of lif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awakening of human self-consciousness,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bound to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It is also due to the pursuit of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human life has aesthetic significance.

In this mode of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not only does it take care of the public's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values, but it also creates a good and open public language landscape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kind of "shouting" publicity language is a real miscellaneous language phenomenon. For example, the Shandong Cultural and Tourism Bureau's "Your name is East,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your side is cold; my name is East, Great Shandong, our side is very loud and clear; East,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ginseng, sable and deer antler; East, Great Shandong, Yellow River, Mount Tai and the three holes ....." First of all, the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style of publicity

slogan is a real-life miscellaneous language phenomenon. First of all, the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and "Shandong" are not names, not to mention the surname, and "shouting" type of propaganda directly to the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Shandong", "Shandong", "Shandong", "Shandong", "Shandong", "Shandong", "Shandong", "Shandong", "Shandong", "Shandong" and "Shandong". "Shandong", or any other province as a person, disassembled into "surname" and "first name". Secondly,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is the abbreviation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Heilongjiang, Jilin, and Liaoning), which is not in juxtaposition with the single province of Shandong, but in the "Shouting Mai" style of propaganda,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and "Shandong" are used. However, in the "shouting" style of propaganda,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and "Shandong" are engaged in "equal dialog". In the end, "Ga Ga Cold" is a daily colloquialism or dialect of Northeast China, and "Rang Qing" is a literary term from Lao She's "Winter in Jinan", embarking on a path of "communication". The "Shouting Mai" style of publicity started in Harbin, one of the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and then worked in Shandong, first becoming "you", then introducing "me", and using a witty and humorous way to show the geographical, clima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Shandong and the northeast. The geographical, clima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Shandong and Northeast China are shown in a witty and humorous way. At the same time, netizens also asked in the comment section "Q: Why isn't Shandong surnamed Shan? A: Shandong people love to use inverted sentences", "my surname is Dong" vividly presents the expression habits of Shandong people - inverted. Therefore, this "shouting" propaganda slogan is an unusual synthesis of various languages (colloquialisms, dialects, jargon, literary vocabulary), various techniques (metaphor, contrast, flirtation, humor), etc., which gives it a double directionality and a great symbolic generalization power.

### **Conclusion**

The cultural tourism market is changing rapidly and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The cultural tourism market is no longer the traditional "competition for

attractions", but has been upgraded to a competition for the "attraction economy". The cultural tourism official media "shouting" type propaganda fun and interesting behind the cultural carnival behind the individual temporarily, symbolically beyond the real life due to social status, economic income, cultural level of high and low barriers and obstacles formed, is "alone as much fun as all the fun! It is the happiness of "one's happiness is not as good as the happiness of all". Culture and tourism prosperity competition bloom, and poetic common faraway places. When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market accelerated warming, wh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continue to be satisfied, we should be more innovative culture and tourism to lead the tourism, so that the new era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epth integration, and more future.

**Bibliography:**

Bakht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 Volume 5*,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pp. 223-224.

Bakht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 Volume 6*,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 12.